

日本民主党内阁内政与外交探析

周彦 林晓光

内容提要 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了国会众议院第45届选举。民主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上演了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历史性的最大变局。9月16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内阁首相,与社民党、国民新党合作组成三党联合内阁。民主党内阁的诞生,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国内政治的结构、格局、思潮、走向,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将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本文将就此问题做简单的阐释和评述。

关键词 民主党政权 国内政治结构 对外政策走向

一、自民党为何惨败

通过选举,将一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拉下马来,实现政权更迭,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场历史性的政坛“大地震”,不仅改写了日本国内政治版图,也预示着今后的日本政局将可能进一步向着以两大政党为中心的格局转变。

1955年建党以来,日本自民党成功地领导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间除1993年到1994年的10个月时间在野之外,执政长达54年。但这一“百年老店”为何在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一败涂地,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呢?主要原因有内外两大方面。

从国际大背景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进入转型期,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使“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失败,传统保守主义逐渐弱化和改变;金融危机不仅宣告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是万能灵药,也导致美国霸权实力和掌控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这一时代潮流自外向内地从政治、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推进了日本国内的变革。

从自民党自身看,第一,政策僵化、理念陈旧、应对失误。冷战结束后,日本老龄人口增加、少子现象出现,说明日本正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国民越来越重视社会福利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民生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形成的“高工资、高利率、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零增长的社会现实环境。这对支持基础在农村和企业,因而历来代表生产者利益的自民党构成了新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自民党陶醉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成就,未能与时俱进调整执政策略,仍然推出通过增加公共开支维持高投入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小泉的“结构改革”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同时,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国际金融危机和海外市场的萎缩更使过度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遭受致命打击。经济恶化、失业增加、收入减少、生活越来越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迅速解体。国民的不满

全部指向政策错误、应对无方的自民党。连自民党的传统政治基础,如农协、医师协会、邮政局长会等,也因为小泉的改革而利益受损,与自民党渐行渐远。

而民主党则提出发放儿童和农民补贴、改善医疗体系,重新评估邮政民营化等政策,通过主打“民生”牌,将自民党的地盘釜底抽薪、不断蚕食。使得民主党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如风卷残云一般,不仅在 8 个历史上的空白县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在 44 个都道府县所在地的“第一区”拿下了 36 个区;在小选区选举中,民主党在东京都的 25 个中夺得 23 席,在千叶县的 13 个中赢得 11 席,神奈川县的 18 个中斩获 14 席,爱知县的 15 个通吃,甚至在自民党垄断多年的 94 个小选区中,也横扫 57 席,^[1]从而奠定了历史性的选举胜利的基础。日本政治学者早在 2007 年参议院后就指出:“在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自民党的金城汤池的农村,民主党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仅从政党支持基础这一点来看,就是意义非凡的。”^[2]

第二,制度疲劳、政治世袭、腐败严重。自民党的世袭问题严重,金权政治盛行,阻碍政治新生力量的流入与活力,是其制度疲劳的表现之一。目前,日本国会 480 名众议员中,119 人为世袭议员,其中自民党 101 人,约占该党众议员总数的 1/3,如将参议员包括在内,则 38% 的自民党议员为世袭。麻生内阁的 17 名阁僚中,有 11 人为“太子党”。世袭议员大多生长于“温室”,受到老一辈政治家的呵护与提拔,缺乏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和对国内外大局的把握,缺乏政治博弈的经验和技巧。这就导致自民党政治家队伍总体素质的下降,以及人才危机的出现。反对政治世袭制度成为民主党攻击自民党、赢得民意支持的重要法宝之一。此次众议院选举民主党当选众议员 143 人、平均年龄 49.4 岁,加上参议员 66 人,初次当选者占民主党全部议员的 50% 以上。同时,近年来日本经济的转型导致“终身雇佣制”解体,非正规就业者比例增高,其中多为 20—29 岁的年轻人,经济衰退来临之际他们首先被解雇。这使得以年轻人居多的“无党派阶层”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积极投票以表达政治意愿和对自民党政策的不满,投票率高达 69.28%,^[3]而且大多把票投给了高呼“变革”的民主党。这是自民党选举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众议院选举后日本政治结构的变化

日本媒体普遍以“政治大地震”来形容这一次众议院选举结果的震撼力之大。这一震撼力突出表现为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变化。

从选举结果看,首先,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全部 480 个议席中的 308 席(选举前为 105 席),超过了控制众议院各常任委员会所需要的绝对稳定多数的 269 席。而自民党则从选举前的 300 个议席骤降为 119 席,降幅高达 60%,这一大起大落的逆转为战后以来历次选举所罕见。其次,许多重量级的资深议员,如前首相海部俊树、前自民党副总裁山崎拓、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前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等 22 名前阁僚,均被无名小卒挑落马下、名落孙山。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受到牵连,议席数从原来的 31 席降为 21 席。共产党、社民党维持了选举前的议席数,分别为 9 席、7 席。国民新党从原来的 4 席减为 3 席,大家的党获得 5 席,无党派人士仍为 8 席。第三,历来被认为是“保守王国”的自民党传统“票田”“城头变换大王旗”,改写了日本国内政治版图。第四,上次众议院选举时不可一世的“小泉近卫军”83 人中只有 10 人当选,几乎溃不成军,让人们大跌眼镜。而“小泽近卫军”却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其未来命运如何,是否也昙花一现?

从政治生态看,一,对民主党顺利运营政治较为有利。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三党在众议院占有 318 席,只比 2/3 多数的 320 席少 2 席;在参议院,三党占有 119 席,也只比过半数少 3 席。这不仅改变了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自民党、民主党分别主导的“扭曲”局面,也将有利于民主党利用国会多数席位通过议案和法案、贯彻政治理念、推行政策措施。二,以自民党、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为中心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在 2005 年众议院选举后,两大政党议席数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 86%,2009 年上升为 89%。即使在多党可以胜出的比例代表选区,自民党、民主党分别获得的议席比重从 2005 年的 43%和 34%改变为 2009 年的 48%和 31%,两党合计的比重从 77%增加为 79%,也出现了选票向两大政党集中的趋势。今后,日本政坛上传统革新政党的生存空间将可能进一步萎缩,政界整体保守化的倾向将可能进一步加强。三,选举中广泛利用网络。日本各大媒体在自己的网页上都登载了各党的政权公约,并逐条加以对比;早稻田大学政权公约研究所和日本因特网新闻会社共同创办“e 国政”网站,一天的最高点击率达 50 万次;自民党用网络广告讽刺民主党,10 天内点击率超 30 多万次;民主党网页的浏览量 7 天内达 600 万次以上;其他政党也都在各自的主页上提供了视频宣传资料。网络技术对选举活动的渗透,有利于日本政党政治的大众民主化进程。

从未来政局发展趋势看,国内某些学者所谓“日本正式进入两党制时代”^[4]的断言恐怕过早,也过于轻率。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局在 1993 年发生变动,自民党一度失去执政权达 10 个月,当时“两党制”就在日本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十几年来日本政界几经分化组合,小泽屡次纵横捭阖,仍然未能形成两大政党你下我上、轮流执政的稳定机制。此次民主党上台执政,可以说日本政治将进入以两大政党为中心进行博弈和角逐的格局,也许还只是新一轮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开始,究竟能否就此形成两大政党制度化轮流执政的稳定机制,从而奠定具有日本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还需要更多的历史事实和数据资料来验证,需要我们冷静而密切的深入观察。对任何社会现象都需要待其有了相当程度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对其作出符合事实的、较为科学的、尽量准确的描述、阐释和论断。任何在事物发生之初就匆忙作出的论断,都很可能是不全面、不准确、不充分、不科学的。目前,我们需要是,密切观察民主党上台后日本各个政治力量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政策理念,以及运营政治、管理行政、动员和利用政治资源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政治的结构、格局和变化走势进行描述、阐释和分析判断。

三、民主党内阁的国内政策

从内政和外交两大领域来看,民主党政府将把内政放在优先地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外交上或将暂时维持既有框架的稳定。其原因主要在于,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基础,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搞好内政,赢得 2010 年 7 月的参议院选举。

首先,能否兑现承诺、巩固政权基础。

众所周知,在议会内阁制的政治制度下,政党的政治目标是取得政权,取得政权的前提是通过选举控制尽可能多的议会席位,因此选举是政党的生命所在,各政党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放在选举上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在参议院,民主党拥有 109 席,加上社民党、国民新党共占有 119 席,距过半数还差 3 席。民主党在 2010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的目标是单独过半数,至少是三党过半数,为此就要在经济产业和社会福利方面做出业绩,至少是履行几项竞选诺

言,以取信于民,争取选票。一旦在参议院单独过半数的目标实现,政权基础将更稳固,政治运营将更顺畅。但日本国民似乎对此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据《朝日新闻》在选举前的调查:选民中 24%认为政权更替后日本政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而 56%的人则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¹⁶因此,民主党之所以获胜,并非是社会支持基础扩大的结果,也不是选民对民主党有多大的期望,而是对自民党太失望了。所以,此次日本众议院选举的特点其实就是“三不”:选民们对自民党“不满”,对民主党“不安”,对政治“不信”。而国民选择“政权更替”反过来对民主党也是更大的压力。有鉴于此,民主党能否尽快兑现竞选承诺(至少是部分兑现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民的愿望和期待,将决定 2010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的胜负成败,从而进一步决定民主党政权能否长期执政,至少是决定鸠山内阁的命运。从这个政治日程表来看,民主党的“试用期”也就是未来的 10 个月。倘若民主党在 2010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即单独掌握过半数议席,则依靠在众参两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至少有把握维持政权 3—4 年,直到 2013 年的众参两院选举。当然,即使民主党丢失部分议席,即使鸠山内阁引咎辞职因此下台,也不足以直接导致民主党政权的丧失,因为是解散众议院举行提前选举、还是内阁总辞职,其决定权依法掌握在民主党推选出来的首相手里。但这必将使政治运营发生困难,民众对民主党失望,对民主党的打击更多地将是心理和士气上的。毕竟,选民会用手中的选票对民主党的执政业绩做出评判。

其次,如何作为执政党妥善处理与自民党的关系。

自民党在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大败后,决心重整旗鼓另开张。9 月 28 日,自民党选出谷垣禎一为新的总裁,打出了“刷新政治,调整政策,取信于民”的旗号,宣称要以“政治在民”的理念进行深刻反省,“全力以赴为夺回政权而努力”,通过政策和人事的更新,恢复国民的信赖,巩固社会支持基础,以在野党身份制约民主党政权,在鸠山的政治资金问题上发起攻势,争取在 2010 年 7 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过半数席位,¹⁶以卷土重来、东山再起。自民党富有长期执政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经验,传统的社会支持基础并未完全解体,66%的日本国民认为自民党能重新执政,77%对民主党执政感到“不安”。¹⁷如何在国会内外谨慎、稳妥、巧妙地处理与自民党等在野党的关系,是初次执政的民主党不能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三,如何提高自身政策制订能力并处理好与文官系统的关系。

民主党长期在野,党内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才不多,特别是在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初次当选的 143 名众议员,加上 2007 年初次当选的参议员 66 名,一共 209 名“一年级新生”,占该党全部国会议员 417 人的近 50%。这些人的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经历大都有所不足,必须尽快实现从在野到执政的角色转换,培养出一大批各个领域的“政策通”,提高政策拟制、协调、贯彻、执行的能力。民主党在选举前提出的“政权公约”要把以往“官僚主导”的政治决策体制改为“政治主导”,准备向各个省厅派出 100 名议员担任副大臣或政务次官,并在内阁设立“国家战略局”以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为此,民主党废止了已有 123 年历史的各省厅事务次官的协调会和每周一次的记者会见,禁止官僚退休后转入社团法人任高级管理职务,重新审查各社团法人存在的必要性,建立副大臣向“阁僚会议”汇报等各种制度,目的就是打压官僚在政治决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这样做,不仅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立刻突显出来,与官僚的矛盾也顿时趋于尖锐。从政治学原理和议会内阁制度来看,“官僚制以专业性和政治中立为基本原则行使国家权力,政党是通过政策层面的党派性吸引选民的政治集团。政党政治是依靠‘中立性’和‘党派性’的组合来取信于民的制度和结构。因此,官僚依据政治中立的

原则与政党合作,本身就包含了‘合作与拒绝’两个侧面。”⁸⁹所以,民主党打压官僚并不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运作规范和基本原则,虽然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也难免给人留下争权夺利的口实。民主党能否在削弱官僚决策权与利用官僚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官僚如何考虑和应对,是否会竭力反弹?也是民主党政权不能不慎重处理的课题之一。笔者目前可以较为肯定的仅仅是:民主党能否真正打破官僚政治还有待观察;民主党同官僚系统之间的磨合与博弈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不会一帆风顺。

第四,如何解决虚假政治献金问题。

鸠山本人在选举前被揭发出政治资金报告书有虚假记载问题。选举后,媒体并未放松对这一问题的揭发。据“友爱政经恳谈会”的政治资金报告书,2005年以来有2.5亿日元的“其它”资金收入,按照法律这需要至少有5140名个人献金者,但报告书所列献金者中,有的并不存在,有的已经故去。日本内阁总务省9月30日表明,4年以来该会的政治资金报告书中至少有193人次的虚假记载。⁹⁰同日,民主党当选议员后藤英友的出纳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警方逮捕。显然,民主党议员的资金问题并不都是毫无瑕疵的。自民党是否会利用这些问题发起攻击,也是民主党必须面对的课题。

第五,如何通过党内人事安排化解矛盾。

人事安排其实就是权利、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创立不过13年的民主党因吸纳不同社会阶层而迅速扩张,社会支持基础固然迅速扩大,但内部派系之众多、政策理念之歧异,也是人所共知的。“推翻自民党”的口号和目标成功地把民主党内部各派凝聚在一起,但这种现实功利色彩很强的政治动因,并非是基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价值观念的认同而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旦成功地取自民党而代之,党内如何维持团结、如何利益分肥,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赢得此次众议院选举之后,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菅直人等党内领导人物纷纷入阁担任重要职务。而为民主党获胜建功立业的小泽一郎却因牵连政治资金的案子,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提出希望担任民主党的干事长。民主党党首鸠山立即表示同意。任命小泽为民主党干事长的消息一经发布,日本舆论立刻表示担心是否会出现“党、政双重政治结构或决策机制”。尽管鸠山首相反复强调“决策的一元化”,小泽也一再表白要专心党内事务,不过问政府决策事务。但作为民主党的干事长,小泽手中拥有几件远比在野党时代更为强力、远比其他民主党领导人更为实用的“利器”,若想干预政治决策过程兴风作浪,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这也是深谋远虑的小泽为什么一定要出任干事长的基本动因和主要目的。

1、在党内掌握雄厚的政治实力。日本民主党143名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中,大部分是小泽亲自挑选和指导,派秘书现场指挥、提供资金支援,才得以胜出的,因而成为小泽的亲信及其党内实力基础,日本舆论称之为“小泽近卫军(儿童团)”。小泽在党内的支持力量从约50人猛增至约150人,成为党内最大的政治集团,实力决不亚于当年自民党内的“田中军团”。小泽对如何运用这一政治资源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凭借这一实力基础要价并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民主党干事长的职务。为了继续借重小泽的选举才能迎战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鸠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小泽的请求,任命小泽担任民主党干事长。但谁又能说这一任命的后面毫无对小泽实力的忧虑或忌惮?

2、除了实力的增长之外,小泽的政治能力也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刊物《文艺春秋》2009年10月号发表了一份关于民主党实力派议员政治能力的调查表,调查的对象是日本各大媒体的53名政治记者。调查表显示,小泽的综合政治能力为238点,超过鸠山由纪夫(146点)、冈

田克也(150点)、菅直人(119点),排名第一。其中想象力和统率力均为第一,协调能力排第三,但政策力仅15点,信息发布能力更是只有1点。由此可见,小泽的战略设计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之强,是媒体所公认的。但他的“钢腕”、强悍的从政风格,也是其政策实施能力不足和公共关系能力阙如的根本原因。

3、拥有党内政策协调和国会对策的管理指挥权。按照惯例,由党的干事长与国会对策委员长和参众两院的议员会长共同协调党内议员在国会的政策制订和立法活动。这实际上使小泽通过设计和提出党内政策构想,通过指挥将党的政策设想转化为国会决议,获得了对于政治决策的巨大的发言权和干预权。如果政府只能在民主党的政策构想和国会决议的基础之上或压力之下进行政治决策,那不要说是“双重决策体制”,简直就是“党指挥政”了。日中协会的一位先生因此对笔者直言:今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运营和决策不是什么“二元体制”的问题,而是以小泽为中心的“一元化权力体制”。^[10]小泽能够信守“不干政”的诺言,洁身自好、谨言慎行,远离政府决策体制吗?观察家们无不抱有一个巨大的问号。

4、掌握党内庞大的政治资金。作为干事长,小泽可以调动党内多达170亿日元的政治资金。日本政治本质上是“金元政治”,即金钱与政治的结合与交换,离开了钱谁也玩不转。在刚刚结束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小泽就是让自己的秘书带着钱包或信用卡到各个选区去,不惜重金,为民主党“刺客”候选人支付所有的竞选费用,从而打赢了选战。为了迎战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民主党上上下下必须全力以赴,从推举候选人,拟订竞选的纲领、策略和口号,组织竞选班子,分配竞选经费,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拥有人事权和资金分派权的干事长来主持其事。这必将成为小泽进一步巩固党内实力基础的大好时机。

为了实现决策的“一元化”,民主党决定把党内政策调查会的政策制订职能全面转移给政府,限制议员提出法案,等于实际上废止了政调会及其所属的各“政策部门会议”。而未担任副大臣或政务次官的年轻议员将因此无缘政策制订。这不仅涉及他们的政治权利,更关系到他们与选民的关系,将来竞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为选区和选民谋取利益,这对政治家来说,可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年轻议员因此对党内高层更加不满。9月18日,小泽以干事长的名义就此事向民主党全体议员发出通知。日本舆论认为,这反映了小泽对政策决定过程介入的加强。^[11]9月28日,内阁突然宣布:成立“联合政府各党党首会议”,成员包括鸠山首相、菅直人副首相、福岛瑞穗消费者相(社民党)、龟井静香金融相(国民新党)以及三党的干事长。平野官房长官事先就设立这一会议征求小泽的意见,得到了赞同。日本媒体指出:设置该会议是为了有一个听取小泽意见、以利政治运营的平台,实际上是“小泽构想”的实现。^[12]这样一来,就在机构和制度的设立方面为小泽干预政策决定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民主党干部的话指出: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进入内阁,把党交给了小泽一人,由于小泽既掌握财权,又有指定党所公认候选人的权力,势必形成“党、政双重权力结构”,人们不能不担心鸠山所追求的“政府与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将以空想而告终。^[13]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国内较为广泛而一致的看法。

四、民主党内阁的对外政策

从内政优先的基本从政原则来看,民主党政府首先将考虑如何恢复经济、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和医疗救护制度,缓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内,将维持

现有外交格局和框架的稳定性、延续性,不大会轻易挑起外交纷争。

1、“友爱”的政治外交理念

鸠山提倡“友爱政治”和“市民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国民之间的互助互利,实现国民主导的政治变革,打造共存共生的、以个人自立为基础、以市民为中心的“友爱社会”。由此似可以引申出其建构“友爱世界”的“友爱外交”思想。在外交理念上,鸠山不赞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权力谋求本国利益的“现实主义”学说,而主张在交流与合作中推进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和“动能主义”,以及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利益共识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他提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即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必须把正日益显出生机活力的东亚地区确定为日本的基本生存空间。所以必须坚持建立覆盖全地区的稳定的经济合作与安全的框架。”他主张坚持“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外交,认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头的问题,走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与安全之路。”^[14]这至少在表述上给人以谋求日美对等关系、外交回归亚洲的感觉。显而易见,从地缘战略以及国家利益来看,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将以对美、对亚和对中外交为中心。

2、日美同盟框架内的政策调整

在对美政策方面,民主党从上述理念出发,在竞选期间提出了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的对美政策方针,意图在既有双边关系的框架内逐步扩大和提升日本的利益和地位。具体内容有:调查“日美核密约”,停止在印度洋为美军供油,重新商谈关于冲绳美军基地及其搬迁费用问题等,这些都让美方感觉不快。美国媒体在民主党选举获胜之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强调日美同盟对日本的重要性,警告日本不要背弃美日同盟。例如,《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载了被认为“具有反美倾向”的鸠山论文。《华盛顿邮报》2009年9月1日发表社论,批评鸠山摆脱“追随美国型外交”是“缺乏经验的政治家”。这反映了美方对民主党政府调整日美关系的担心。有人因此判断民主党政府将更多地对美国说“不”,将大幅度调整日美同盟关系,甚至“脱美入亚”。^[15]

但事实却与此判断恰恰相反。鸠山不仅首先会见美国驻日本大使,首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而且在9月21日访问美国、与奥巴马会谈时重申: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更没有提及与美军基地相关的《日美地位协定》。说明民主党政府将在确保日美同盟的前提下,继续既定的对美外交,并不存在立刻、大幅改变日美同盟现有关系框架,乃至“脱美入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可能,也不会不顾美国的意愿而在印度洋供油、美军基地和驻日美军再编等问题上大动干戈。日美之间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各个层面上的矛盾或摩擦,不会改变日美关系的基本格局,对日美关系进行重大调整的主动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因此,民主党政府将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实现国际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基本支点和主要路径,谋求与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政策领域达成共识与合作。同时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诉求。对美政策的调整,最多是在顾及本国利益和民意的基础上,寻求相对自主性,纠正原来自民党过于倾向和追随美国的政策重心,对美、对亚并重,回归重视和保持平衡的日本外交传统。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上,民主党政府将考虑日美同盟的基础性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维持对美、对中关系的相对均衡和三边关系框架的稳定,但无论是现实政策、战略思维,还是利益攸关程度,其对中外交都不大会高于或重于对美外交。

3、对亚、对中外交与中日关系

对亚洲的外交是民主党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中外交。民主党主张重视亚洲、重视中国,“确立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信赖关系,共同努力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亚洲外交方针。这将有助于民主党政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用于亚洲事务,使亚洲各国更接纳日本,改善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对中政策方面,鸠山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反省侵略历史,批评右翼出版的、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这将有可能使曾经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不再被日本右翼利用而政治化。民主党坚持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主张具有实际内容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以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开展能源环保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解决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鸠山认为:双方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越多,挑动情绪、加剧民族主义的风险就越大。只有走向更高程度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解决领土争端。因此,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才是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与多边合作而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理应遵循的适当的道路。^[6]这一表述反映了民主党政府试图通过多边机制和地区一体化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些善意的表态有助于改善两国之间的互相观感和国民之间的感情,表明日方“联美制华”的过度竞争思维,利用历史问题挑战中国的对抗性因素有所弱化,经济互利、地区合作的积极因素进一步上升。这也许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或然性的结论:民主党政府将不大可能在中日之间的争论和摩擦的问题上挑战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利益底线,将出于经济回升和外贸市场的利益需要,保持对中外交的相对稳定,将有可能在与中国的利益协调与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如果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事实情况,对于推进和发展中日关系无疑是一个机遇,如何利用这个机遇未雨绸缪、趋利避害,进一步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外交的一个考验。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鸠山首相,鸠山提出建立“兄弟”式的中日关系和“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就朝核、能源、环境、地区合作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10月10日,三国首脑在天津举行会谈,随后鸠山首相对中国进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与胡锦涛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会谈。中日高层之间的频繁对话与互动,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气氛。

但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民主党关于中日关系的主张大多是原则性口号,缺少实际内容和可操作性,究竟如何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还有待观察。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因为民主党上台而出现可能易于解决的迹象,民主党内部在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权力争夺,也可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困扰。这就使得民主党的对中政策一方面具有积极因素和良好态度,另一方面又带有复杂多变、不确定、易受干扰的特点。中日之间的战略分歧、结构性矛盾、具体利益争端和摩擦,都还未能有效解决,都存在着通过对话走向妥善解决,以及继续对立、“擦枪走火”发生摩擦乃至冲突和对抗的两种可能性。

首先,民主党既然是靠选票而且是大量无特定政治倾向的“流动票”而上台的,其内外政策就不能不满足国民的要求,影响舆论的回旋空间就相对较小。据日本“言论NPO”与中国《中国日报》的联合调查,65.2%的中国人对日反感,主要因为“战争”、“历史”;73.2%的日本人

对中反感,焦点在“食品安全”。^[17]鉴于目前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国民并非多数,不能排除民主党政治家为了迎合部分国民的情绪而对中国发表“不当言论”的可能性。

其次,在涉及到双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能一相情愿地指望民主党政府会如我所愿。被称为民主党内“中国通”的海江田万里表示:在海洋权益方面,日本政府将继续主张主权,但重要的是确立不使用武力的共同原则。在军备问题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有必要加强互相信赖,希望中国也能敞开大门。^[18]这表明了民主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也不会轻易让步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从历史事实来看,在涉及领土、资源和海洋权益等现实国家利益的争端上,民主党有时甚至会鼓吹采取比自民党还要强硬的对策和态度。

第三,民主党标榜“民主”、“人权”,把藏独、疆独、台独视为“人权问题”。海江田万里强调:“我们是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的,与干涉内政是两码事。中国若想在国际社会获得名誉和地位,就不能回避人权问题。”^[19]不仅毫不隐讳价值观念的分歧,而且不无借助国际社会对我施压的潜在意图。从组织机构来看,民主党的枝野幸男是日本国会跨党派“西藏问题议员联盟”的代表;5名民主党议员是国会跨党派“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主要干部(藤井裕久、中井洽为副会长,铃木克昌、奥村展三、藤原正司为干事);民主党内有“日台议员恳谈会”、“日华安保-经济研究会”两大亲台团体,前者有成员50多人,由1997年5月成立的“日华友好议员联盟”在2000年改组而成,会长中野宽成、事务总长仙谷由人、事务局长枝野幸男;后者号称支持“台湾的民主化与自由化”,由众议员中津川博多于2004年5月招集30多人成立。曾出任民主党党首的菅直人曾公然表示:应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与中国未来的统一并不矛盾。小泽也曾声称: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是台湾人必须决定的事,是人民自决的原则。^[20]将来如果出现达赖或热比娅访日以及涉台、涉藏、涉疆的问题,鸠山首相将如何应对,能否抵制党内外压力,能否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日关系的事情,也是我们有必要提前预防和做出对策的。

第四,在“全球无核化”、“削减碳排放”等问题上,鸠山政府提出了有核国家责任、东北亚无核区、确定温室气体减排数值目标等政策,明确表示要督促碳排放大国努力减排,试图抢占环保和气候等政策领域的道德高地,掌握国际话语权。因此,即使是在环保、气候、劳工、核裁军等各国可以寻求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也可能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 and 压力。

五、几点对策与建议

抓住日本政局变化过程中对我有利的时机,积极主动、趋利避害,进一步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多层面、宽领域、全方位的双边合作,争取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这有利于我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 and 地区格局,抓住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增强国力;有利于我利用日美矛盾、牵制美日,保持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相对均衡,缓解西方国家在“民主”、“人权”方面对我的压力,以及在安全 and 经济方面对我的制约;有利于推进东亚地区在资源、环境、金融、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民主党政权的稳定,促其保持对中善意 and 友好政策,牵制日本国内右翼。

其一,继续 and 加强、扩大对民主党的工作。1、民主党与我国原来有制度化的“政党交流机制”和小泽倡议的青年干部交流的“长城计划”,今后可以继续这些交流机制,保持对民主党

的广泛联系和全面交流。同时,进一步充实现有的中日高层对话机制,或可建立像中美之间那样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问题也纳入对话内容。2、根据民主党内部派系和理念多元的现状,有的放矢地做工作。对高层人士通过加强对话以求加深互相了解,保持信息交换的畅通,抑制其冲撞双方利益底线的意识形态冲动;对原社会党系的左翼,继续发展传统友好关系,保持信息沟通的顺畅,争取一定程度的互相理解和互利互助;对右翼鹰派,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先打招呼,讲明是非利害,就事论事,不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尽量争取他们形成对中国核心利益以及中日共同利益的清醒认知,不使他们轻易挑战或激怒我国。3、鉴于民主党新当选议员有关政治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国际视野欠缺,世界观有待重新塑造,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好机会。如果能及时通过各种交流机制,帮助他们尽早树立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和全面认知,则有利于培养和扩大民主党内的“知华派”。

其二,对自民党不离不弃,利用传统人脉关系,保持交流机制,继续加强往来,体现“不忘老朋友”的精神,同时做好其党内年轻一代的工作。一来自民党已选出相对温和稳健的谷垣禎一为总裁,有助于自民党维持既有对中政策和态度;二来对失败者的感情投资更容易得到相应的回报;三来有利于我掌握在日本政局变动时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

其三,加强对日本国会的“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行使立法权,在日本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日本各政党通过制订政策法规,竭力改变“官高党低”的传统政治决定模式,全力建立政党主导的决策体制,日本国会及各政党在国家政策决定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上升和加强。因此,在原有政党交流的基础上,透过人大或其他机构,加强对日本国会的工作,在国会内外培养良好的对中认识和气氛,也日益显得重要。

其四,重视民间外交,继续“以民促官”,与日本社会各界广泛交流,加强对年轻一代的工作,形成官民互动的良好机制,配合官方外交。我各部门在涉日工作上,也需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服从中央的对日外交战略大局。

其五,通过地区多边合作的框架,寻找更多的利益重合与渗透,加强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的交织,维护共同安全,有利于中日之间建立利益共识,在地区多边框架内缓和或化解结构性的矛盾。可以考虑加强中日韩首脑会谈机制的功能和内容,推进三国之间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在环保、资源、金融、灾害救援等方面加强合作。

总之,出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和明年参议院选举的现实需要,民主党内阁将把执政重心和政治资源主要用于内政方面,在外交上将以稳定现有对外关系格局和政策框架为基本方针。无论未来日本政局是否稳定,中日关系是否发展顺利,都应以我为主,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情绪化,在有利的机遇和情况出现时,积极对话协商、主动创制或建议,掌握话语权 and 主导权,规范和确立未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框架和轨道;在矛盾尖锐、摩擦多发、较为困难的时期(如民主党政府对中政策出现反复),稳住阵脚、韬光养晦,不争一日之短长,坚持深耕基层,细致入微地做人的工作,以不变应万变,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因此,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内推进中日关系的稳步发展,仍可作为我对日工作的基本方针。

注释:

- [1]《都市、地方都是压倒性的》，《日本经济新闻》，2009年9月1日。
- [2]野中尚人：《自民党政治的终结》，筑摩书房，2008年版，第228页。
- [3]2005年众议院选举时，投票率分别为：20—34岁，51.35%；50—59岁，79.38%；60—70岁，83.12%，参见财团法人光明选举推进会，<http://www.Akaruisenkyo.or.jp/070various/s44.html>。
- [4]参见国内网络媒体关于200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研讨会的报道。
- [5]《总选举，关心高、期待薄？》，《朝日新闻》，2009年8月20日。
- [6]《读卖新闻》，2009年9月29日。
- [7]《自民党能夺回政权》，《读卖新闻》，2009年9月2日。
- [8]佐佐木毅：《政权交替以及“政”与“官”》，《经济学人》，2009年9月号，第82—83页。
- [9]《读卖新闻》，2009年10月1日。
- [10]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2009年9月24日对笔者所言。
- [11]《政调废止，年轻议员不满》，《中国新闻》，2009年9月26日。
- [12]《政府·执政党会议突然设置》，《读卖新闻》，2009年9月29日。
- [13]《鸠山政权难题：如何起用小泽？》，《读卖新闻》，2009年9月1日。
- [14]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原文为《我的政治哲学——学习祖父鸠山一郎的“友爱”之战旗》，《Voice》，2009年9月号。
- [15]参见国内网络媒体关于200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研讨会的报道。
- [16]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
- [17]《产经新闻》，2009年8月25日。
- [18]共同社，2009年9月5日。
- [19]共同社，2009年9月5日。
- [20]王海滨：《民主党执政后日台关系小析》，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展望日本新内阁的内政与外交”会议论文。

(周彦：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晓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贺平)

(上接第29页)

- [6]《日本非营利组织》，第28—30页。
- [7]参见 http://www.westwomen.org/xueshu/2008/0530/article_31.html。
- [8]朱凤岚：《日本的地震灾后重建经验》，《华夏时报》，2008年5月24日。
- [9]《日本非营利组织》，第30—31页。
- [10]周晓丽：《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基于体制、机制和法制德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 [11]《日本非营利组织》，第124页。
- [12]截至2006年7月，在2.7万NPO法人中仅有46家获得国税厅认定，参见《日本非营利组织》，第128页。
- [13]朱凤岚：《日本的地震灾后重建经验》。
- [14]《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第318页。
- [1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43—528页。
- [16]袁艺：《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中国减灾》，2004年第11期。

(康晓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生 责任编辑 郭定平)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和理念

——亚太地区脱离冷战秩序的摸索

田 凯

内容提要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所提倡并推进的亚太地区主义构想。在其影响下,亚太地区主义得以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可以说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整个亚太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本文尝试着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作一具体的描述,并在对其内容和理念加以整理的基础上,就境界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本文还评价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在亚太地区脱离冷战秩序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地区主义 脱离冷战 大平正芳 境界线

一、导 论

冷战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为东西两阵营的从军扩到意识形态的对决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可是,随着海湾战争和科索沃纷争的爆发,从绝对化的对立解放出来的后冷战期的世界秩序反而变得更为复杂^[1]。到了 21 世纪,世界更要面对恐怖主义这一跨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建设新的世界秩序成为各国政治家及学者的重要课题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为了解决这一课题,地区主义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2]。在欧洲,经过了欧共体(EC)的不断发展,1993 年欧盟(EU)成立,2002 年发行了统一货币欧元,2007 年其成员国扩大至 27 国。在亚太地区,1989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并于 1993 年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了第一次首脑会议。自此以来,在每年的峰会上,各国首脑们穿上由主办国提供的民族服装合影留念的“仪式”已成为亚太地区存在的象征。而在冷战时期,这一幕却只能在亚太地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梦境中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地区主义最初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由以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澳大利亚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为中心的跨国民间学者集团所提倡并推进的^[3]。70 年代末,亚太地区合作的构想引起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高度重视。在他专门组建的“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中,特别成立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小组”,并任命大来佐武郎为小组议长。到了大平政权的第二个任期,大平还邀请大来出任外务大臣,以实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他们访问了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John Malcolm Fraser)达成了共识,共同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发展。1980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了第 1 次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也被称作堪培拉研讨会),会议由时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的约翰·克劳福德主持。1982 年,在曼谷举行的第 2 次研讨会上,会议被正式定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1986 年,中国也顺利地成为 PECC 的成员国^[4]。到了 1989 年,在 PECC 发展的基础之上,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Bob Hawke)的提案下,亚太经合组

织诞生了。至此,经过长年的努力,亚太地区主义终于由民间的构想深化成为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正是整个亚太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使亚太地区主义由一个民间的构想升级为政府的政策,由此打开了亚太地区合作发展的新天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有关亚太地区主义的研究提到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重要性^[5]。可是,这些研究普遍是把其作为亚太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构想之一来处理,而并没有展开全面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无法真正梳理清楚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到底是什么,也让我们无法深刻地理解构想中所提到的理念。特别是有关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的研究,除了当时的相关人士所写的零散的回忆录之外几乎为零。鉴于以上的研究状况,本文整理了这些回忆并专访了当事人,以期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作一具体的描述^[6],并在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内容和理念加以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境界线(成员国的范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最后,本文还将从亚太地区秩序摸索的角度来评价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二、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大平成为首相的一年半以前,也就是1977年的年中,大平的私人智囊团召开了学习会集中讨论了大平当权后应该实行的政策。在这个时期,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并引起了大平的高度重视。二是在大平成为首相之后,组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小组。在小组历时一年多的会议中,讨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具体内容。在本节中,笔者将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进行整理和分析。

1. 大平正芳学习会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动员了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到他的政权之中,这成为战后政治的革新之举。在同一时代,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有意识地将肯尼迪的理念运用于自己的政权运营之中。1964年初,佐藤为了取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胜利,在东京成立了政策蓝图制定的项目小组^[7]。可能是多多少少受到肯尼迪和佐藤荣作的影响,大平为了制定其施政纲领,也成立了以他的智囊团为核心的学习会。在这里,笔者将对学习会成立的背景、组织状况和讨论的内容(特别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进行探讨。

(1) 学习会成立的背景——日本国内政治的格局

1971年,大平成为日本自民党宏池会的会长,开始被视作日本首相的有力候补^[8]。大平在竞争佐藤荣作后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正式出马,与田中角荣联手打败了当时的热门人选福田赳夫,促成了田中角荣的当选。在田中政权时期,大平以外务大臣的身份和田中一起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田中角荣却因为“金权政治”问题而辞职^[9]。在三木武夫成为田中的继任者之后,大平正芳又与宿敌福田赳夫临时结盟促成了三木武夫的下野。在为了选举三木后任者而举行的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因为只有福田一人立候补参选,全场一致选举福田赳夫为自民党新总裁。大平成为了福田政权期仅次于总裁的自民党二号人物——干事长。关于大平正芳的不出马,大平与福田曾立下“大福密约”的说法广泛流传^[10]。其内容是福田先当首相,两年后把位置让给大平。在此背景之下,大平的私人智囊佐藤诚三郎、公文俊平、香

山健一、大平秘书的森田一以及大藏省的长富祐一郎一起组建了学习会以研究大平新政权构想,并把讨论的结果于大平首相就任前的 1978 年 11 月 27 日以《大平正芳政策要纲资料》的形式发表出来^[11]。

(2) 学习会的组织

谈到学习会的组织,需要从大平与其私人智囊团的关系说起。当时,佐藤诚三郎、公文俊平和香山健一以地处东京赤坂的社会工学研究所为根据地,成立了一个叫“小组 84 年”的组织。经过日本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的介绍,大平认识了香山,通过香山,大平正芳结识了另外两人^[12]。社会工学研究所当时的会长是牛尾治朗(牛尾电机社长,1969 年度担任日本青年会议所会长),他早在 1971 年 10 月,就已经结识了大平。当时在与大平正芳有着亲密关系的日本青年会议所成员的柳泽昭和神野信郎等人的提案下,日本青年会议所的成员们组织了一个“大平正芳会”,称作“青蓝会”。通过这个会,牛尾与大平相识^[13]。1977 年,牛尾向大平提出建议,希望他在成为首相之前能认真制定政权政策。大平接纳了他的意见,并于 1977 年的 5 月至 6 月,在社会工学研究所组织了大平正芳学习会^[14]。

大平秘书的森田一同时也是大平正芳的女婿。长富祐一郎是森田在大藏省任职时期的同事,他是在参加森田与大平女儿芳子的婚礼时认识的大平正芳^[15]。当时,因为在学习会的组成上,需要实务经验者的加盟,所以在牛尾治朗和竹内道雄(大藏省次官,日本进出口银行总裁)的力邀下,长富也加入了学习会。当然除了这 5 人之外,每次的学习会也有其他多种背景的人参加讨论^[16]。就在这个学习会上,大平正芳的“政权构想”被整理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牛尾治朗虽然没有参加到整个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但是他提出了学习会创设的建议,提供了聚会的场所,并组织了学习会的成立,是非常关键的人物。

(3) 学习会上的讨论和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

学习会每月举行一次。当时的大平身为福田政权的自民党干事长,在身份上和时间上都无法出席。他基本上是通过森田秘书的报告了解学习会的进行状况的^[17]。学习会主要是依据“文化的时代”^[18]这一大平正芳的时代认识,以 70 年代初大平提倡的“田园都市国家构想”等^[19]为中心展开讨论。1978 年,大平与福田对立的形势日渐鲜明,学习会也开始着手准备选举用的《大平正芳政策要纲资料》(选举大会前发给每个自民党议员)。在准备阶段,森田秘书对大平提案说,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已经是大平正芳在很久之前提出的构想了,如果没有新的政权构想被提出来,选举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麻烦。于是,智囊团建议大平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作为新政策构想^[20]。经过学习会的激烈讨论,最终由长富执笔做成了《大平正芳政策要纲资料》^[21]。“环太平洋连带”的语句就是第一次在这本政策要纲资料中粉墨登场的。资料里有标题为“环太平洋连带的树立”的一节,是这样记述的:

“我国(日本)是以日美友好为轴心,努力与地球上所有国家协调发展……当然日本地处的太平洋地区各国是需要日本特别留意的……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可以促进世界的发展……太平洋地区包括了极为多样的国家……合作的方法和推进的方式都有必要慎重地考虑,‘柔性协作’的方式是很值得采纳的。至于说到亚太地区国家的范围则很难决定,这并不是日本一国说了算的事情。”^[22]

亚太地区的合作构想早在 60 年代就被民间的跨国学者集团所提倡,并曾引起了三木武夫(当时外务大臣)等政治家的注意^[23]。可是把其作为政权构想提出来,大平正芳还是第一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大平并不是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口号,而是把其作为

真正的政策目标认真地加以实行。大平政权一登场,就在学习会的延长线上,设置了“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并在其中组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小组”来研究构想的具体内容。

2. 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和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

在 1978 年 12 月 7 日大平正芳正式就任日本首相之后,他马上召集了翁久次郎官房副长官、藤森昭一首席内阁参事官、清水汪内阁审议室长,让他们组织各方面人员研究政权的基本政策^[24]。为了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平新设了三名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来具体负责这件事。辅佐官这一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平秘书森田一正是这一制度的提案者^[25]。辅佐官的事务室设在首相官邸,三名辅佐官分别是来自大藏省的长富祐一郎(首席)、通产省的照山正夫和外务省的内田胜久。同时从厚生省、农林水产省等任命了几名辅佐室的职员。辅佐官的主要任务是有关政策及政权运营的各方面意见随时传达给首相,同时,对应首相所关心的问题,收集各方面的建议^[26]。

长富成为首席辅佐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参加了政权成立前的学习会,并把讨论内容整理成《大平正芳政策要纲资料》,因此能深刻地领会大平政权构想的主旨。他的参加使得在学习会上讨论的各种政策构想特别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为了把学习会期间讨论的政策构想具体化,辅佐官小组组织了以大平的智囊团为核心的多名专家以及各省厅的行政官成立了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这个政策研究会共设置了九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其中之一就是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27]。当初预计成立七个专门小组,后来根据大平的想法并采纳了自民党内部的意见将其扩大到九个^[28]。

在小组的构成上,各小组的议长都是由学识渊博且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委员则是由学界、文化界、经济界的年轻中坚分子充当。此外还从各省厅调集政府人员参加,形成了“官民协同”的研究体制^[29]。大部分的研究小组议长由大平总理亲自选任,其余的则由大平智囊团推荐。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议长是大来佐武郎,他是由大平正芳亲自指名的。在年龄构成上,各小组议长都是日本大正时代出生,经验丰富^[30]。与此相对照,小组委员超越了党派之分,大部分是从 30 岁到 40 几岁活跃在第一线的人士^[3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平希望这些委员在未来成为社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之后,能够实现在这个研究会上所提出的构想^[32]。

此外,除了负责政策研究会事务工作的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三人之外,在各小组召开总会的时候,大平还会向每个研究小组派遣内阁审议官和内阁调查官各一名参加。各研究小组的总会几乎每月召开一次,而小型会议的召开更为频繁,全研究小组合计起来每月要召开 18 次会议。有时一次会议甚至会超过 10 个小时^[33]。大平对政策研究小组的运营没有任何的要求,只强调这次尝试不是为了大平个人和大平内阁,而是要立足于展望 21 世纪的长期的综合视角之上,只要是对今后日本有益的东西,哪怕是“反政府”的,都要毫无忌讳地进行讨论^[34]。

具体说到九个小组之一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小组,小组的构成除了议长的大来佐武郎之外,从民间起用了 13 人,从政府的 6 个省厅征调了 10 人参加^[35]。除了正式的委员之外,还让年长的专家们参加会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36]。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分别从民间和政府招聘委员的举措意在让“民间”和“政府”的理念在小组会议中相互碰撞,以制定一个采纳各方意见的构想。此外,从 6 个省厅征调人员参加,是希望可以与各个省厅较为周全地调整意见,以保证未来政策执行的顺畅进行^[37]。

在整个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的讨论过程中,起到中心作用的是身为干事的佐藤诚三

郎和饭田经夫以及大来佐武郎议长。佐藤作为大平正芳的智囊,参加了从学习会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小组的所有讨论,可以说是最能理解大平正芳意图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整个小组讨论的方向。饭田经夫在大来佐武郎成为外务大臣之后,作为议长代行为最终的政策报告书的形成贡献了力量。议长大来佐武郎作为亚太地区合作构想的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他的很多理念可以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找到影子。我们甚至会发现大来佐武郎和澳大利亚的约翰·克劳福德所提出的构想就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草稿^[38]。在大平政权的第二任期,大来被任命为外务大臣,并基于1979年11月14日所提出的同研究小组的中间报告,他和大平正芳一起把构想作为新的外交政策加以实行。到了80年代,大来作为在亚太地区合作领域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在大平正芳突然病逝之后,他继承了大平的理念,继续努力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深化。从以上一连串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来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甚至整个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9]。

三、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内容和理念

关于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具体讨论了怎样的内容,因为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会议记录,所以无法对其进行说明与判断。但是,根据参加者的文章和回忆录,我们可以了解一些讨论的片断。小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学习会上所决定的内容及《大平正芳政策要纲资料》所记内容展开的。但是,在研究小组的议论中,委员们对先前的内容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环太平洋”的语意问题。因为“环太平洋”可能使人产生此构想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五个发达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印象^[40]。可是,60年代以后,位于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东南亚正快速成为重要的经济地区^[41]。而大平的想法也是把“太平洋地区”看成一个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舞台。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书的标题用日语写着“环太平洋连带”,而英文却译成“Pacific Basin Community(太平洋流域共同体)”正是表明了这一想法^[42]。1980年,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小组把讨论的结果总结在名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报告书^[43]中。以下,笔者将对这个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概述。

1、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课题

在报告书中,一共提出了七个课题。它们分别是“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的促进”、“地域研究的推进”、“人才培养合作和技术合作”、“贸易调整扩大和产业调整”、“资源开发的合作”、“资金面的妥善交流”、“交通通信体系的扩充整備”。所有的课题都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而避开了政治和军事领域,这是因为大平正芳和小组成员们考虑到70年代末的国际政治形势而特意做出的选择。在这一时期,随着中美建交,新冷战的到来(美苏对决)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得越发地复杂。为了避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也被卷入大国间的权力游戏,它特意强调了非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商。与此同时,这样还可以有效地避开军事外交等日本的弱势领域,并将日本的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外交资源^[44]。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的成员们一致认为,只有在非政治领域里展开合作才是整个亚太地区安定和繁荣的发展方向,而这种认识也自然成为了报告书的中心思想之一^[45]。

2、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推进方法^[46]

关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推进方法,报告书提出用逐步推进的方式来发展亚太地区合作。具体来说,首先在亚太地区设立委员会来运营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同时期待在不久的将

来,这些带有民间协议机构性格的委员会能够成为常设机构,以“找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就能在合意的基础之上发表共同意见,并向相关国家政府提出改善建议。除了上面提到的民间机构之外,报告书还建议组织专家会议以应对特定的项目计划。最后,报告书指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长远目标是成立亚太地区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事实上,80年代亚太地区合作从 PECC 发展到 APEC 的历史过程正是采用了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报告书中所提出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

3、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理念^[47]

在有关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理念部分,报告书特别强调,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与其他的地区主义构想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太平洋地区是极为多样的,这一构想理念上具有三点特征:

第一,对于地区外的各国而言,它绝对不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地区主义构想(即所谓“开放的地区”的理念)。如果能够活用环太平洋各国的活力和动力,它将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第二,在地区内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以建立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相互依赖关系为目标。具体而言,在文化方面,尊重地区的多样性并促进其交流。在经济方面,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的同时,大力推进地区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经济技术援助和发展中国家切实的自主努力的基础之上,为这一地区的南北问题的解决打开一个新局面。第三,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与亚太地区已有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关系不存在任何的矛盾,而是立足于这些成果,并与其有着互补的关系。

以上对报告书中所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理念进行了概述。这些理念涉及到一个地区主义的最基本的问题,即境界线的问题(如何确定亚太地区成员国的问题)。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笔者将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四、境界线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的太平洋地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地区”(第一个特征)。“开放的地区”是一个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报告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在笔者对当事人进行专访的时候也被反复提及。也就是说,对于地区外的各国而言,太平洋地区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地区,同时也说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与全球化的进程并无矛盾。当然,“开放的地区”同时也包含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境界线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地区主义构想一般都会明确指出其所包括的成员国范围,而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境界线却是模糊的。在这一点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给人一种“未完成”的地区主义的印象。与此同时,没有指定成员国也会给人们一种此构想永远向域外各国开放的感觉。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插曲。1980年,大平首相访问了澳大利亚。在与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不是政治军事领域,而是以文化经济的合作为中心的‘柔性的合作’和‘开放的合作’。”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说:“如果中国或苏联希望参加的话,也绝不会被排斥。”当时正值国际社会围绕着阿富汗问题准备对苏联展开制裁的时期,大平的发言引来了会场中记者们的一片口哨声^[48]。

当然,虽然在表面上说是“开放的地区”,可是也绝非完全没有考虑境界线的问题。大平外交十分注重与自由主义阵营的协调关系^[49]。在70年代,尽管美苏紧张有所缓和,但仍无法

完全摆脱对立的状态。并且,苏联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50]。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理念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没有排除苏联加入的可能性,然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关于中国,笔者在专访森田秘书的时候,他指出:“大平当时对研究小组提出指示,一定要考虑如何处理中国问题。”^[51]笔者根据日本《信息公开法》,申请公开的外务省历史资料中也记录着大平强调了一定要考虑中国的位置,并把此作为对整个研究小组的指导方针之一^[52]。由此,可以看出大平正芳对中国的重视。为了回应大平正芳的要求,研究小组经过讨论得出的大体结论是:“中国还存在着很多未知的因素……目前不把其当作研究范围,而只把市场经济各国作为考虑的对象。”换句话说,整个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核心成员国是亚太地区的五个发达国家(日、澳、新、美、加)和东盟各国^[53]。

70年代,西方阵营与中国的敌对状态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而有所改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正需要西方各国的支援。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平正芳把中国作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的重要国家来考察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是与西方阵营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当时改革开放政策的未来也并不明朗。此外,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并不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在整个研究小组的讨论中,中国虽然得到了成员们的重视,但并不是合作的重点对象。这不是说小组成员想把中国排除在亚太地区之外,而是把中国作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未来的课题,希望能在未来得以解决^[54]。1980年9月,在主办国澳大利亚的邀请下,中国从堪培拉的中国大使馆指派了工作人员参加了第1次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此后,每逢 PECC 的会期,在中国国内都会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在 1986 年 11 月 PECC 的第 5 次总会上,中国加入了 PECC,正式成为了该组织的一员^[55]。

五、结语:亚太地区对脱离冷战秩序的一次摸索

上文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作了描述,并且在对其内容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存在的境界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最后的这部分里,笔者将尝试回答在导论里所提出的问题,即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亚太地区秩序景象,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评价它?

要解决这一课题,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理念上。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还包含着一种脱离冷战的含义。当然,这一点和境界线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由于提倡“开放的地区”的理念,因此不特意拒绝某一亚太国家的加盟。这种理念最终使社会主义中国加入了亚太地区经济圈,把中国纳入到地区合作的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理念本身极力避开安全和政治领域,而把议论集中于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这也可以看出它力图脱离冷战的性质。在当时,尽管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可随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中美建交,中美日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而苏联则把这一三角关系看成是对苏包围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地强调政治上的合作,反而会刺激苏联增加亚太地区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会损伤“开放的地区”这一核心理念的形象^[56]。

另一方面,正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脱离冷战”的战略考虑,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影响。到了 80 年代,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由于始终坚持非政治领域的合作而没有受到新冷战的太大影响。在欧洲因为新冷战而焦头烂额之际,亚太地区

各国却继续着地区合作体制的深化。在这种合作体制之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得以迅猛地发展，而这种势头也一直持续到后冷战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不但为 80 年代的亚太地区提供了一种脱离冷战的地区秩序景象，同时也成为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秩序摸索的一次预演。

参考文献：

[1]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坂本义和将冷战期称为“绝对化的时代”，把后冷战期称为“相对化的时代”。冷战时期的绝对化是指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化的对立，以及核战争的威胁下共存还是共亡这一绝对化的选择。而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国际权力的相对化”、“意识形态的相对化”和“争论焦点的相对化”。在这一情况下，世界秩序构造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理解。详细内容请参照：坂本义和：《相对化的时代》，岩波书店，1997 年，第 10-36 页。

[2]L. Fawcett,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2.

[3]大来佐武郎，1914 年出生于中国，到小学毕业为止是在大连度过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后，进入日本政府的通信省，而后在兴亚院及大东亚省工作。战后先后在外务省、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审议厅、经济企画厅任要职，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重要人物之一。1963 年，他辞去了经济企画厅综合开发局长的职务，出任民间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理事长，积极地参与了开发、环境等世界范围的课题研究。在此期间，他组织讨论了亚太地区合作议题。1979 年年末，他被大平正芳首相任命为外务大臣，与大平一道推动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实现。卸任后，依然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合作的建设。1993 年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详细请参照：小野善郎：《志在千里——评坛·大来佐武郎》，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 年。

约翰·克劳福德，1910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悉尼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1934 年成为悉尼大学农业经济学讲师。1942 年，兼任澳大利亚战争组织工业部的农业经济顾问。之后，出任战后重建部的研究主任、通商与农业部部长及英联邦贸易部部长。1960 年，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院长，而后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1984 年，在首都堪培拉逝世。详细请参照：L.T.Evans and J.D.B Miller, *Policy and Practice: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John Crawfor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7.

[4]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参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平台。详细请参照田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日本外交与亚太地区秩序的摸索》，《青年研究学报》，第 14 期，2007 年 12 月，第 75-107 页。

[5]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91; Lawrence T. Woods, *Asia-Pacific Diploma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菊池努：《APEC：亚太新秩序的摸索》，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5 年；Pekka Korhonen, *Japan and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 Pacific Romances 1968-199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大庭三枝：《迈向亚太地区形成的道路——境界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认同摸索与地区主义》，Minerva 书房，2004 年。

[6]为了写作本稿，笔者先后对七名相关人士进行了专访。他们分别是(括号内为当时的头衔)：森田一(大平正芳秘书)、堂之胁光朗(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小组成员)、谷野作太郎(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佐藤嘉恭(大平首相秘书官)、长富祐一郎(大平首相首席辅佐官)、公文俊平(大平首相智囊)、渡边昭夫(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成员)。

[7]渡边昭夫：《大国日本的动摇》，中央公论新社，2000 年，第 11-25 页。

[8]1957 年以池田勇人(日本首相，1960-64)为核心结成的自民党一大派系。

[9]1974 年，评论家立花隆在杂志《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对

田中角荣的政治资金的非法来源进行了全面分析。这篇文章直接成为日本舆论批判田中角荣的导火索,最终导致田中角荣辞职。

[10]川内一诚:《大平政权的554日》,行政问题研究所出版局,1982年,第45-51页。

[11]《大平正芳的政策要纲资料》最终是由长富祐一郎执笔做成的。长富祐一郎专访,2006年10月31日。

[12]根据公文俊平的回忆。《去华就实》,大平正芳纪念财团,2000年,第406-407页。

[13]牛尾治朗:《大平先生的政治观与人物形象》,《大平正芳·政治遗产》,大平正芳纪念财团,1994年,第291页。

[14]《大平正芳·政治遗产》,第293页。

[15]森田一:《致谢词》,载长富祐一郎:《超越近代——已故大平总理的遗产:上卷》,大藏省财务协会,1983年。

[16]参照长富的回忆。《去华就实》,第384-385页。

[17]长富祐一郎专访,2006年10月31日。

[18]大平正芳在1978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终结,接下来的任务是怎样维持好现有的生活水准,而日本国民也将从一个经济的时代进入文化的时代,在文化的时代里,比起物质上的东西,(日本国民)应该更尊重眼睛看不见的、有文化价值的东西。详细的内容请参照大平正芳、田中洋之助:《对话:复合力的时代》,生命社,1978年,第13-49页。

[19]面对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都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公害问题,大平提倡将农村和都市的优势相结合,把日本建设成为既拥有乡村的优越环境又保持都市的就业机会的田园都市国家。详细内容请参照1971年宏池会议员研修会上的大平正芳演说。大平正芳:《日本新世纪的开幕——潮流变迁》,《风尘杂俎》,鹿岛出版会,1977年,第97-108页。

[20]森田一专访,2006年9月11日。

[21]长富祐一郎专访,2006年10月31日。

[22]渡边昭夫编:《亚洲太平洋连带构想》,NTT出版,2005年,第27页。

[23]当时身为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对民间的太平洋地区合作构想产生了兴趣,并把其作为他的外交政策之一在外务省进行了探讨。在1967年3月14日的第55回国会外交演说中,他强调了发展亚太地区合作构想的重要性。《我国外交的近况》,1967年,资料篇第5页。

[24]《大平正芳回忆录:传记篇》,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1982年,第489页。

[25]《去华就实》,第384-385页。

[26]《大平正芳回忆录:传记篇》,第489页;《亚洲太平洋连带构想》,第29页。

[27]这九个研究小组的主题分别是: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对外经济政策、多元社会文化的生活关心、环太平洋连带、充实家庭基础、综合安全保障、文化的时代、文化时代的经济运营、科学技术的历史展开。

[28]《去华就实》,第387页。

[29]《大平正芳回忆录:传记篇》,第490页。

[30]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的年号(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5日)。

[31]《去华就实》,第388页。

[32]《超越近代——已故大平总理的遗产:上卷》,第8页。

[33]《超越近代——已故大平总理的遗产:上卷》,第6-7页。

[34]堂之胁光朗专访,2006年9月11日;长富祐一郎专访,2006年10月31日。

[35]这些成员分别是:大来佐武郎(议长);饭田经夫,名古屋大学教授(议长代行,干事);佐藤诚三郎,东京大学教授(干事);石井威望,东京大学教授;榊原英资,埼玉大学副教授;高坂正尧,京都大学教授;中川文雄,筑波大学副教授;中岛岭雄,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西原正,防卫大学校教授;本间长世,东京大学教授;山崎正和,大阪大学教授;山泽逸平,一桥大学教授;渡边昭夫,东京大学教授;高垣佑,东京银行取締役人事部长;小长启一,通产省机械情报产业局次长;堂之胁光朗,外务省大臣官房审议官;中瀬信三,农林水产省畜产局家畜生产课长;林淳司,运输省大臣官房文书课长;古桥源六郎,大藏省关税总务课长;吉川淳,经济企画厅长官

官房参事官;镜味德房,大藏省银行局银行课课长辅佐;鹿野军胜,驻纽约日本总领事馆领事(前外务省大臣官房调查企画部企画课首席事务官);神原宁,大藏省国际金融局调查课;西田恒夫,外务省大臣官房调查企画部企画课首席事务官。

[36]这些成员分别是:卫藤沈吉,东京大学教授;天城薰,日本学术振兴会理事长;稻村光一,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顾问;河村欣二,FPCJ 专务理事;五岛升,东京急行电铁社长;濑岛龙三,伊藤忠商事会长;德山二郎,野村综合研究所副社长;永井阳之助,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本城和彦,国际联合地域开发中心所长;矢野畅,京都大学教授;和田敏信,通产省顾问。

[37]在笔者对堂之胁光朗的专访中,他提到他会时常把研究小组的情况报告给外务省的上司,外务省也会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进行研究。堂之胁光朗专访,2006年9月11日。

[38]在1960年代,以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澳大利亚的约翰·克劳福德为核心的小组讨论了亚太地区合作的发展。1976年,他们把小组讨论的成果发表出来。详细请参照:《日本、澳大利亚与西太平洋经济——大平正芳与约翰·克劳福德对日澳两国政府的共同报告》,东京与堪培拉,1976年4月。

[39]渡边昭夫专访,2006年10月30日;堂之胁光朗专访,2006年9月11日。

[40]《亚洲太平洋连带构想》,第4页。

[41]渡边昭夫:《亚太的国际关系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333页。

[42]《亚洲太平洋连带构想》,第5页。

[43]《大平总理的政策报告书4:环太平洋连带的构想》,大藏省印刷局,1980年。

[44]关于政治军事领域的问题,大平专门组织了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进行了探讨。在一定意义上,它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小组形成了一种分工。关于综合安全保障构想,请参照以下的文献:《大平总理的政策报告书5: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大藏省印刷局,1980年;中西宽:《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来龙去脉——权力政治与相互依存的交错》,载日本政治学会编:《政治学年报:危机时代的日本外交——70年代》,岩波书店,1997年,第97-115页;卫藤沈吉、山本吉宣:《综合安保与未来的选择》,讲谈社,1991年。

[45]中间报告的提出使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具体化,同时也使大平正芳在其政权的第二个任期内推进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外交政策成为可能。堂之胁光朗:《寻访太平洋的世纪——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外交时报》,第1172期,1980年3月,第6页。

[46]《大平总理的政策报告书4:环太平洋连带的构想》,第91-95页。

[47]《大平总理的政策报告书4:环太平洋连带的构想》,第17-24页。

[48]《大平先生的政治观与人物形象》,第332页。

[49]1966年4月,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部的讲演最全面地表现了他的外交思想。详细请参照大平正芳:《日本外交的坐标》,《春风秋雨》,鹿岛出版会,1966年,第161-204页。

[50]在当初的构想中,尽管未采用敌视苏联的政策,可是对苏联的态度却是很冷淡的。《大国日本的动摇》,第336页。

[51]在笔者对森田秘书进行专访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在大平的想法中,中国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一员。森田一专访,2006年9月11日。

[52]《关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1979年7月18日,第2页。

[53]《关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第4-5页。

[54]《亚洲太平洋连带构想》,第2、10页。

[55]《亚洲太平洋连带构想》,第13页。

[56]事实上,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曾对亚太地区主义表示过积极的姿态。在1998年,俄罗斯正式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

(田凯: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 责任编辑 郭定平)

日本社会公益组织与自然灾害治理

——基于阪神地震之后的考察

康晓强

内容提要 社会公益组织是自然灾害治理的重要主体。阪神地震为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提供了契机、条件、空间与展示平台。阪神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也从法律、财政等层面加大对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培育力度,力图建构一套有效的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比较和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对于建构我国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的激励结构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 社会公益组织 灾害 介入

日本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素有“地震之国”之称。在长期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日本基本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灾害治理体系。目前国内学者对日本灾害治理体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灾害救助的法律体系架构,其二是日本政府防灾救灾的组织体系与管理运作,其三是地震预报体系、房屋抗震标准等防范举措,其四是日本在平时对公众的防灾教育,其五是日本对灾民的专业心理疏导。^[1]本文试图从社会公益组织的视角切入自然灾害治理问题,从另一侧面考察日本自然灾害治理机制。

一、日本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的基本表征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以日本神户为中心的阪神地区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许多人尚在睡梦中就被倒塌的房屋压住或被大火吞噬。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万亿日元(当时约相当于1000亿美元),总损失达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1.5%,是日本战后遭遇的最大一场自然灾害。这次地震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各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而各地民众和非营利组织纷纷行动,总计有135万志愿者奔赴震区救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1995年被称为“日本志愿行动元年”。^[2]阪神地震为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提供了契机、条件、空间与展示平台。应当指明的是,在阪神地震之前,日本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并不显著。救灾都是自卫队、警察和消防队的工作,社会公益组织虽然也有所参与,但尚未很好地整合。阪神地震也为日后社会公益组织参与救灾提供了先例,社会公益组织以及一般市民作为志愿者参与救灾在此之后成了普遍现象,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形成了社会公益组织参与自然灾害治理的新模式。^[3]总体上来看,日本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救助空间方面,体现为国际化。这主要从NGO与NPO这两个概念在日本的不同含义体现出来。在日本,NGO通常用来指那些参与国际合作、对国外进行援助(主要是对第三

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活动领域在国外的“外向”型社会组织,如“日本国际合作 NGO 中心”(JANIC:The Japanese NG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而 NPO 主要指活动领域限于国内的社会组织。这两个词意义的细微差异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特征。灾害救援救助是日本 NGO 的主要活动领域之一。

日本 NGO 的主要活动领域

活动领域	活动内容
1、贫困救助、教育支援、社区发展	①教育支援:儿童教育、寄养资助、奖学金、学校建设、提供教材、识字教育、职业训练等;②医疗保健:营养补助、供水、医疗保健指导等;③农村社区发展:扶贫、社区发展、适用技术、小额信贷、草根支援、公正贸易等
2、关注全球环境问题	①全球环境问题:教育、倡导、政策建议;②植树绿化: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植树活动、防止沙漠化以及森林保护等
3、针对灾民、难民的紧急救援	①卢旺达难民救助;②阪神淡路地震灾民救助;③朝鲜饥民救济;④科索沃难民救助;⑤土耳其大地震难民救助;⑥台湾 921 地震灾民救助;⑦东帝汶难民救助
4、国内外人权救助、民主化支援	①人权:缔结儿童权利公约;②民主化支援
5、国内的全球市民教育等	成立发展教育协议会等 NGO

资料来源:王名、李勇、廖鸿、黄浩明编著:《日本非营利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第二,在救助时效方面,体现为高效化。在阪神地震发生后,最先赶到现场的不是政府人员而是社会公益组织与志愿者,这主要基于社会公益组织的性质与使命,而这与当时日本政府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地震发生的当天上午,首相及大臣们不是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是按照预定的程序召开例行内阁会议,内阁会议结束时,神戸市的长田区已是一片火海了。^[4]根据灾后兵库县医师会的统计,大地震使该县域内 224 家医疗机构不同程度倒塌。^[5]而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害救援中则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如 AMDA(亚洲医生联络协议会,成立于 1984 年)是第一批开展救援的社会公益组织,他们在地震发生 3 小时内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当天中午 12 点做出决定,由 3 名医生、2 名护士和 1 名药剂师组成首批救援医疗队。同日,由 3 名医生、1 名护士和 1 名医学院学生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出发。AMDA 在灾后 1 个月后完成自己的紧急救援使命撤出灾区。^[6]在这次赈灾中,还有许多像自然学校以及地区性 NPO 这样的社会公益组织最早加入了救灾队伍。这些社会公益组织很多不是以救灾为主业的,但是阪神地震发生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上的工作,纷纷奔赴现场。社会公益组织经常提到所谓的“社会使命”,这在灾害发生时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将援助的手伸向这一刻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社会公益组织相互间形成网络,协同作战,各自发挥所长,产生了较好的救援效果。阪神地震固然是个不幸,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它发生在 1995 年,在一个市民活动和公民意识相对成熟的年代。^[7]

迅速及时、灵活高效是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害救援救助方面的显著优势。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行政部门和政府机关毫无疑问负有责任,也拥有最大的资源和能力来承担救援救助任务。在阪神地震后,日本行政部门的行动缓慢引起了民众很大反感。当然,政府在解决自然灾害问题上也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条款,但是,当实际灾害发生时,最需要的是及时赶到现场救

助灾民,并且最快地将救援物资送到他们手上,这不是仅仅靠法律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实际的参与和介入。

第三,在救助取向方面,体现为对象化,即以灾区群众需求为导向。由于社会公益组织的服务更多地是通过志愿者提供,而且绝大多数是面对面的直接服务和重点服务,这就保证了灾害救助的效率与效益。在紧急状况发生时,政府在物资和人员的组织动员能力上固然是最强的。但是,当灾害较为持续地发生时,细致灵活地开展救援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地震后,有些老人由于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在精神上受到重创后去世。重大灾难会给现场人员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关切。数据显示,阪神大地震后的十年内,因孤独而死在临时住宅的老人达 560 人。⁸⁹为此,社会公益组织就为老人特设了心理咨询、治疗的服务,帮助他们稳定情绪。同时,还提供了按摩服务,减轻灾民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教孩子们做各种游戏,帮助他们忘记灾害的恐惧,找回笑容。在避难所建立问讯处,保证信息的公开,建立灾后重建咨询点,减轻灾民们对今后生活的担忧。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如社区服务、环境资源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扶贫、可持续生计、小额信贷、支教、老年人护理、儿童心理健康、残疾人关怀、孤老照顾、准备再育的遇难者家属抚慰等等。这些“软件上”的服务,都是社会公益组织的优势所在,也是灾民极其需要的。

第四,在救助深度方面,体现为拓展化,重在培育当地社会公益组织的自主成长。SVA(和平国际志愿者会,成立于 1981 年,致力于难民救助)在救援活动转入灾后重建阶段后及时调整救助方略,注重助人自助,以培育当地社会组织成长为发展取向。SVA 在 1996 年筹建了一个名为“春风会”的当地社区社会组织,派遣专门人员参与组织制度建构,协助开展项目活动。1996 年,SVA 推动成立了一个致力于街区重建的志愿者组织——街区交流事务局,派遣 1 名全职员工介入到该志愿者组织工作中。同时发动在棚区开展救助的约 30 家社会公益组织组成阪神地震灾棚区支援 NGO 联络会,向该联络会派遣 1 名全职员工指导工作,并与其它社会组织一道开展了多项针对棚区儿童救助的合作项目。⁹⁰实践证明:当地社会公益组织由于更了解地方情势与灾民需求,更容易培养社会信任与累积社会资本,因此更容易提升救助的质量与合法性。从更深层意义上看,也更有利于灾区社会重建与深度社会整合,从根本上提升灾后重建的质量。

第五,在救助资源方面,体现为信息化、合作化。灾害发生时,人在精神上容易陷入混乱,而信息的获得则能稳定人的情绪。这就需要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纷杂的信息整理出来,并客观而及时地传达出去。在阪神地震赈灾过程中,日本政府没有有效借助媒体平台快速传达灾区居民的需求信息,致使媒体最初的报道都集中在灾情信息方面,后来才转向为灾区居民提供生存、生活救助方面的信息。⁹¹而社会公益组织则非常关注灾区居民的需求,救助以需求为取向,体现了社会公益组织深切的人文关怀,也确保了救助的有效性。例如在地震救援中,日本社会公益组织自然学校除了工作人员会议以外,还坚持每天在志愿者中心定时召开四次全体会议,将灾区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传达给集中在这里的所有志愿者以及灾区群众。此外,还制作发行简易的“志愿者中心快报”,设立志愿者中心网站来加强信息的传达。网站一天的点击率超过了 5000 人次,快报则方便那些不擅长与志愿者打交道的灾民了解情况。与之相对应,阪神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也建立了灾害对策本部,并指定社会公益组织“社会福祉协议会”(简称社协)担任接待和管理志愿者的任务。

二、阪神地震后对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的支持体系

在阪神地震赈灾中,社会公益组织的介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在此后,日本政府也从法律、财政等层面加大对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培育力度,力图建构一套有效的社会公益组织介入灾害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不断完善、健全自然灾害治理法律框架结构。1947年颁布的《灾害救助法》是日本关于灾害紧急救援救助问题最早的法律。其宗旨是:当发生灾害时,国家要在地方公共团体、日本红十字会、其他团体及国民的协助下,进行应急的必要的救助,以此来保护受灾者和维护社会秩序。该法规定救灾工作由都道府知事来进行,市町村长要对此进行辅助,而红十字会必须对此进行协作。在整个灾害治理法律架构上,日本形成了以《灾害对策基本法》(1961年10月30日颁布实施)为轴心的法律法规体系。《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灾害预防、灾害紧急应对和灾后重建的根本大法,可以说是日本防灾减灾抗灾的“总宪章”,《防灾救灾宪法》和其他灾害治理法律法规均在这部“宪法”的基础上展开。该法规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的目的、灾害的定义、各级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灾救灾相关组织、防灾规划、防灾预防、灾害应急对策、灾后复旧、财政金融措施、灾害紧急事态、杂则、罚则等10大类117条法律条款,还包括历次修改用以说明的附则。颁布后,中央防灾会议根据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基于各种实际灾害应对时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多次对该基本法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目前已经修订了23次。值得一提的是,阪神地震后日本政府一年内对该基本法进行了两次修改。1995年6月的修改将消防、警察机关及自卫队的相关权限加以扩充,同年12月的修正内容包括对于紧急灾害对策本部的设置、自主防灾组织、义工防灾活动、地方自治团体间之救援协定等。其修改背后的基本价值逻辑是重视社会公益组织的社会功能,将社会公益组织力量吸纳进整个灾害治理体系中。应该说,这种修改是对阪神地震后社会公益组织表现的充分肯定,也是日本政府因应社会变迁与公众需求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

其二,从法律上对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合法定位,从而为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平台。早在1993年,随着日本经济社会发展而伴生的社会公益组织发展迅猛,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效应。社会公益组织社会影响面的拓展与社会影响力的提升需要在法律层面上予以保护、认可与支持,而当时日本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是一片空白。对社会公益组织进行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有许多社会公益组织也积极游说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如东京的市民活动推进法研究会、支持市民活动制度建设会、NPO研究论坛等,但成效并不明显。阪神地震赈灾中社会公益组织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媒体与社会的高度赞誉,政府也开始重视社会公益组织的立法问题。1995年2月3日,由经济企划厅牵头、18个省厅联合召开联席会议,正式将社会公益组织立法纳入议事日程。经过各方的积极努力,《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于1998年3月在参议院正式通过。

2002年,日本政府对《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进行修改,并于2003年5月开始实施修改后的新法。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简化社会组织的登记手续,二是扩大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动领域(由过去的12个领域扩展到17个领域),进一步为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制定为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提供了积极的法理支持,具体而言,又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了社会公益组

织的法人资格地位。该法第一条即规定,该法的目的在于“通过赋予从事特定非营利活动的团体法人资格等,促进以志愿者活动为主的、作为市民自由的社会贡献活动的特定非营利活动的健全发展,为增进公益作贡献”。另一方面,规定了特定非营利活动的 17 项活动领域,其中与灾害紧急救援相关的是灾害救援活动(第 6 项)以及国际援助活动(第 9 项),其它活动也与灾后生活重建有一定关联。

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领域

序号	活动领域
1	增进保健、医疗或福利的活动
2	促进社会教育的活动
3	促进城镇建设的活动
4	振兴学术、文化、艺术或体育的活动
5	保护环境的活动
6	灾害救援活动
7	地区安全活动
8	维护人权或推进和平的活动
9	国际援助活动
10	促进形成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活动
11	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活动
12	发展信息社会的活动
13	振兴科学技术的活动
14	搞活经济的活动
15	开发职业能力或扩充就业机会的活动
16	保护消费者的活动
17	从事前面各项所列活动的团体运营或有关活动的联系、顾问咨询或支持活动

资料来源:王名、李勇、廖鸿、黄浩明编著:《日本非营利组织》,第 278 页。

其三,对社会公益组织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日本对公益法人原则上是不课税的,仅对其收益事业(按照日本法人税法施行令第 5 条规定,收益事业涉及 33 个行业)收入课税。虽然对公益法人的收益事业课税,但其税率为 22%(营利法人的全部收益事业税率为 30%),且仅对公益法人收益事业收入的 80%部分课税,另外 20%部分不课税(将其“视同捐赠收入”转入非收入部分,用于公益事业支出)。对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原则上也不课税,仅对其在收益事业的 33 个行业中取得的收入课税,并且仅对收益事业收入中 800 万日元的部分,按照与公益法人一样的 22%的税率课税,对超过 800 万日元的部分适用与营利法人一样的 30%的税率。^[14]此外,“视同捐赠”只对经有关部门认定的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适用。^[15]这种在原则上非课税而对从事营利活动征收法人税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公益组织从事一定的经营活动谋取一定的经费来源,毕竟社会公益组织并非生活在社会“真空”之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税收公平原则,其政策导向效应十分明显。

其四,灾害治理关口前移,支持社会公益组织组织的防灾救灾宣传教育活动。日本政府

非常重视强化防灾救灾知识的普及教育以及防灾救灾演练,建立相关的协作、协调、协同体制支持社会公益组织的宣传教育活动。1982年5月由内阁做出决定,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8月30日到9月5日为“防灾周”,在此期间开展展览、媒体宣传、标语、讲演会、模拟体验等各种宣传普及活动。在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吸取以往经验教训,进一步重视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内阁决定将每年的1月17日定为“防灾和志愿者日”,1月15日至21日被定为“防灾和志愿者周”,全国各地都要进行由市民和消防队参加的地震演习,电视台也要播放防灾类节目,目的是让广大市民认识到灾害发生时志愿者活动和自主防灾的重要性。^[13]社会公益组织利用自身优势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在社会公益组织介入自然灾害治理方面的政策并非完美无缺。例如,阪神地震后,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非政府组织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但日本政府的態度却十分曖昧。法国、瑞士的救援队在地震当天就与日本政府联系表示愿意支援,可日本外务省表示同意的答复却是在3天之后,两救援队抵日已是在地震4天后,错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救世军”准备了一支250人的医疗队,并将医疗器械运往机场待命,结果却是1周后才获得日本政府的入境许可。^[14]救灾需要政府有效整合国内外的各种社会资源,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保护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日本政府在阪神地震后在救援救助机制方面的纰漏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经常遭受洪涝、台风、冰雹、地震等灾害的袭击,灾害给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中国在防灾、抗灾以及灾后救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较好地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但是,整个救灾工作,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救助机制还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救援救助中,已经出现了以社会公益组织为形式的民间社会救助力量,例如,以居住小区为纽带的业主委员会、以汽车俱乐部为纽带的志愿者、以“驴友”为纽带的志愿者、以无线电爱好者俱乐部为纽带的志愿者、以网友QQ群组成员为纽带的志愿者,还有以战友、朋友、老乡为纽带的志愿者等,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有救助意愿而力量、能力有限的普通老百姓,并且是临时性地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救灾活动。由于他们自身的行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很多人在自带的食物和饮水耗尽后反而成了需要得到救援的对象。

社会公益组织是推动现代社会发育、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基本性质决定了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基本使命与战略定位。其基本使命是与政府、公民一道为优质、优良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效力。其战略定位是提供软性服务,服务特需群体,培育公益文化,建构社会公平。在自然灾害治理中,社会公益组织应该而且能够提供必要、多元、殊异、有效的服务,但这种有效社会服务的供给需要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体系。实践证明:有效的机制结构体系对保障社会公益组织在自然灾害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具有根本性、保障性、战略性意义。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防灾救灾支持性法律架构。一个在法律系统支持下的社会公益组织灾害救援救助才是有效的、持久的。灾害救援救助法律法规具有重要功能导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法规明确规定社会公益组织在紧急状态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

么和禁止做什么,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二是有利于保障灾民能够及时地从社会公益组织获得救助,从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目前,我国防治灾害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5月9日公布)、《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06年1月10日公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2005年11月18日公布)、《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年2月11日公布)等。对鼓励与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灾害防救也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文件,如《民政部关于同意中华慈善总会下拨救灾捐赠款物的通知》(1998年8月31日发布)、《民政部关于同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拨救灾捐赠款物的通知》(1998年8月31日发布)、《民政部关于救灾募捐义演等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年9月3日发布)等。^[15]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在防灾救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我国自然灾害治理方面立法还刚起步,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如缺乏国家层面的灾害对策根本大法,现行的法律法规位阶还较低,没有综合防灾救灾的整合性战略框架结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合灾害防救的现状与趋势等。在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灾害防救方面虽然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文件,但还比较笼统,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合法定位以及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灾害防救的具体制度设计。

因此,加快这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建构起了一套完整、健全的自然灾害治理法律体系,目前灾害治理法律体系是在一次次灾害教训后经过反思、反复论证逐渐形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如1946年发生的8.0级南海地震,造成1443人死亡,促成了1947年《灾害救助法》的颁布。1959年发生的伊势湾台风,造成5098人死亡,促成了灾害管理基本大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在1961年的颁布实施。1995年日本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造成6435人死亡,这次大地震促使日本政府对其灾害治理体制进行反思,更是推动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1995年颁布)、《灾害对策基本法》(1995年6月和12月两次修订)、《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1995年修订)、《特定非常灾害灾民的权利保护等特别措施相关法》(1996年颁布)、《密集城市街区的减灾促进等相关法律》(1997年颁布)、《受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1998年颁布)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16]自然灾害推动日本防灾救灾制度化水平逐渐提升。希望2008年的汶川地震也能成为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一次契机。但这种契机不是现成的,需要广大实务工作者、学界人士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等一起努力。

第二,准确界定社会公益组织在自然灾害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准确界定社会公益组织在自然灾害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社会公益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从空间结构定位维度来分析,社会公益组织在整个自然灾害治理体系中位于“中间层”。这个空间结构定位决定了社会公益组织在自然灾害治理中的功能取向与功能定位。也就是说,社会公益组织所供给的服务不应与政府或公民个人提供的服务同构,而应具有异质性与差异性。这种异质性与差异性体现在:在需求满足上,社会公益组织所供给的服务不是满足一般、普遍的需求,而是应该满足软性化、人文化、个性化、特殊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需求;在关怀对象上,应该多关注边缘化、政府救助顾及不到或关照不够的社会群体;在基本使命方面,政府是救急救难但不济贫,而社会公益组织应注重运用发展性的救助项目助人自助,培养灾区群众可持续发展的愿望与能力;在动员机制方面,政府运用政治动员以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集聚各种社会

资源,而社会公益组织主要以社会动员的形式积聚资源。

第三,从救助立场取向维度来分析,社会公益组织应基于需求导向。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有时我们考虑问题、做事时出发点是良善的,但实践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在自然灾害救助中,也同样会存在类似问题。只有站在救助对象的立场、角度去考量问题才能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害救助中,应从救助对象的立场出发,以助人自助为战略基点,以关怀人的多元需求为关注焦点,积极与政府救助良性互动,在社会公共权力与社会个体权利间有效平衡,准确定位灾害救助的功能取向,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灾民生命财产、提升灾害救助绩效。社会公益组织应根据灾区群众实际需求设计目标明确、内容具体的服务项目,为了供给更优质的服务,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的能力运用于最急需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公益组织应更关注灾区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根据特殊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柔性化的关怀服务体系。

第四,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公益组织支持、培育力度。中国传统的自然灾害治理体制,主要采取单一的政府救助形式,回避社会力量参与。这种封闭的自然灾害治理体制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代烙印。当然,这种体制依托国家公共权力能快速有效地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由政府大包大揽的自然灾害治理体制,实际成效往往难以保证,公众的抗灾救灾能力也会弱化。相反,风险分担、多元主体的自然灾害治理体制则效果明显。事实上,自然灾害治理是一项具有开放性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自然灾害治理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但责任主体并非唯一的供给主体。政府需要而且也很有必要吸纳社会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当然在救灾中,最有公信力的仍然是政府,社会公益组织要建立自己的公信力、提升灾害治理的绩效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在自然灾害治理中,社会公益组织应以有序介入、有机组织、有效协调、有力援助为原则。

最后,加强社会公益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倡导建立专业性的灾害救援救助组织,招募有专业特长的社会志愿者从事灾害救援救助行动计划的教育、培训、出版和研究等活动。应急志愿者通过社区或一些专业机构进行技能培训,一旦需要,这些受过培训的人员就可以马上参加救援。另外,还应该在平时进行专业性的灾害救援救助宣传教育工作,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到灾害救援救助动员行动中来。

注释:

[1]参见戴志勇:《日本抗震救灾对汶川地震的启示》,《南方周末》,2008年5月14日;朱凤岚:《日本的地震灾后重建经验》,《华夏时报》,2008年5月24日;杨东:《日本的灾害对策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俞慰刚:《日本灾害处置的应急机制与常态管理》,《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袁艺:《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中国减灾》,2004年第11期;周强:《日本非营利组织发展简史》,《学会》,2007年第3期;方茜:《日本灾害管理之“防灾”》,《现代人才》,2008年第3期。

[2]Mitsuhiro Saotome, “Japan’s NGO Activities and Public Support System,” <http://www.fp.cj.jp/e/shiryu/jb/j9725.html>.

[3]参见 http://www.westwomen.org/xueshu/2008/0530/article_31.html.

[4]赵成根:《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5]若井晋等:《学习、未来、NGO》,东京新评论社,2001年,第168页,转引自王名、李勇、廖鸿、黄浩明编著:《日本非营利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下转第11页)

上海合作组织与日本的中亚能源战略

罗 田

内容提要 中亚的重要能源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处于大国合作竞争的复杂环境中,寻求有效的区域合作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课题。中亚在日本政治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能源战略构成了日本中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如何在已有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起开放的能源合作将是促进中亚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尝试,也将成为中日能源战略合作的新方式。

关键词 日本 中亚 上海合作组织 能源合作 能源战略

一、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亚能源合作

1、上海合作组织从军事到经济的转型

从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其发展历程不仅是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四国外交战略的新成就,而且也实现了由军事安全考虑到能源经济合作的转型。中亚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关键部位,曾被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视为“心脏地带”的一部分,第二亚欧大陆桥贯穿其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亚各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其一方面需要以俄罗斯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发展依托,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的广阔市场。中俄两个大国不仅地理位置毗邻,有着对地区安全合作共同的高层次追求,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于俄罗斯而言,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还是不得不面对实力衰退的尴尬局面,而中国正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是能否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的关键。简而言之,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符合区域内各国利益的必然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重点并不在于开展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而是着力于解决相关国家的边界问题。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会议”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因而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如果没有经济作为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终将难以克服其仅靠政治安全为纽带的脆弱性。因此,上海合作组织以安全合作为先导,先着力解决安全问题,结伴而不结盟,然后积极推动经济合作,力争最终实现区域的整体发展。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因而只有上海合作组织同时具备了健全的经济和安全功能,才能促进成员国社会经济的成功转型。各个成员国也只有切实加强相互之间的多边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相互依存关系,才能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后续的机制化建设提供更为完善的条件。

在1998年“上海五国”元首阿拉木图会晤期间,哈萨克斯坦总统最先提出促进五国间经济合作的必要性问题。^[1]2003年,温家宝总理提出将上海合作组织建成自由贸易区的观点。这

是中国逐渐由单纯的国际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向积极的制度建设者进行身份转变的表现之一。与朝核六方会谈、博鳌亚洲论坛相类似,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中国力图建立一个“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环境而做出的系列努力的表现,是中国对外战略巨大转变的生动反映。自普金执政以来,俄罗斯外交体现出明显的务实色彩,强调发展经济和对外经济合作。因而如何处理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也是俄罗斯从发展自身经济出发的着眼点。而对于处于转型之中的中亚国家而言,在效仿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后,既没有得到西方国家承诺的东西,自身的落后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痛定思痛使中亚各国将目光投向与之相邻的中国,这不仅有助于为其创造安定的周边环境,而且还可以通过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通过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经济合作,引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加速发展本国经济。由此可见,上海合作组织提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基本汇集点。

2、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合作现状

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持续增加,能源缺口不断拉大,能源安全与能源进口多元化越来越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中国与中亚各国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长远意义。

2003 年 3 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建成肯基亚克 - 阿特劳段输油管道。三个月后,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肯基亚克 - 独山子输油管道建设协议,这一输油管道起点为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肯基亚克,途经阿塔苏、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终点为中国新疆的独山子,全长 2584 公里。管道全线预计输油能力为 2000 万吨 / 年。2006 年 5 月 25 日,该项目完成一期工程——阿塔苏 - 独山子段建成输油,从而使中国首次实现以管道方式从境外进口原油。到 2008 年年底,肯基亚克 - 独山子输油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 1252 万多吨。

2009 年 6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叶卡捷琳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 100 亿美元信贷支持,得到了各成员国的高度评价。2009 年 9 月 23 日,新疆广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 TBM 公司在乌鲁木齐签订了《收购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区项目交割备忘录》及《供气协议》。新疆广汇公司将与哈萨克斯坦 TBM 公司合作开发哈萨克斯坦东哈州斋桑区 8300 平方公里的油气区块,对已勘探的 300 平方公里区域发现的 1 亿吨稠油和 128 亿立方天然气资源进行勘探开发。

除了在石油能源方面的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还积极发展非石油能源项目。谢米兹拜伊铀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就是中哈在核能领域的重大合作项目。2009 年 5 月,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首个铀资源项目正式开工。这也是中哈合作开采的第一个铀矿,标志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核能领域的战略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除哈萨克斯坦外,中广核集团还积极参与乌兹别克斯坦的铀资源开发工作,与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等世界知名能源企业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一系列铀资源合作开发协议。

中国与中亚各国在能源资源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能源合作项目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如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利用能源合作带动其他经贸合作项目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课题。由于能源合作项目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等特点,并直接与国家战略利益相联系,因此区域合作的多边机制将是主要的合作形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强信息沟通交流,联合利益可以共享的资源需求

国,实现能源项目的合作将是实现中国在中亚能源战略的有效途径。

二、日本的中亚战略与能源合作实践

1、日本的中亚战略

从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起,日本就与其确立了外交关系。然而日本与中亚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经历了几个战略转折点。一开始,日本对中亚国家并不重视,对中亚这些前苏联国家的经济援助也是迫于法国和德国的压力才履行的。然而随着中亚地区的能源战略地位凸显,日本对能源的依赖和需求日益增加,如何通过能源进口多样化战略而降低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成为日本能源安全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此外,在与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也试图寻求中亚地区的谅解,使其成为牵制俄罗斯的力量。“日本官方曾承认,其援助中亚的一个目的就是向俄罗斯发出信号,只要俄罗斯归还日本领土,日本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资金”。¹²而对于中亚诸国来说,日本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予了大量援助,积极参与中亚国家里海石油的开采,在区域合作中帮助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政治上也是较之于欧美更宽容的互信伙伴,支持各国独立的政治立场,对于其“威权体制”的态度也相对温和。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日本在中亚树立了比较良好的国家形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与中亚关系的发展也是经历了“蛰伏期”、“复苏期”、“升温期”三个不同的阶段。下面就日本在与中亚各国关系发展中的几个亮点作一梳理,以期描绘出日本中亚战略的大致发展轮廓。

(1)“中亚+日本”合作计划

“中亚+日本”外长会议机制是日本与中亚诸国加强联系、拓展日本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平台。从2004年8月第一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成功召开以来,日本与中亚的关系迅速推进,可以将其看作日本对中亚战略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中亚与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接触。直到1997年7月24日,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了“欧亚大陆外交”战略,中亚因为其“新丝绸之路地区”的重要地缘战略位置才被日本重视,这成为此后日本中亚政策的基础。尽管如此,在1997年至2004年间,日本尚未制定明确的中亚战略。在此阶段,日本仍然视中亚为一个由欧亚大陆主要大国所包围的地区,因此,日本不愿意因为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危及日本与俄、中等国家的友好关系¹³。

“中亚+日本”机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对中亚地区战略计划的第一个高峰期。2006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通过了以政治对话、区域合作、经济振兴、知识对话、文化及人员交流等5个领域为核心的“行动计划”。日本的中亚战略越来越清晰,并且逐渐具有可操作性。同年8月29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15周年纪念日这一隆重节日前夕访乌,并发表了《乌日共同声明》,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¹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态度。

(2)“自由和繁荣的彩虹”

“自由和繁荣的彩虹”的概念是由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于2006年11月30日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出来的。在首先肯定了美日同盟关系的基础地位,要求强化与中、韩、俄等近邻各国关系之后,他提出“要为日本外交再加上一个新方式”。他强调说,

“在欧亚大陆的周边,成长着新兴民主主义国家。将这些国家连接成带状。我认为要打造自由、繁荣的彩虹就必须这样做”。“自由和繁荣的彩虹”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之前日本中亚战略进一步清晰化、具体化的表现,其意义更在于日本给出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角色定位。“在从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然后是从中、东欧到巴尔干各国延伸下来的‘自由和繁荣的弧形地区’,日本今后将担任开始行进没有终点的‘马拉松’的各民主主义国家的领跑员……成为日本这样的大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什么事件都不会与日本无关”。^[5]这清晰地表明了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是从内敛式的“中亚+日本”模式发展到了具有外溢性的地区安排,意味着日本将以更积极和希望有所为的姿态参与中亚地区事务。

从日本在中亚的能源战略发展来看,具备了以下特点:

第一,合作领域的宽泛性和价值导向性。日本与中亚地区的合作领域覆盖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学术到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并将“政治对话”、“区域内合作”、“商业促进”、“学术交流”、“文化及人与人交流”作为“中亚+日本”对话机制的五个重要支柱。其合作除了涉及到诸多领域之外,还带有明显的价值导向性,即强调了双方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消除恐怖主义、保护人权等方面具有的共同利益。而这一点也是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将日本看作民主楷模而颇具好感的原因。

第二,地理范围上的向外扩散性。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是要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包含了中亚各国,扩展到欧洲的权力体系。从1997年桥本龙太郎提出的“欧亚大陆外交”到2006年麻生的“自由和繁荣的彩虹”再到“欧亚互动倡议”都明显地体现出日本试图将欧洲的力量纳入到中亚地区。随着日本的战略关注重心和能源安全考虑日益关注中亚,日本开始逐步加强与中亚的联系。而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肇始于1996年的上海五国机制,并经过五年的发展形成了从安全合作到经济合作都相对成熟的上海合作组织,因而日本作为一个后来者,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架构并不真心地融入,而一直试图另外搭建一个囊括欧洲(包括与欧盟、北约的合作)的更广泛的平台。这也是日本希望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体现。

2、日本在中亚的能源合作实践

能源战略考虑是促使日本密切与中亚高层互访、增加经济投资援助和提升中亚在日本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因素。因而,日本在中亚的能源战略是随着日本中亚整体战略的演进而进行调整的。

从下表可以看出日本石油资源十分匮乏,对外依存度极高。一直以来,中东地区是日本石油资源的主要进口地,占到日本石油进口总额的80%。然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以及实现日本大国化战略的目标都需要日本在能源进口方面实现多元化。因而,除中东之外,中亚日益成为日本的“重要利益地带”。^[6]尤其是在储量增长值和未发现储量两个指标上,除了中东地区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外,前苏联地区(中亚)位居第二,未来开发潜力巨大,自然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6月1日在第二次“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前夕所讲的,“(中亚)这一地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在欧佩克出事时可作为依赖石油的日本的缓冲地带”^[7]为此,日本做出积极姿态,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科技文化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

表 1 世界石油资源评估 (1995-2025)^①单位:10⁹桶

地区和国家	已探明储量	储量增长值	未发现储量	合 计
工业化国家				
美国	22.7	76.0	83.0	181.7
加拿大	178.9	12.5	32.6	224.0
墨西哥	15.7	25.6	45.8	87.1
日本	0.1	0.1	0.3	0.5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3.6	2.7	5.9	12.1
西欧	18.2	19.3	34.6	72.1
欧亚大陆				
前苏联	78.0	137.7	170.8	386.5
东欧	1.4	1.5	1.4	4.2
中国	18.3	19.6	14.6	52.5
发展中国家				
中南美洲	98.8	90.8	125.3	314.9
印度	5.4	3.8	6.8	16.0
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	11.0	14.6	23.9	49.5
非洲	87.0	73.5	124.7	285.2
中东	726.8	252.5	269.2	1248.5
合计	1265.8	730.1	938.9	2934.8
欧佩克	869.5	395.6	400.5	1665.6
非欧佩克	396.3	334.6	538.4	1269.2

注:资源量包括原油(包括油矿凝液)和天然气液化后的产物。

2006年6月,在第二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上,日本提出计划,与哈、吉、塔、乌四国合作,修建一条从中亚途径阿富汗通往印度的公路,借印度在印度洋的港口,更方便地出口中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2006年8月,小泉纯一郎首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07年4月,安倍晋三和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分别率领两个大型企业代表团访问中东产油国哈萨克斯坦,展开了新一轮的能源外交。

三、探索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日本在中亚能源领域的合作

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建立了接触和联系机制,而日本也在建设通往印度出海口的能源通道等问题上需要阿富汗的合作。同期,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开发银行所创建的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接纳阿富汗为成员国。可以说,上述各国在发展地区经济、促进中亚能源出口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是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

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发展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能源、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是其务实外交的体现,是符合中亚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在中亚各国看来,“中亚+日本”对话机制是与上海合作组织互补的。日本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和开展经济合作能够在经济领域促进中亚各

国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则在反恐、防范极端民族主义等有组织暴力犯罪方面提供了安全保障。当然,由于中国和日本对中亚在能源方面有着相似的利益诉求,并且在一些合作领域内的功能定位重叠,因而“中亚+日本”合作计划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并非毫无利益冲突。但这种利益冲突至少在目前阶段还不明显。冲突的激化不利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长远发展,保持冲突的可控性对于各国而言都很重要。在能源合作领域,日本要获得中亚的能源资源其运输路径必须经过中俄,而中国是日本通向中亚地区的最短路径。因此,从地缘意义而言,中国在日本的中亚能源战略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另外,由于中亚国家存在着不同范围和层面上的地区性合作机制,因而一个新的合作机制的确立并不具有影响整个地区力量平衡的绝对力量。实现中亚地区平衡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在现有的合作架构下将新的对话合作机制纳入其中,这就要求建立起一个开放的合作框架。

日本学者岩下明裕在《上海合作组织与日本:一起行动重新构建欧亚共同体》一文中指出,日本在重新构筑上海合作组织方面具有五个优势:(1)对中亚地区的介入不带有政治色彩;(2)同观察员国保持着“全面的良好联系”;(3)同俄罗斯和中国均有“战略性相互诉求”;(4)同美国的盟友关系;(5)面向西方的“亚洲之门”。

在其“欧亚互动倡议”中,他详细地提出了五种合作的方式:

- * 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第 14 款:成为“对话伙伴”而非“观察员国”;
- * 在峰会上启动一个特别的“嘉宾”(如阿富汗);
- * 峰会前互动:如日本外相在 2008 年峰会前访问杜尚别;
- *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α ”模式,从“嘉宾”转为“伙伴”,例如上海合作组织+3(欧盟、美国、日本)、上海合作组织地区论坛等模式;
- * 上海合作组织同其他地区性组织的合作,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其他有关重建欧亚安全共同体的组织。^[1]

岩下明裕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具有较高的声望,能够有效地预防同西方的潜在冲突,加强全球支持下的正面的机构性区域合作。他提出,应通过“上海合作组织+ α ”的框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上海合作组织,并明确表示了日本将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中承担责任。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亚+日本”对话机制并不具备上海合作组织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上海合作组织是在成员国出于解决边境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现实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合作,并且实现了从政治安全到经济合作领域的发展。而日本对于中亚地区而言,除了经济技术援助方面的优势外,对于中亚可投入的资源并不充足,与中亚的密切联系也是随着近期对中亚能源战略的制定而加强的。因此,“中亚+日本”对话机制应该更多地作为对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合作功能的有益补充,而不是试图取代后者。对于日本来说,在开放透明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架构下,在能源合作领域加强与中国和中亚各国的互信沟通,为中亚地区的能源、经济、安全做出贡献将是有益的探索,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

注释:

[1] 郑雪平:《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2] Ahmed Rashid, “No Smoke Scree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56, No.50, Dec.16, 1993.

(下转第 71 页)

浅析战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政策

徐亮亮

内容提要 日本自卫队作为战后一支在“和平宪法”下建立起来的“专守防卫”的军事力量,时至今日,其海外派遣却早已经挣脱了宪法第9条的限制。在日本国内相关立法的支撑下,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已成为既成事实。针对这一现象,在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成为日本执政党的新形势下,回顾日本战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政策演变与历程,探究日本致力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背后原因,有助于国际社会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这一现象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日本自卫队 海外派遣 和平宪法

2009年9月16日,由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新一届内阁正式成立。9月17日,新任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首次内阁记者会上重申,民主党政府将在2010年1月后从印度洋上撤回自卫队舰艇^①。鉴于之前的自民党政府已经多次延长自卫队在印度洋的驻留期限,这一声明传递出的讯息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了日本新政府在自卫队海外派遣问题上的一丝变化。但是,北泽同时也表示,关于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的代替方案,将在政府内部进行协商,希望能够满足做出国际贡献的需要^②。这就意味着日本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并不会因为内阁更迭而停下脚步,只是在派遣方式上进行改革,使其更为“满足做出国际贡献的需要”,这也为自卫队今后重返印度洋留下了回旋余地。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民主党内阁与自民党内阁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积极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相关举动由来已久,善于利用国际政治契机为自卫队海外发展松绑是日本政府的一项惯用策略。在新旧内阁交替的今日,为了把握自卫队的海外派遣的未来走势,就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战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政策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一次系统的回顾。

一、战后自卫队海外派遣政策的演变

1、冷战期间:基本恪守不派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了《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的第9条中写道:“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③由于它明确表示与战争诀别,所以该宪法被人们称为“和平宪法”。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巩固美军的后方基地并对其予以支持,美军占领当局指示日本政

府建立警察预备队,日本就此获得了重整军备的时机。1954年6月2日日本参议院在通过旨在建立自卫队的“防卫二法”^[6]的同时,通过了禁止自卫队向海外出动的如下决议:“本院在自卫队创立之际,按照现行宪法的条文和我国国民的炽烈的爱好和平精神,在此重新确认自卫队不向海外出动。”^[7]

虽然这一时期不乏自卫队向海外派遣的机会^[8],但是战后历届日本内阁由于考虑到在“和平宪法”、《自卫队法》框架下海外派兵的敏感性,顾虑由此可能引发的国内反对和国际压力,长时间恪守了“不向海外出动”的原则。

冷战结束前夕,海湾危机中日本为多国部队提供130多亿美元却换来“只出钱不流血和汗”的指责,使得日本政府意识到只有综合了经济、政治、军事多方面的贡献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国的“国际贡献”。为此,日本政府开始制订《联合国维持和平合作法》,试图派军事人员参加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但是受到日本国内抵制,未获国会通过。1991年4月24日,日本政府绕开国会,以政府令的形式决定向波斯湾派遣6艘扫雷艇和400名自卫队员,协助多国部队消除水雷,开创了日本自卫队战后首次向海外派遣的先例。

2、冷战结束后的海外派遣发展期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国际形势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开始在维和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早在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的首部《外交蓝皮书》中就提出了包括“以联合国为中心”在内的“外交三原则”^[9],因此,日本一直寄望于为发挥出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创造条件。但是直到“911事件”之前,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基本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其内容也以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灾害救援行动^[10]为主。

1992年6月,日本国会最终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法”),与此同时,允许自卫队参加国际紧急援助的《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修正案》也获得通过。尽管PKO法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宣布暂时冻结维和行动主体业务(PKF)^[11],并规定以“PKO五原则”^[12]为日本参加PKO的前提,但是自卫队毕竟正式取得了海外派遣的通行证,此后,对联合国PKO的参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进入到空前的发展时期。^[13]依此法案,1992年10月,日本政府首先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至2001年9月,日本政府又先后向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东帝汶等地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救援行动。

3、“911事件”之后的海外派遣

2001年以来,以“911事件”为转机,虽然日本仍然参与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活动,但是这一时期的自卫队海外派遣政策开始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日美同盟下的双边性质,军事色彩逐渐加重。

“911事件”发生后,日本国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提出并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法案,为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法律依据。根据上述法案,2001年11月9日,日本政府派遣3艘军舰和700名自卫队员开赴印度洋,支援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作战行动,开创了战后日本历史上首次在战时出兵的先例。《反恐特别措施法》多次延期至今,使得日本自卫队事实上成为了印度洋上一支长期存在的军事力量。2001年12月,以参加阿富汗维和行动为契机,《PKF主体业务冻结协议》被解除,从而使自卫队能够参与联合国PKO主体任务。

2003年7月,为支援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重建活动,日本国会通过了《伊拉克重建特别

措施法》。该法案规定自卫队的活动区域将是“确认为不发生战斗的地区”^[12]，然而当时伊拉克国内对美军的袭击活动一直未断，所以这实际上是战后日本首次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将自卫队派往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海外地区。

2004年5月20日，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支援美军活动法案》等“有事法制”七法案^[13]，使“有事法制”的范围大幅度拓宽，为日本的军事行动、特别是海外军事行动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对“有事”时自卫队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做出了规定。

二、自卫队海外派遣：与“和平宪法”的矛盾

自卫队海外派遣之所以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需要被关注和讨论，就是因为它与“和平宪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宪法第9条的确立一开始就是日本政府在冷战国际体制约束下，为了保全天皇制、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时再军备的一种策略大于理念的选择，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修改“和平宪法”、重整武装的声音。自卫队的地位和活动范围则是修宪主张中的重要一环。

“和平宪法”第9条的逻辑结论是：不得超出本国自卫的范围去行使武力。从这一逻辑结论出发可以引申出两个基本原则：专守防卫原则^[14]和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15]。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沿袭“和平宪法”的精神，自卫队的军事活动空间局限于日本本土，“不向海外派兵”原则成为“专守防卫”的一个具体体现。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增强，和平主义势力及思潮减弱，日本在海外派兵上不断制造既成事实和新的先例，然后把其逐一写入新的法律，造成了与宪法的持续紧张局面。海外派遣成为宪法第9条被逐步架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反过来说，宪法第9条的逐渐虚位化，则将最终为实现自卫队自由地向海外派遣解除法理上的最后一道桎梏。

1、对“专守防卫”原则的挑战

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舰队前往海湾的举动，使得自卫队活动空间只限于日本本土的地理限制首先被突破。

1992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正式从法律上为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扫清了障碍，迈出了突破宪法第9条的第一步，从此只要是在参与联合国PKO行动的名义下，自卫队就可以合法地实现海外派遣。

不采取攻击性态势是专守防卫原则的另一个应有之义。然而第二次朝核危机后，日本国内大肆渲染“朝鲜威胁论”。2003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参与境外军事行动的自主权，赋予日本可以根据自己对事态的预测和判断，先行发动攻击以解除“潜在威胁”的权利。如此一来，“有事法制”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和平宪法“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精神，表明日本标榜奉行的“专守防卫”的防卫原则正走向主动遏制阶段。

2004年日本政府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将“主动积极地实施国际和平协作活动”作为实现日本安全的手段之一^[16]，意味着自卫队的国际军事活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而2006年12月，修订后的《自卫队法》规定，“参加有助于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活动”成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之一^[17]，则是上述安全战略的又一立法实践。

时至 2009 年,由于索马里海域海盗行为猖獗困扰各国,联合国安理会 2008 年 12 月 16 日一致通过第 1851 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 12 个月内可以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决议呼吁有能力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部署海军舰只和军用飞机等手段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18]。在这一背景下,依据《自卫队法》中有关“海上警备行动”的条文^[19],时任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下令派遣海上自卫队两艘驱逐舰赶赴索马里海域,为日本商船提供护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舰首次在海外担负海上护航和警备行动。但是根据“海上警备行动”,护航舰船活动范围仅限于日本领海及其周边海域,自卫队所能采取的行动仅限于保护与日本相关的船只^[20]。此外,在武力行使方面,自卫队只能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情况下,才获准使用武器^[21]。因此,为了摆脱上述约束,2009 年 6 月 19 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了《应对海盗法》。相比“海上警备行动”,《应对海盗法》在派兵程序、护卫对象、武力使用等方面有实质性突破^[22]。

在派兵程序上,这一法律规定,在公海或日本领海上发生的海盗行为主要由海上保安厅负责处理。但如果防卫大臣认为海盗威胁超出海上保安厅的应对能力,就能在获取首相认可后下令派遣自卫队,但是在海盗行为需要紧急应对情况下,只要将必要的行动概要通知首相即可。其次,根据新法案,自卫队舰船护航对象扩大到与日本无关的外国船只^[23]。再次,新法案放宽了自卫队在海外使用武器问题上的限制,赋予了自卫队能对拦截未果的海盗船只发动攻击的权力^[24]。这一次自卫队借打击海盗之名,获得了主动出击的法律依据。“专守防卫”原则再一次被架空。

2、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的挑战

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事实上是“专守防卫”原则的一个逻辑衍生,专守防卫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限制着日本作为美国盟友参与海外派兵行动。但日本鹰派势力一直寻求突破专守防卫束缚,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并把“维护日美同盟论”和“国际军事贡献论”作为理论根据。伴随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进程,日本自卫队开始“借船出海”,从参加联合国维和领域扩展至介入“周边事态”领域。

1997 年 9 月,日美两国公布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规定日本对美军行动的“后方地区支援”^[25]以及面对“周边事态”^[26]时的相互支援措施。为落实“新指针”所规定的具体内容,1999 年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新指针”相关法案,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为日美同盟的强化完善了法律依据。令人忧虑的是,现代战争中的后方与前方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当美军根据日方提供的情报确定攻击目标并实施打击时,日本实际上就等于卷入了冲突”^[27],日本所谓的“后方支援”无疑会被自动卷入战争,由此会造成自卫队在本土未受到武力攻击情况下,在“周边地区”与美军共同作战、参与地区冲突,这就为日本政府突破有关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埋下了伏笔。

“911”事件之后,加强反恐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日本以“援美反恐”为名,在脱离专守防卫轨道、走向海外派兵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如果说 PKO 派兵还仅仅是支援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那么 2001 年 11 月,根据《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反恐三法”的派兵,则是因盟国遭

到了袭击。但在这个事件中,日本自身的安全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而且事态远离日本本土及其“周边地区”。2003年7月《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通过后,日本向伊拉克派遣人数约为1000人的自卫队,则是日本冒着伊拉克战场的零星作战还未完全停息的风险,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和当事国认可的情况下,单纯应美国的要求将自卫队派往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地区执行任务,具有强烈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意味。上述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冷战后日美安保机制已经俨然凌驾于“和平宪法”之上,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派遣政策和防卫政策上的种种突破,恰恰是在日美安保机制而不是“和平宪法”框架内实现的。

这样,日本通过长期以来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巧妙利用,通过一系列立法手段,循序渐进地使得自卫队在行使武力的时机、范围、防卫范围上均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削弱了“和平宪法”尤其是其第9条。时至今日,其海外派兵已呈常态发展态势,且境外实战能力得到提升。由于自卫队军事力量创建和壮大的过程本身是在国会通过正式的手续、得到多数赞成之后以法律的形式设置的,是“合法”的,另一方面自卫队的海外派兵又在事实上违反了宪法,这就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违宪且合法”的现实^[28]。

三、推动自卫队海外派遣的三个维度

如果说自卫队的海外派遣一开始可能被日本国内主张修宪势力当做一块修宪的探路石的话,那么在“和平宪法”第9条逐步被虚位化的过程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遣持续进行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总体来说有以下三个维度。

1、以联合国为舞台的大国战略

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使得日本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强大使得想要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意识。199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写道:“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应发挥的作用已不限于经济方面,而是扩大到了政治方面和全球问题。”^[29]作为战后世界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则是日本实践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舞台。

冷战期间由于两大阵营的对峙尤其是作为美国盟友的身份限制,日本尽管将“联合国中心主义”奉为外交三原则之一,但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不可能实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越来越意识到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中多国协调的作用,于是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发挥积极政治作用、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一环。然而尽管多次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30],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31]至今仍未被取消,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国内部对于安理会改革以及联合国改革的意见远未统一,再加上日本国内美化二战日军罪行、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风潮不时抬头,让日本通过“争常”来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至少在近期内变得十分困难。因此,日本在不放弃“争常”最终目标的条件下,寄希望于通过更多的国际贡献和国际参与,积累实绩,争取舆论。

日本外务省提出的2009年重点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中有有关国际贡献的描述,其中提到,“致力于旨在维护日本安全和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国际合作,如有关PKO以及反恐的国际和平合作,和平建设领域的人才培养,人类安全保障领域的推进,以及大规模灾害的应对等”^[32]。以往日本凭借实行政府开发援助(ODA)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日本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发

展等领域,而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将使日本在政治、军事领域扩大影响力。

然而由于“PKO 五原则”的约束,自卫队在执行维和任务的大多数情况下行动受限很大。如果能够扩大自卫队行动的横向与纵向范围,就能更完整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样既能体现国际贡献,从而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多的发言权,又能在远离本土的事态发展到对日本构成威胁之时,获得主动。这与日本安全的两大目标之一“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使威胁不会波及日本”^[33]是统一的。

除了增加“国际贡献”,日本的大国战略还体现在谋求对美关系平等化上。《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的通过,在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同时,其实也跳出了日美安保体制,以联合国的多边协调机制为轴。这一策略,在打破日美双边合作常规的同时,为日本实现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对等化找到了一个逐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新模式。因此,“PKO 法”的另一个潜在意义在于使日本能够在联合国的要求下,绕过美国的军事指挥系统,独立作出直接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决定^[34]。为了成为政治军事大国,逐步摆脱美国“附庸”的传统形象,上文叙述中提到的日本为实现海外派遣而积极进行的专门立法和外交行动就成了一种逻辑的必然。而日本防卫厅在 2007 年升级为防卫省,则在国内机构设置层面上为未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铺平了道路。

2、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对日本外交而言,其外交三原则之间自始便蕴涵着内在矛盾。在大部分外交实践中,“与自由主义世界各国的协调”尤其是与美国的协调始终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1957 年的国防基本方针规定,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国防基调,这一基调并未因为时间的推进而削弱,反而通过后续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合作协议而得到强化。通过上文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美国处于自身战略考虑,对于日本扩大军事力量,走向海外发展的举动采取默许甚至是怂恿的态度,日本在美国看来是可以利用、并为其日益力不从心的全球战略所服务的一颗棋子。但是由于日本实力的增强,“自主外交”在许多场合被提起,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美国成为了日本用来解释其自我松绑,谋求外交在更宽广领域里发展的一颗棋子。

“对美协调”已然成为了日本自卫队突破“和平宪法”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借口。除去日本派自卫队协助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之外,日美两国还不定期、非惯例地在美国本土或日本以外的其他地区举行各种联合军事演习,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不仅仅造成了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海外化趋势,还从事实上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境外实战能力。在冷战固有思维的影响下,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而扩大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增强日本自卫队联合海外作战能力,能起到遏制中国、分担美军战略负担、联合应对周边地区甚至全球“有事”的效果。所以,在台海地区局势仍然是未定之天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会继续出于战略考虑而借重日本,日本也不会坐失形势良机。虽然鸠山由纪夫在竞选时提出将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与美国建立“对等关系”,隐含着日美关系今后将可能出现的调整,但是从新防卫大臣北川俊美在阁僚记者会所做的“民主党认为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防卫的主轴”^[35]的表态中可以推断,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将仍然受到“日美同盟”的重大影响。

3、国际安全新形势下保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需要

客观来说,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并不总是在战略意图和日美同盟的掩饰下进行的,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政策合理性。

2004年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为了说明有关日本防卫力量整建、维持和运用的基本事项,分析了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该大纲认为新的国际形势下,新的威胁和多种事态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紧迫的课题,不易威慑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成为影响安全环境的重大因素,而像联合国和红十字会这样的“软目标”也会成为攻击对象。因此在这种安全环境中,日本认为,军事组织将扮演更广泛的角色,被积极用于预防冲突和复兴失败国家等各种目的。另外,日本自身的实际处境也使得确保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以派军舰前往索马里为例。从地理上看,被索马里和也门环抱的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航船经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洋的门户,航运地位十分重要,也正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的地方。据统计,2007年日本约90%的原油进口都来自中东地区^[36],而这一运输路线由于要经过亚丁湾海域,免不了频频遭受海盗侵袭之苦。2008年1月至12月,亚丁湾共发生了12起与日本企业有关的遇袭事件,其中有5艘船只被海盗劫持^[37]。在联合国授权世界各国采取“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派遣各自的海军舰队前往索马里海域参与护航,身处这一国际背景之下,日本派出海上自卫队保卫其海上运输线安全的出发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联合国1851号决议“鼓励在索马里沿岸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所有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制,作为国家、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就打击索马里沿岸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一切方面相互沟通的联络点”。早先的“海上警备行动”条文仅仅局限于保护日本船只,可以预料,即使日本没有通过《应对海盗法》,现实护航中随之而来的“见死不救”的道德压力也会使得对于现存法律某种形式的修改成为可能。事实上在《应对海盗法》通过之前,海上自卫队期间已经通过“探照灯照射、用远程声波设备发出大音量等方式赶走了可疑船只”^[38],6度救援了护卫对象之外的外国船只。所以说,《应对海盗法》的通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在分析法案通过后将造成的影响上,各大媒体尤其是中国媒体表示出了巨大的担忧,但是如果能客观看待日本作出这一决策的内在诉求,或许可以启示国际社会调整对日本接触的策略,将自卫队的海外派遣行动采取一分为二的对待,获得日本国内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综合上述三个推动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原因,可以列出影响其未来发展势头的三个维度:即日本对联合国的认同程度、日美同盟的走向、日本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契合程度,这三个维度的合力,将决定自卫队海外化的方向与深度。

四、结 语

近年来虽然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派遣上获得了不少突破,但是,应该看到,这一过程也遭到了来自革新势力的抵制^[39],尽管这些努力并未成功阻止自卫队向海外调动,但也激发了日本国内对于自卫队海外调动问题的关注与警惕。另一方面,“PKO五原则”等法案对于自卫队海外派遣的约束力仍然在发挥作用^[40]。再者,与近年来急于寻求突破的自民党相比,防卫政策主张总体偏中左的民主党执政之后,日本的安保政策总体将趋于缓和、渐进、协调。所以未来日本想要实现畅行无阻地向海外派兵,除了面临着诸多法律和道义上的障碍之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结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应当承认战后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在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求助、紧急救援领域做出

了切实的贡献。但是,由于日本为亚洲邻国所不信任以及外交上以美为重的现实,让世人对自卫队的动向更多的是采取怀疑而不是欣然的态度。

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的确立使得日本成为了“和平国家”,并长期享受着和平环境带来的经济繁荣。然而国力的提升使得日本的大国意识抬头,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继出现了“政治大国论”、“普通国家论”、“民生大国论”等理论,都是不满足于仅仅是“经济大国”的意愿表达,而战后的自卫队海外派遣可以被视作是尝试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追求“普通国家化”和“政治大国”的重要表现。

因此,自卫队海外派遣的最终命运,归根结底将与日本在21世纪的自我定位息息相关。在“和平宪法”为日本带来的国际声誉与经济红利逐渐减少的时代,日本能否坚持走“和平国家”路线,抑或是在走向“普通国家”的同时,以在全球环境保护、国际经济开发与援助等非军事的领域为“国际贡献”的重点,将最终决定日本能否在国际上重塑“和平国家”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注释:

[1]《日民主党党首主张从印度洋撤回海上自卫队》,新华网,2009年7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30/content_11794792.htm。

[2]《日本新防卫大臣重申将从印度洋撤兵》,人民网,2009年9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070560.html>。

[3]见《日本国宪法》,昭和21年11月3日。

[4]《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

[5]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战后50年的探索》,读卖新闻社,1997年,第140页。

[6]1957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向日本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松平康东发出口头邀请,希望日本派遣10名自卫队员参与联合国黎巴嫩观察团;1958年日本首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以后又频频连任,这一时期,联合国设置了刚果、塞浦路斯、克什米尔等一系列维和行动,但日本始终未参与这些维和行动。

[7]三原则为: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世界各国的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见《外交活动的三原则》,1957年9月。

[8]日本自卫队的国际救灾派遣始于1998年,至911事件之前,进行了1998年11月洪都拉斯飓风灾害救援、1999年8月土耳其地震出动军舰运送救灾物资、2001年1月印度西部地震中出动运输机空投救灾物资等国际灾害救援活动。见闻舞、张人龙:《日本自卫队——法定的“灾害派遣”》,《环球军事》,2008年6月,第175期。

[9]《PKF主体业务冻结协议》是PKO法的一个附加协议,该协议严格限定日本参与PKO任务的性质,“主体业务”内容具体如下:监视武力争端的停战遵守状况和军队的再配置、撤退及武装解除;在缓冲地带等处驻留、巡逻;检查、确认武器的搬入和搬出;对缴获的武器进行收集、保管和处理;帮助纷争当事者设定停战线等警戒线;帮助纷争当事者之间进行俘虏交换。参见猪口孝编:《冷战后的日美关系:国际制度的政治经济学》,NTT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第158页。

[10]所谓“PKO五原则”,是指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地区必须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必须得到当事国的同意;必须保持中立性;以上三条件如发生变化,必须立即中止参与维和;在保护自卫队员个人生命的最小限度下使用武器,不得集团使用武器。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网站:《日本出现修改PKO法动向 欲加强海外派兵》,2002年12月19日,<http://ijs.cass.cn/files/xsxx/021219.htm>。

[11]1992年6月15日—2001年9月11日,日本共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11次。数据统计来源: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

[12]见《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平成15年8月1日法律第137号,第2条第三项。

[13]这7项法案为:《支援美军活动法案》、《利用特定公共设施法案》、《限制海上运送军用品法案》、《国民保护法案》、《处罚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法案》、《对待俘虏法案》和《修改自卫队法法案》。

[14]日本官方的解释是:所谓专守防卫,是指基于宪法精神之上的被动的防卫战略姿态,即只有在受到对方的武力攻击时才使用防卫力量,其防卫力量的使用方式也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之内,而且所保持的防卫力量也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之内。见金熙德:《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日本学刊》,2002年第2期,第7页。

[15]关于集体自卫权,在1981年就形成了政府统一解释:集体自卫权是指无论本国有没有遭到直接进攻,对那些针对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武力进攻,要凭实力加以阻止,国际法上规定国家拥有这样的权利。在国际法上,我们作为主权国家当然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宪法第9条所允许的自卫权的行使,被理解为限于我国的防卫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的范围之内,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超过了这一范围,因此为宪法所不允许。见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342—343页。

[16]见日本防卫省网站:《日本防卫政策简介》(中文版),<http://www.mod.go.jp/>。

[17]见《自卫队法修正案》,平成18年12月22日。

[18]《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51(2008)号决议》,2008年12月16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8/s1851.htm>。

[19]见《自卫队法》,平成21年6月24日法律第55号,第82条。

[20]具体护卫对象为:日籍船只、搭载日籍人员的船只、或由日本公司运行的船只以及运送日本货物、与维护日本经济安定关系密切的船只。见日本防卫厅网站:《对海盗行为的应对》,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9/2009/html/12142200.html。

[21]见《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昭和23年7月12日法律第136号。

[22]见《应对海盗法》,平成21年6月24日法律第55号。

[23]见日本防卫厅网站:《对海盗行为的应对》。

[24]见《应对海盗法》,第6条。

[25]包括补给、运输、整備、卫生、设施提供,见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23日。

[26]根据新指针,“周边事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即是否对日本安全有重大影响,这给日本自卫队出兵热点地区提供了依据。见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27]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28]华佳萍:《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29]见外务省:《外交青书》,平成4年版(第36号)。

[30]截止到2008年,日本共10次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已经是世界上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

[31]所谓“敌国条款”,是指二战后,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联合国宪章》中对日本、德国等战败国所订立的相关约束性条款。这主要指的是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的规定。战时敌国主要是指德、意、日等法西斯轴心国家。

[32]《平成21年度 我国的重点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网站,平成20年8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jg_seisaku/j_gaiko_21.html。

[33]另外一个目标即是“防卫日本”,见日本防卫省网站,《日本防卫政策简介》(中文版),<http://www.mod.go.jp/>。

[34]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35]见《日民主党党首主张从印度洋撤回海上自卫队》。

[36]Ministry of Defense,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Self-Defense Force Activities,” June 2008, <http://www.mod.go.jp/>。

[37]见《海盗问题的现状与日本的对策》,日本外务省网站,平成21年9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pirate/index.html>。

(下转第56页)

日本公司治理效率的实证检验

李 彬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 2001~2006 年日本制造业公司银行持股、相互持股与主银行制度的公司治理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银行持股比例、相互持股比例均与公司治理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主银行制度却对公司治理起着负面影响。该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根据日本公司治理的经验,支持 90 年代曾经提出的银行持股和相互持股的国企改革方案,而不赞成引入主银行制度。

关键词 国企改革 日本 银行持股 主银行 相互持股

一、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 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 6447 亿元,比上年度增长 17.4%。其中,亏损企业亏损额 1026 亿元,同比增长 56.7%。^[1]虽然国企实现利润连年增长,但是其中的亏损问题仍不可小觑。针对我国国有企业非效率问题,学术界伴随改革进程提出过不少关于产权改革的方案,比如有:(1)变更国家股东剩余索取权方案。这种方案的宗旨不是要减少国有股份绝对值,而是变更国家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从而改变国有产权的控制力(张维迎,1999);^2职工主权方案。强调职工主权的学者主张人力资本是企业风险的终极承担者,也是企业财富的终极创作者,应推广职工持股制度(方竹兰,1997);^3基金持股方案。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培育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当务之急(Xu and Wang,1999);^4法人相互持股方案。吴家骏(1996)认为我国应通过相互持股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从而突出经营者的作用,真正实现企业自主经营;^5引入主银行制度方案。构筑银行中心金融体制,即银行持有企业股份,而且如果有一家银行成为主银行的话,能够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和债权人无权两个问题(郁光华,1996)。^[6]

在上述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五种改革方案中,相互持股和引入主银行制度方案显然是借鉴了日本的公司治理经验。我国在 90 年代中期也曾在大中型企业中进行主办银行制度的试点工作。然而,日本 90 年代经历了泡沫经济后,国内开始对日本主银行制度持怀疑态度,借鉴日本经验的改革方案迅速降温,推广主办银行制度的进程也相应停滞下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日渐深化的环境变化,日本进行了大幅度的金融改革和法律、会计制度及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改革。进入 21 世纪以后,过去备受推崇的主银行制度、相互持股等制度安排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仍值得我国借鉴?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公司的实证研究回答这一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任云(2002)构造了银行“负债——股权复合契约”模型,为日本银行持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解释。^[7]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可以观察到企业收益和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投资者会根据经营者披露的收益来决定投资水平,此时的投资水平和经营者努力水平为最优解。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法观察到企业收益和经营者的努力水平,只能得到次优的投资者投资水平和经营者努力水平。由于企业从银行融资,银行会积极调查企业收益和调动经营者努力经营。银行为解决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剩余索取权赋予经营者,只根据负债契约向企业融资和获得返还的利息。然而,当面临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问题时,负债契约便不能获得企业真实收益信息。欲获得企业真实的收益信息,银行必须缴纳很多信息租金,为弥补这种单纯的负债契约缺陷,银行向经营者提出持股和返还利息的“负债——股权复合契约”方案,以便供经营者选择,该方案可以调动经营者上报真实信息和努力经营的积极性,最终达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解。由此提出假设:

H1:银行持股对公司绩效有正面影响。

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前,学术界一致认为相互持股是维持日本式经营和成长型企业重要的制度条件。但是,通过相互持股建立起来的稳定股东可能导致企业重视增长率而忽视企业的股票价值,并因此采取不重视分红的股利政策。宫岛、蚁川和斋藤(2001)认为稳定股东采取的重增长、轻分红的政策,在泡沫经济时期扮演了促进过剩投资和诱发道德风险的角色。^[8]以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公司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相互持股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Lichtenberg and Pushner, 1994;^[9]经济产业省报告,2004;^[10]西崎和仓泽,2003^[11])。由此提出假设:

H2:银企相互持股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

近年来日本资本市场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变迁,企业资金需求下降,内部资金积累能力急剧增长,企业对银行的依存度大大降低,主银行对陷入经营困境企业的救助一直力不从心,显示了主银行救助功能的无效性(星,2005)。^[12]另外,主银行向财务状况恶化的企业仍然追加贷款的行为,也显示了主银行制度的低效率(关根等,2003)。^[13]由此提出假设:

H3:主银行制度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处理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2001~2006年日本东京一部(股市主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资料。样本数据在截面上涵盖了属于制造业的863家上市公司6个年度的非平衡横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日本EDINET电子信息系统的各企业有价证券报告书,通过手工录入而得。每年度3月末会计决算期数据视为上一年度的数据。通过Stata9.0软件完成统计与检验。

(二)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选取了公司绩效指标,采用企业溢价水平和会计利润率指标来反映市场表现和公司盈利能力。对溢价水平,选取国外研究大多采用的托宾Q,会计利润率指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选取了银行持股比例、稳定股东持股比例和主银行哑变量。由于相互持股类型多样复杂,难于统计,日本学者将包含了相互持股在内的稳定股东持股比例(银行与实业公司法人持股比例之和)视为相互持股的替代变量(松浦,2003),^[14]本文借鉴了此种选取

方法。主银行哑变量的设定借鉴冈部(2002)的研究,即将存在主银行的公司取值为1,否则为0。若一银行股东连续三年位居公司前五大股东之列,且三年里该银行均为持股比例最大的银行股东,则视该公司存在主银行制度。^[5]控制变量还选取了对公司绩效有影响的法人持股比例、个人持股比例、国内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销售额增长率、年度和行业哑变量等,具体变量定义如下(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度量标准

性质	名称	符号	度量标准
被解释变量	托宾 Q	Q	(年平均股价 × 股本总数 + 负债额) / 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当期纯利润 / 总资产额
解释变量	银行持股比例	FIR	银行持股总数 / 发行股份总数
	相互持股比例	KER	银行持股比例和法人持股比例之和
	主银行哑变量	DMB	存在主银行公司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法人持股比例	COR	实业公司法人持股总数 / 发行股本总数
	个人持股比例	PSR	个人持股总数 / 发行股本总数
	国内机构持股比例	INR	证券投资机构持股总数 / 发行股本总数
	国外机构持股比例	ECR	外国人持股总数 / 发行股本总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 发行股本总数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DAR	资产负债额 / 总资产
	销售额增长率	GROW	(当年销售额 - 上年销售额) / 上年销售额
	年度哑变量	YEAR	以2001年为基底,设置5个年度哑变量。
	行业哑变量	IND	以电器产业为基底,设置15个行业哑变量。

(三)对 H1 和 H2 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银行持股的公司治理绩效,构建如下模型:

$$PER_{it} = \alpha + \beta_1 STRUC_{it} + \beta_2 (Control\ Variables)_{it} + \mu_{it} \quad (1)$$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算和分析,可以保证所统计分析出的规律更加真实可信。

模型(1)中 PER_{it} 表示公司绩效,分别选取 Q 和 ROA 两个指标; $Control\ Variables_{it}$ 选取 DAR、SIZE、GROW、IND 和 YEAR 共 5 个控制变量; 检验 H1 时, $STRUC_{it}$ 选取 FIR、COR、PSR、INR、ECR 和 TOP1 共 6 个指标。检验 H2 时,为避免方程存在自相关性, $STRUC_{it}$ 选取 KER、PSR、INR、ECR 和 TOP1 共 5 个指标, i 表示各上市公司; t 表示年度; α 表示截距项, β_1 和 β_2 表示待估计参数, $\mu_{it} \sim iidN(0, \sigma^2)$, 回归结果见表 2。

由于模型(1)和(2)直接引入了企业效应和时间效应,因此需要通过检验再决定采用何种回归模型。首先,构造 F 统计量对固定效应模型(FE)和混合模型(OLS)进行筛选。其次,基于 OLS 估计的残差构造 LM 统计量,即 BP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对随机效应模型(RE)和混合效应模型(OLS)进行筛选。最后,经过 Hausman 检验对 FE 与 RE 进行筛选,以下模型检验方法均与此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年度和行业哑变量的结果。

表 2 日本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Q		ROA	
	FIR	0.007***(4.31)		0.058**(2.42)
COR	0.0001(0.08)		0.007(0.31)	
KER		0.003**(2.54)		0.032(1.51)
PSR	-0.007***(-5.42)	-0.008***(-6.44)	-0.024(-1.16)	-0.033*(-1.66)
INR	0.013***(3.37)	0.013***(3.34)	0.271***(4.71)	0.269***(4.70)
ECR	0.004***(3.07)	0.004***(3.10)	0.047**(2.19)	0.045**(2.18)
TOP1	0.003***(2.98)	-0.0003(-0.15)	0.021(1.29)	-0.003(-0.29)
DAR	0.738***(16.49)	0.737***(16.40)	-2.617***(-5.12)	-2.635***(-5.15)
SIZE	-0.355***(-5.33)	-0.368***(-5.51)	-0.561(-0.61)	-0.641(-0.70)
GROW	0.0007***(2.95)	0.0008***(2.98)	0.046***(11.89)	0.046***(11.91)
C	2.428***(6.62)	2.615***(7.19)	2.182(0.42)	3.576(0.70)
Adj.R ²	0.315	0.309	0.187	0.185
F	122.35	128.03	61.60	65.57
Hausman 检验	229.71(0.000)	270.33(0.000)	49.12(0.000)	50.83(0.000)
观测值	4588	4589	4614	4615

注：***、**、*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和 10%置信度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t 检验值。Hausman 检验报告的是 chi2 结果，括号内是 P 值，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各方程均选择 FE 模型，下同。

由表 2 的第 2 列和第 4 列的结果可知，银行持股比例(FIR)与托宾 Q 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分别达到 1%和 5%显著性水平的正相关，说明银行掌握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扮演着积极监督者的角色，对经营者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促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假设 H1 成立。由第 3 列和第 5 列结果可知，相互持股比例(KER)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其中，与托宾 Q 表示的公司绩效呈 5%显著性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故而假设 H2 不成立。

(四)对 H3 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主银行制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PER_{it} = \alpha + \beta_1 STRUC_{it} + \beta_2 STRUC_{it} \times (Control\ Variables1_{it}) + \beta_3 (Control\ Variable2_{it}) + u_{it} \quad (2)$$

模型(2)中的 PER_{it} 表示公司绩效，分别选取 Q 和 ROA 两个指标； $STRUC_{it}$ 表示主银行哑变量 DMB； $ControlVariables1_{it}$ 选取 FIR、COR、PSR、INR、ECR 等 5 个股权结构指标， $STRUC_{it} \times (Control\ Variables1_{it})$ 表示主银行哑变量与股权结构的交互项，目的是为了考察主银行制度因素在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时所起的作用； $ControlVariables2_{it}$ 选取 DAR、SIZE、GROW、IND 和 YEAR 共 5 个控制指标，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日本主银行制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Q				
DMB	0.034(0.78)	-0.039 * (-1.74)	-0.020(-0.61)	-0.012(-0.52)	-0.135 ***(-3.38)
FIR	0.007 *** (4.50)	0.007 *** (4.23)	0.007 *** (4.27)	0.007 *** (4.39)	0.006 *** (4.03)
FIR × DMB	-0.002(-1.61)				
INR	0.013 *** (3.32)	0.009 * (1.85)	0.013 *** (3.34)	0.013 *** (3.41)	0.013 *** (3.30)
INR × DMB		0.007(1.08)			
COR	-0.00006(-0.04)	0.00002(0.02)	0.0001(0.10)	0.0003(0.17)	-0.0004(-0.24)
COR × DMB			-0.0003(-0.32)		
ECR	0.004 *** (2.97)	0.004 *** (2.98)	0.004 *** (3.03)	0.005 *** (3.28)	0.004 *** (2.75)
ECR × DMB				-0.001(-1.32)	
PSR	-0.008 *** (-5.49)	-0.007 *** (-5.45)	-0.007 *** (-5.43)	-0.007 *** (-5.28)	-0.009 *** (-6.14)
PSR × DMB					0.003 *** (3.08)
C	2.409 *** (6.55)	2.448 *** (6.67)	2.447 *** (6.66)	2.439 *** (6.64)	2.518 *** (6.85)
DAR	0.735 *** (16.38)	0.732 *** (16.32)	0.734 *** (16.34)	0.731 *** (16.29)	0.737 *** (16.45)
SIZE	-0.350 *** (-5.25)	-0.353 *** (-5.30)	-0.356 *** (-5.34)	-0.359 *** (-5.39)	-0.354 *** (-5.33)
GROW	0.0007 *** (2.89)	0.0008 *** (2.97)	0.0007 *** (2.95)	0.0008 *** (2.96)	0.0007 *** (2.93)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 ²	0.316	0.315	0.315	0.316	0.317
F 值	107.42	107.28	107.19	107.34	108.04
Hausman 检验	223.01(0.000)	214.55(0.000)	215.83(0.000)	216.92(0.000)	231.42(0.000)
观测值	4588	4588	4588	4588	4588

由表 3 可知,除第 2 列外,主银行哑变量均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其中,第 3 列和第 6 列的主银行哑变量系数在 10%和 1%水平上显著为负。第 2 列和第 5 列的银行持股比例(FIR)和国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ECR)与托宾 Q 呈 1%显著性水平正相关关系,但受主银行哑变量交互影响后,这两项系数均为不显著的负值。第 6 列结果显示,个人持股比例(PSR)与托宾 Q 呈 1%显著性水平负相关关系,但与主银行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则转为 1%显著性水平上的正值。这表明只有相对于分散的小股东来说,主银行才起到了公司治理作用,而整体上看,主银行制度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它削弱了银行、国外机构投资者和第一大股东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导致它们的股权激励由正面影响转为负面影响,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总之,H3 成立。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非平衡微观面板数据模型,对日本银行持股、相互持股和主银行制度的公司治理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1)银行持有企业股票可以使其发挥大股东的监督效应,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监督公司

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并改善绩效,因此银行持股对公司绩效有明显的正面影响。

(2)银企相互持股在节省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稳定长期交易关系等方面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相互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主银行制度削弱了银行、国外机构投资者和第一大股东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因此主银行制度在公司治理中未能发挥应有效率。

该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再度重新审视曾经提出过的国企改革方案,本文的研究支持了借鉴日本经验、引入相互持股和银行持股企业股票、发挥债权人公司治理效率的改革方案,并且认为我国并不适合引入主银行制度。

注释:

[1]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就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和亏损情况作澄清》,2006年3月30日,http://www.stats.gov.cn/was40。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3]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兼与张维迎博士商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第36-40页。

[4]Xiaonian Xu and Wang Ya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ese Stock Compan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1999(10), pp.75-98.

[5]吴家骏:《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第45-48页。

[6]郁光华:《比较公司管理制度研究的政策意义》,《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第62-69页。

[7]任云:《以银行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理论及中国的应用》,学文社,2002年,第45页。

[8]宫岛英昭、蚁川靖浩、齐藤直:《日本型企业治理与过剩投资》,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金融评论》,2001年第12期,第139-168页。

[9]F.R. Lichtenberger and G.M. Pushner,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Japan," *Japan and World Economy*, 1994, No. 6, pp.239-261.

[10]经济产业省委托:《关于公司体系的研究报告书》,2004年第3期,第40页。

[11]西崎健司、仓泽资成:《股权配置与企业价值——关于公司治理的一项考察》,《金融研究》,2003年第6期,第187页。

[12]星岳雄:《系列金融的经济学》,载伊丹敬之等:《企业与治理——关于日本企业体系的读本》,有斐阁,2005年,第114页。

[13]关根敏隆、小林庆一郎、才田友美:《所谓追加贷款》,《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第129-156页。

[14]松浦克己:《企业金融、股权结构的变迁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Center for Economic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Series,2003年第11期,第1-34页。

[15]冈部光明:《交叉持股与日本型经济体系》,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47页。

(李彬: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魏全平)

预期与“流动性陷阱”下的日本货币政策

——实践及其启示

许祥云

内容提要 日本的通货紧缩和紧接出现的“流动性陷阱”对其货币政策提出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如何走出“通货紧缩”,既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对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学者从预期的角度所提出的一系列方案和建议,然后阐述了日本实际执行的货币政策以及所带来的效果和作用,尤其是对预期所产生的作用,最后给出了一些相应的评价和启示。

关键词 预期 通货紧缩 货币政策

进入 90 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并且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这场危机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为此,日本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复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学者有很多争议,但是大部分人认为泡沫经济的破灭、人口结构变化、过高的财政赤字所导致的对未来养老金和收益的担忧,以及原先过度乐观的生产率和增长预期的调整,都构成对总需求的负面冲击。通货紧缩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上升,导致贷款企业和家庭的破产以及资产价格的下降,进而导致银行资产恶化和不良资产,危害到金融稳定性。此外,由于财富效应,总消费下降,失业增加,如果名义工资存在着向下的刚性,通货紧缩意味着真实工资增加,导致进一步的失业。

在通缩状态下,日本银行不断调低利率,并最终将利率降到零,零利率限制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许多危害。这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工具是短期利率,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刺激经济恢复,基本的货币政策渠道是降低短期和长期真实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而在两者并存的情况下,由于短期名义利率无法为负,导致真实利率无法降低到使经济走出衰退的程度,从而使传统的货币政策失效,当财政政策由于赤字等原因也无法奏效时,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通货紧缩和经济长期衰退并存的局面。

一、零利率限制下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方法和选择

由于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所以即使在名义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影响私人部门预期通胀率,也可以影响真实利率,从而货币政策依然可以有效。如何真实而有效地影响私人部门预期通胀率,尽早走出流动性陷阱和通缩,就必须考虑预期的种类。Svensson(2003)认为最有可能的预期种类是理性预期,它使中央银行必须执行更大的扩张性政策和创造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来结束衰退,即意味着保持零利率即使衰退和通缩结束。但是 Krugman(1998)认为这种最优政策可能是不可信的,因为一旦通缩结束,央行

也许会食言,重新以通胀为政策目标,私人部门如果预期到这一点,则预期通胀无法下降,无助于走出衰退,所以中央银行需要做出承诺:它会在未来执行货币扩张,但由于短期名义利率为零,所以必须寻找其他办法来显示这种承诺,就这一方面,学者们给出以下不同的建议。

1、宣布一个通胀目标或一个价格目标路径

Bernanke(2000)、Krugman(1998)、Posen(1998)建议一个足够大的通胀目标作为未来通胀率的承诺,Krugman(1998)建议日本在15年内实行4%的通胀目标,Posen(1998)建议一开始为3%,一些年后为2%,为了增加可信度,央行需要公布通胀预测和通胀报告等。Svensson(2001)和Bernanke(2003)建议每年1-2%的价格增长路径,这种方法和通胀目标的差异在于通胀目标制下,如果某年没有达到目标值,第二年的通胀目标不变,在价格水平目标制下,第一年的低通胀必须由第二年或未来更高的通胀来补偿。在通缩情况下,后者优于前者,因为后者对长期通胀预期影响更大,而长期通胀预期预期又是影响长期真实利率的重要因素,比短期通胀预期更重要,价格水平目标制通过强制对原先的不足,可以有效地降低长期真实利率。但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需要其他政策工具。

2、扩张基础货币

Meltzer(2001)认为即使短期名义利率为零,基础货币扩张也会影响资产价格和真实利率,尤其在本币贬值的情况下。但是基础货币扩张能否真正影响到通胀预期,取决于这种扩张是否是永久性扩张,因为一旦通缩结束,扩张的基础货币会引发严重的通胀,央行会收缩基础货币,会使这种永久性扩张并不完全可信。

3、降低长期利率

尽管短期名义利率为零,但是长期名义利率为正,而长期利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更大,因此降低长期名义利率对于降低长期真实利率和走出通缩都有作用。Clouse et al.(2000)、Meltzer(2001)建议将长期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作为重要手段。由于在估计利率结构溢价上的困难,所以很难确定具体的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Bernanke(2002)建议直接对政府债券进行利率封顶,同时承诺在该利率水平上会购买无限量的这些政府债券,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央行有能力而且不需要规定具体的公开市场操作规模。Orphanides and Wieland(2000)认为长期债券利率和未来短期债券名义利率预期是相关的,所以保持短期名义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零的承诺,会自动降低长期债券利率。

4、财政政策

传统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财政赤字,如果财政赤字过高,私人部门会预期政府增加税收和减少未来政府的福利措施,导致私人部门储蓄增加,降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但Eggertsson(2003)认为,如果央行独立性很差,财政赤字会通过央行来融资,产生通货膨胀预期,而且不会像前面那样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Bernanke(2003)就建议价格水平目标制和央行货币融资的财政政策一起使用。Saxonhouse(1999)、Feldstein(2002)建议降低税收和补贴的真实利率净额,增值税的临时减少和提供临时性的投资税信贷会减少税后真实利率,同时对收入和企业税征收附加税来弥补这些支出,并不会影响政府预算平衡。

5、货币贬值

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即使短期名义利率为零,本币贬值也会拉动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Svensson(2001)指出,货币贬值和固定某个贬值率的盯住汇率政策会提供一个未来更高价格水平的明显承诺。在设计上,让汇率一开始直接贬值到所需要的最优水平上,本币贬值会使

私人部门产生持续贬值的预期,从而产生价格上升的预期。但是需要一个条件:央行和财政部之间的配合。具体来说,在首次贬值之后,宣布一个爬行盯住制度,汇率逐渐以外国平均利率水平来贬值,同时央行宣布它在宣布的汇率水平上将买卖无限量的外汇来保持盯住,必要时可以通过无限制发行货币来干预外汇市场。由于通缩,本币一般处于升值压力之下,所以不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操作这些干预政策。此外,央行获得的大量外汇储备使得央行没有动力来进行本币贬值,从而强化这种价格增加承诺的可信性。McCallum(2000,2003)建议“移动汇率目标”(moving exchange rate target)来走出流动性陷阱,它是现行通胀和产出缺口的函数,即如果通胀低于目标值或存在一个负的产出缺口,汇率将贬值,他通过模拟表明这种政策比较有效。麦金农指出盯住汇率制度会降低风险溢价,会减少对本国利率的压制。

二、日本实际执行的货币政策

日本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可以概括为“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

1999年2月起,为应付经济停滞和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日本银行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调至0.15%,同年3月3日再次调至0.03%。这意味着在扣除货币经纪商佣金后利率实际已降为零,即日本银行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但是2000年8月到2001年3月由于2000年经济回复增长,日本解除过零利率政策,将银行同业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0.03%上调至0.25%。但是,出乎日本银行的预料,进入2001年后日本经济恢复的内外环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在明显恶化。物价指数降至-0.7,GDP增长率到2002年降至-0.3%,日经平均股价跌破13000日元大关,银行的自有资本损失剧增,企业设备投资减少。

为此,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于2001年2月9日做出决定:自2月13日起,在维持0.25%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不变的基础上,将公定贴现率由0.5%下调至0.35%。3月19日,日本银行决定进一步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由原来的隔夜拆借利率改为货币供应量,即以央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作为操作目标。具体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以此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资金。(2)将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由4万亿日元增加至5万亿日元,增幅为25%。(3)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消费物价持续、稳定地保持0%以上的增长。(4)为了保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必要时可以增加从二级市场回购长期国债的规模,以达到央行目标。

2006年3月9日,日本银行宣布终止实行了5年之久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渐回收金融系统中的超额资金,用几个月的时间将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从30-35万亿日元减少到法定的6万亿日元左右。日本银行已决定将通过拍卖向金融机构放贷的最低利率从0.001%上调至0.01%。在终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日本银行还宣布设立通货膨胀参考目标区间,即将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控制在0-2%之间作为货币政策的参考目标。2006年7月16日又宣布结束零利率政策,但加息基点只有25个,即基准利率提高至0.25%。2007年2月21日日本央行把基准利率从0.25%提高至0.5%。但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日本银行再次于2008年10月31日降息到0.3%,12月29日进一步降低到0.1%,几乎再次回到零利率。表1显示了近几年来日本银行的货币市场操作方针。

表 1: 日本货币市场操作方针

决定时间	货币市场调节方针
1999.02.19	日本银行实施“零利率政策”
1999.04.13	日本银行行长速水优宣布将持续“零利率政策”直到“对通货紧缩的关注消失”
2000.08.11	宣布结束“零利率政策”,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 0.25%左右
2001.02.09	引入“伦巴德贷款政策”,官方折现率从 0.5%降到 0.375%
2001.02.28	日本银行将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降到 0.125%,官方折现率降到 0.25%
2001.03.19	日本银行宣布引入“数量宽松”政策直到核心 CPI 持续稳定地保持 0%以上的增长
2001.8.14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提高到 6 万亿日元
2001.9.18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提高到 6 万亿日元以上
2001.12.19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10 到 15 万亿日元
2002.10.30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15 到 20 万亿日元
2003.4.01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17 到 22 万亿日元
2003.4.30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22 到 27 万亿日元
2003.5.30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27 到 30 万亿日元
2003.10.10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27 到 32 万亿日元
2004.1.20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30 到 35 万亿日元
2005.5.20	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控制在 30 到 35 万亿日元,但是,如果从金融机构对央行的资金供给行为的反应中可以判断流动性需求很弱的时候,日本银行也可能会下调上述准备金活期帐户余额
2006.3.9	日本银行将鼓励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 0 利率
2006.7.14	日本银行将鼓励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 0.25%左右
2007.2.21	日本银行将鼓励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 0.5%左右
2008.10.31	日本银行将鼓励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 0.3%左右
2008.12.19	日本银行将鼓励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 0.1%左右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网站

三、作用和效果

日本银行的货币政主要要达到三种效果:一是资产配置再平衡效果,即央行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安全性很高的非生息资金,以期金融机构积极将其运用于贷款、债券或股票投资,有效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二是期待效果,资金投放量的增加很可能使人们对景气的恢复产生期待,使人们走出长期笼罩的悲观心理,以此促进消费和投资;三是时间轴效果,即告示效应,政府承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证持续实施零利率和数量宽松政策,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长期利率等于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加上风险溢价,在政府承诺下,降低未来短期利率预期及利率风险报酬,从而降低长期利率,达到提高资产价格、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可以说,除了第一个资产配置再平衡效果外,后两个主要是为了产生货币扩张和通胀预期。

总体上,日本货币政策的生产和经济恢复效果不是很好,尤其是在银行坏账没有解决之前,大量的差额准备金并没有进入借贷过程,进入企业生产和融资,但预期效果则有一

法定作用,虽然期待效果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的。日本银行于 2006 年 3 月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对央行货币政策的认识程度很低,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并无切身之感,但是对零利率的执行、承诺以及“数量宽松”确实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预期。时间轴效应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将十年期国债利率维持在低于 2%水平,从而降低了对长期利率上升的预期,这些都阻止了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流动性陷阱。

四、评价和启示

作为第一次流动性陷阱的对策,日本货币政策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尽管日本货币政策并没有使日本走出经济衰退,但至少阻碍了日本经济进一步衰退,总结日本“通货紧缩”时期的日本货币政策对于各国避免通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本文认为日本的经验还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有相应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中央银行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尤其是对于像“流动性陷阱”这样十分罕见的情况。伊藤隆敏和 Mishkin(2004)认为 1998 年《日本银行法》赋予日本银行以独立性是在不合适的时间段上。日本银行 2008 年 8 月宣布结束“零利率政策”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官员的强烈反对,为了凸显其独立性和可信性,日本银行没有和其他政府部门实现很好的合作,如日本银行迫于压力决定实行“量化宽松”时,日本银行宣称该政策可能无效,从而使民众认为日本银行在实行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政策,导致对民众预期引导的无效率^[1]。

第二,预期是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而预期的实现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国内经济措施如通胀目标制、财政政策等,还需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汇率进行干预来实现。

注释:

[1]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日本银行由于担心其资产账户的恶化而没有大规模地操作长期政府债券,从而减少了一个重要的手段选择,而在日本银行属于财务省时期则不存在这样的操作风险。

参考文献:

[1]Benhabib, Jess; Schmitt-Grohé, Stephanie, and Uribe, Martín (2002), “Avoiding Liquidity Trap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 pp.535—563.

[2]Bernanke, Ben S. (2000), “Japanese Monetary Policy: A Case of Self-Induced Paralysis?” in Mikitani, Ryoichi and S. Adam Posen, eds. *Japan's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Parallels to U.S. Experienc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3]Bernanke, Ben S. (2003), “Some Thoughts on Monetary Policy in Japan”, the Japan Society of Monetary Economics, Tokyo, Japan, May 31.

[4]Clouse, James; Henderson, Dale; Orphanides, Athanasios; Small, David; and Tinsley, Peter (2000), “Monetary Policy When the Nominal Short-Term Interest Rate is Zero,”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 Discussion Series, 2000-51, November.

[5]Eggertsson, Gauti (2003), “Fighting Deflation at Zero Nominal Interest Rates: Committing to Being Irresponsible,” IMF Working Paper, no. 03/64 March 1, 2003.

[6]Eggertsson, Gauti B. and Woodford, Michael (2003),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in a Liquidity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9968, September 2003.

[7]Ito, Takatoshi and Mishkin, Frederic S. (2004), "Monetary Policy in Japa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aper for the Solutions Conference, June 19–20, 2004, Roppongi, Tokyo.

[8]Krugman, Paul (1998), "It's Back! 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pp. 137–187.

[9]McCallum, Bennett (2000), "Theoretical Analysis Regarding a Zero Lower Bound on Nominal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32, no. 2, pp. 879–904.

[10]McCallum, Bennett (2003), "Japanese Monetary Policy 1991–2001,"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conomic Quarterly*, 89.

[11]Meltzer, Allan H. (2001), "Monetary Transmission at Low Inflation: Some Clues from Japan in the 1990s,"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19, no. S-1, February, pp.13–34.

[12]Orphanides, Athanasios and Wieland, Volker (2000), "Efficient Monetary Policy Design Near Price Stability,"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4, pp. 327–356.

[13]Posen, Adam S. (1998), *Restoring Japan's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Saxonhouse, Gary. (1999), "Japan's Growth Conundrum," *Financial Times*, June 14.

[15]Svensson, Lars E.O. (2001), "The Zero Bound in an Open Economy: A Foolproof Way of Escaping from a Liquidity Trap,"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19, no. S-1, February, pp.277–312.

[16]Svensson, Lars E.O. (2003), "Escaping from a Liquidity Trap and Deflation: The Foolproof Way and Othe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4, pp.145–166.

(许祥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魏全平)

(上接第 44 页)

[38]《日防卫相将下令依据〈海盗对策法〉打击索马里海盗》，共同社中文网,2009年7月23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schinese&storyid=72126。

[39]如在向索马里海域派遣自卫队问题上,遭到了来自共产党、社民党的抗议与抵制,见《抗议向索马里派兵》,《新闻赤旗》,2009年3月15日,http://www.jcp.or.jp/akahata/aik07/2009-03-15/2009031501_03_0.html;福岛瑞穗:《反对内阁会议对向索马里派遣海上自卫队的决定(谈话)》,社民党官方网站,2009年3月13日,<http://www5.sdp.or.jp/comment/2009/dannwa090313.htm>。在设立《应对海盗法》问题上的第一次投票中,反对党控制的参议院阻止了这一法案通过。当天下午,执政党凭借多数地位,在众议院再次投票,才强行通过了《应对海盗法》。

[40]日本自卫队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根据为1992年制定的《PKO法》,但其前提是参加传统意义上的“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类型的维和行动,见《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平成4年6月19日法律第79号。然而,近年来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有严格居于中立立场监督停火的行动,还有许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使武力的维和行动。因此,“PKO五原则”成为了自卫队海外派遣规模与参与水平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

(徐亮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胡令远)

中日 FTA 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分析

陈霞

内容提要 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热点趋势。在东亚地区, FTA 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该地区中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 FTA 却始终停滞不前。造成中日经济关系现状与机制严重脱节的原因既有经济的, 也有非经济的, 但真正的症结在于中日经济之间存在的恶性竞争关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取代美国一跃成为日本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 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进一步加深。中日经贸关系的这种质变为中日 FTA 建设带来了历史机遇。

关键词 FTA 中日竞争 中日合作 金融危机

当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1]不少国家纷纷转向了双边主义的立场, 一时间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和日本在进入新世纪后都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将之视为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步骤。到目前为止, 中日两国各自的 FTA 进程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但两国之间的 FTA 却一直搁置不前。日本政府始终对中日 FTA “兴趣不大”。不过,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严重依赖外贸出口的日本经济备受冲击, 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危机导致变革, 中日能否在危急关头携起手来实现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既给彼此的经济增长寻找新的生机, 又给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中日 FTA 能否应时而生? 成为中日关系中备受关注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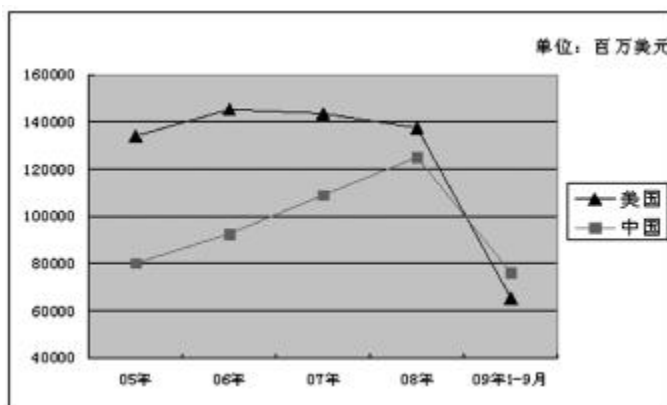
一、金融危机下中日经贸关系的质变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许多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都遭受了重大打击。比较而言, 日本的金融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日本的金融体系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洗礼后, 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运行相对良好。但是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欧美消费市场萎缩, 却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并且这种破坏性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显现出来。

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 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外需, 出口的增减几乎成为日本经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 2008 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体虽然呈现增长态势, 但从 2008 年 8 月份起, 日本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幅下滑, 11 月和 12 月甚至出现了 -16.1% 和 -19.9% 的负增长, 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大降幅。^[2]2009 年日本货物贸易出口的下滑势头有增无减, 前三季度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总体降幅达 32.9%,^[3]降幅

之大为历史罕见。日本贸易出口额锐减的原因之一是来自欧美市场的需求大幅缩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对美出口要占到日本出口总额的两成以上。但是从2008年开始，日本对美出口开始出现逐月大幅下滑，到第三季度增幅仅为0.4%，第四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2009年前三季度对美出口降幅达到38.4%，超过日本出口贸易的平均下降幅度。2008年全年，日本对美出口整体下滑4.4%，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出口却逆势大幅上扬14.4%。^[4]

图 1: 日本对美、中货物贸易出口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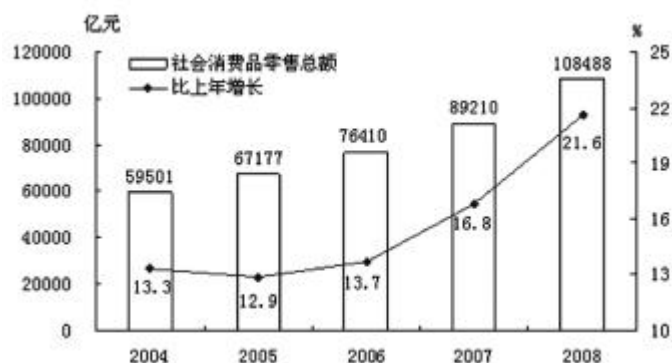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日本对美和对华货物贸易出口的差距在2008年急速缩小，随后出现了格局反转的趋势。2008年度日本的对美出口权重仅比对华出口权重高出了1.6个百分点，^[5]截止到2009年前三季度，日本的对华出口权重反超对美出口权重2.1个百分点。^[6]在对美出口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报告，2008年7月日本对华出口同比增长16.8%，已是连续第38个月增长，这使中国取代美国，一跃成为目前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7]截止到2009年10月，中国作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地^[8]的地位已经十分巩固。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曾有研究显示，如果美国的个人消费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日本的GDP将下降0.27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对美国消费市场的依赖度很深。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市场大幅萎缩，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贸易格局，对美出口锐减直接导致了日本2009年1月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了13年来的首度赤字。^[9]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中国市场为陷入对美出口困境的日本经济带来一线曙光，金融危机使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加深了。

日本经济在冷战后曾经历10年大萧条，来自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在2002年至2004年的景气复苏，日本媒体称此现象为“中国特需”。如今，尽管中国经济也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外贸进出口增速双双放缓，但是中国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仍然不容小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08年全年，中国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488亿元，是2004年59501亿元的近2倍。从2004年到2008年的五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3.3%、12.9%、13.7%、16.8%和21.6%。^[10]

图 2:2004-2008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 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现在,当中国同样面临出口瓶颈的时候,刺激国内消费成为中国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总额高达 4 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内需计划实施后,最终受益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目前,日本在中国内地设有超过 3 万家企业,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无疑也将直接使这些日本企业受益。显然,一个庞大的“中国特需”市场对今天的日本来说显得比过去更加重要。

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目前,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1]、第四大出口市场^[12]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权重约为 15%左右。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等。从货物贸易结构上看,中日经济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正如 2007 年温家宝总理在对日“融冰之旅”前夕答记者问时所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地缘优势和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潜力很大。”^[13]

过去,美国是日本最为重视的贸易伙伴,如今,到了日本重新审视它的贸易伙伴地位排序的时候了。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发生了质变,这种状况势必会反映到中日关系中去。

二、中日 FTA 建设的机遇与障碍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尚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合作关系。中日 FTA 谈判长期被搁置,两国之间更多的是“经济交往”而非“经济合作”,中日经济关系的现状与机制严重脱节。

在中日缔结 FTA 问题上,中方一直持积极态度,多次发出倡议。2005 年初,中国驻日大使王毅两次在演讲中提议开展中日 FTA 的可行性研究,推动中日 FTA 谈判。同年 5 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访日期间又正式提出“尽快启动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日本的企业界和学界对此也持积极态度,但日本政府却一直采取回避、暧昧的态度。根据日本外务省 2002 年公布的《日本的 FTA 战略》,日本将韩国和东盟国家作为缔结 FTA 的优先对象,与中国缔结 FTA 仅仅是一个中长期目标。^[14]在 2004 年公布的《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中,日本核定了谈判对象国/地区的三大基准,^[15]中国仍然被排除在重点对象国之外。2006 年 4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关于东亚的 EPA 构想》中描绘了日本的东亚

EPA 路线图,其中再次强调了韩国和东盟各国的优先位置,并将印度也列入谈判范围,而关于中国,仅仅只是在“中日韩投资协议”的框架下有所涉及。对 FTA 的战略立场和认识的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对缔结双边 FTA 态度的差异。

不过,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日本的贸易格局。由于日本倚重外需的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无法扭转,因此日本必须寻找新的海外市场来填补对美出口的空白。日本政府势必会出台扶植和促进贸易的政策,作为中长期目标的中日 FTA 建设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不是没有可能。事实证明的确如此。2009 年 4 月底,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展开了被媒体称之为“合作之旅”的对华访问。在访华期间,麻生作为首相第一次提出了探讨深化两国经济合作机制,“根据情况讨论中日 EPA 可能性”的建议,^[9]一改过去日本高层领导人对此问题的回避和暧昧态度。中日两国要携手共度时艰,必须拿出更加实质性的、可持续性的合作方案。危机带来契机,全球金融危机为中日 FTA 建设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中日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打开了一扇大门。

中日 FTA 建设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但这些都是形成障碍的主要原因,真正的症结还在于中日之间未能形成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机制。

从经济因素看,日本担心一旦与中国达成 FTA,日本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会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尽管农产品仅占日本经济很小的一个部分,但长期以来备受国家政策保护,并形成了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然而农产品问题并不是中日 FTA 谈判独有的问题,在与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中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之间的 FTA 谈判中同样存在,但是日本却将上述国家作为 FTA 的重点推进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可见,经济因素只是 FTA 谈判中的技术性问题,并不会成为难以化解的矛盾。

从非经济的因素看,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主权争议问题。的确,这些政治因素严重损害了中日间的政治互信,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日本和韩国之间,而日韩 FTA 谈判却被列为日本 FTA 战略的重点。可见这些传统的认识问题也不是中日 FTA 谈判的最大障碍。

真正的障碍在于: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两个最主要国家,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并且这种竞争缺乏良性互动。就拿 FTA 建设来说,两个国家几乎是一派你追我赶的竞争架势。2001 年 11 月,中国启动了与东盟国家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即“以一对十”的谈判策略),而日本则采取了难度较低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策略(即“以一对 1/10”的谈判策略),以使日本的 EPA/FTA 进程不落在中国后面。2002 年 1 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 FTA。截至 2008 年年底,日本已经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文莱、印尼、菲律宾以及东盟签署了 EPA/FTA,速度和效率远高于中国(见表 1)。

表 1:中日两国已达成的 FTA 比较

与中国达成的 FTA	与中、日均达成的 FTA	与日本达成的 FTA
香港	新加坡	墨西哥
澳门	智利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东盟	泰国
新西兰		印度尼西亚
		文莱
		菲律宾

从中日两国分别达成的 FTA 来看,东盟国家是两国极力争取的对象。2001 年 11 月,中国率先与东盟就签署 FTA 框架协议达成了一致意见。^[17]在东亚地区,东盟一直是中国和日本重要的经济伙伴,其拥有的物质资源、地缘位置优势以及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对中国和日本的地缘战略来说都十分重要。一旦中国和东盟达成 FTA 而日本不跟进的话,显然将对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不利。因此,日本不仅加快了与东盟的谈判进程,而且还同时与东盟主要成员进行双边谈判,多边和双边谈判双管齐下,以期达成更加高效的 FTA。因此尽管中国率先与东盟达成 FTA,但是日本及时调整战略迎头赶上,并在 2006 年后获得“丰收”。

从中日两国目前正在谈判进程中的 FTA 来看,这种竞争的迹象更为明显。中国与海湾合作组织于 2005 年 4 月启动谈判,与澳大利亚的谈判也在同年 5 月启动,而日本随之也在 2006 年 9 月和 2007 年 4 月分别启动了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谈判。显然,海湾合作组织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源是中日双方展开 FTA 竞争的原动力。中日两国在 FTA 问题上的竞争,既有经济利益之争,同时还有能源之争,这种恶性竞争的局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中日各自所缔结的 FTA 的效果,并且还直接阻碍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此外,日本积极推动 EPA/FTA 战略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与中国争夺区域经济的主导权。欧盟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基于“法德轴心”的大国合作才是推动区域联合的动力。然而在东亚地区,类似的大国合作却很难看到。日本一方面希望分享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带来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却又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因此总是试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行动轨道。就拿 FTA 战略来说,日本将中国放在“路线图”的最后阶段,希望在日本的 FTA 布局成熟后再将中国吸收进来,以此来排斥中国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以及“东亚的 EPA 构想”,正是这一思路的政策反映。

可见,中日之间缺少一个良性互动机制、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才是阻碍中日 FTA 建设的根本原因。

中日之间是继续这种恶性竞争,还是寻找共赢的出路?全球金融危机或许给了双方一个重新审视该问题的机会。金融危机已经损害了两国的实体经济,继续恶性竞争只会使损害的程度加深、损害的时间拉长。而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层面,事实证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其实都没有能力成为唯一的主导力量。因此,中日两强必须携手合作,实现 1 加 1 大于 2 的效应。

三、中日 FTA 建设中的两大外部关系

中日 FTA 建设固然有许多多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但从战略高度来说,必须妥善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关系。

从前者来看,美国无疑是中日 FTA 建设中最大的外部因素。中日 FTA 长期阻滞不前,最大的外部阻力便是美国。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通过美日同盟这一载体来实现的。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关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增强巩固。尤其是在“9·11 事件”以后,美日关系进行了面向 21 世纪的调整,日本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和安全的保障,美国继续肯定日本的作用并强化了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18]不过,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美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一些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日本

过分依赖美国的状况公开表示不满,认为日本的外交不应该“只有一个选择”,甚至开始重提“脱美入亚”的论调。^[19]美国对此是十分警觉的,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第一位被邀请到白宫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正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日期间更是将美日同盟关系捧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很显然,假如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日本试图寻求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显然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中日 FTA 建设如何平衡好美国因素,是对双方政治智慧的考验。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中日 FTA 建设不应当仅仅只是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应当是立足于区域经济合作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步骤。相比欧洲和北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东亚的区域一体化一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大国合作机制的缺失无疑是东亚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实践,最初的煤钢联营实际就已经蕴含了一个大欧洲的梦想。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大国,已经构建了“战略互惠”关系。2007 年福田康夫首相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中就曾指出,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是构成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三大核心支柱。2008 年 5 月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明确指出“要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20]从中可以看出,国际贡献是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之一。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东盟 10+3 合作、东亚峰会、落实清迈协议等地区机制中已经展开了合作,但合作更主要的是在多边机制中展开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中日双边合作机制滞后的尴尬局面。在麻生首相访华期间,温家宝总理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日加强合作有助于共同克服困难,带动地区经济增长。^[21]麻生首相也表示了考虑同中国建立 EPA 的建议。中日 FTA/EPA 建设,不仅有利于稳定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双边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探索新的机制,以弥补国际经济机制的不足,从而增强自身以及本地区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 FTA 建设任重道远。

注释:

[1]WTO 多哈回合谈判 2001 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后一直走走停停,多边贸易谈判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这轮耗时 7 年的谈判于 2008 年 7 月底正式宣告破裂。

[2]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2008 年”,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3263。

[3]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2009 年 1-9 月”,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6960。

[4]同注 2。

[5]对美出口占 17.6%,对华出口占 16%,数据引自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6]对美出口占 16.1%,对华出口占 18.8%,数据引自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7]《日本经济新闻》,2008 年 8 月 22 日。

[8]商务部《国别贸易简讯》,“2009 年 10 月日本贸易简讯”,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asp?news_id=17460。

[9]据新华社东京 2009 年 3 月 9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09/content_10975610.htm。

[10]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 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090226_402542733.htm。

[11]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是美国。

[12]第一至第三位的出口市场分别是:欧盟、美国和中国香港。

[13]《温家宝接受日本 16 家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07-04/04/content_572019.htm。

[14]《日本的 FTA 战略》,第 5 章,平成 14 年 10 月,见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senryaku.html>。

[15]这三大基准是:一、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二、确保我国整体的经济利益;三、对象国 / 地区的状况,实现 EPA/FTA 的可能性。

[16]《麻生太郎表示将探讨中日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可能性》,见人民网日本频道,<http://japan.people.com.cn/35463/6649229.html>。

[17]中国东盟 FTA 已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其中在东盟 10 个国家中,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等 6 个国家的 FTA 从 2010 年开始生效,而与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 4 个国家的 FTA 则将从 2015 年开始生效。

[18]曹筱阳:《美日同盟:面向 21 世纪的全面调整》,载《当代亚太》,2006 年第 9 期,第 36 页。

[19]2008 年底,日本洋泉社出版了论文集《美国金融危机,日本的出路在何方?!》,共收录了 13 位学者的论文。

[20]具体包括:第一,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推动六方会谈进程。第二,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

[21]据新华社北京 2009 年 4 月 29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29/content_11282704_1.htm。

(陈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贺平)

武士道近代化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1868-1945)

吴筱梅

内容提要 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道德体系,在历经近 700 年的武家社会中,逐渐成为统领日本的民族精神。从 1868 年到 1945 年——前后近 80 年的历史中——武士道教育被扭曲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对国民进行洗脑和催眠的工具。本文首先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考察了武士道的演化脉络,它反映了武士道何以被日本军国主义挑选为煽动国民意识并对国民进行战争催眠的工具;接着深入分析了武士道如何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最后对武士道进行批判性地总结分析。

关键词 武士道 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

一、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概念界定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加紧向外发动侵略战争,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教育上大力灌输天皇至上的军国主义思想,为培养尽忠报国的“忠臣良民”,将教育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建立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教育体制。这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

在明治初期颁布的《学制令》中,当时还未出现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强化,1880 年修改后的《教育令》开始强调出现了“尊皇爱国”。1885 年,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着眼点进行教育改革,此举使忠君爱国思想和尚武精神在国民各类教育中不断深化。之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国民思想,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1890 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既规定了天皇有左右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大权,又赋予它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的双重功能。^[1]《教育敕语》指出,国体之精华在于天皇之德化与臣民之忠诚,而教育的渊源亦由此而来。^[2]它强调“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3]《敕语》与 1882 年颁布的《军人敕谕》有着密切关系,二者共同构成军国主义教育的灵魂。^[4]此外它还与《帝国宪法》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被视为培养臣民忠君爱国精神的基本原则,其内容甚至还规定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从此《敕语》成为军国民教育赖以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日本道德教育价值取向由维新初始的个人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

20 世纪 20、30 年代,政府积极鼓吹国粹主义,推行更彻底的军国主义教育改革,把教育目标固定在培养“忠良臣民”的方面,全国普遍采用实用主义的教育政策,为实现“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实施彻底的皇国民“炼成”教育。^[5]确立把学校变成“国民训练的场所”,把从国民学校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纳入“皇国之道”的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最终使教育完全纳入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体制。皇至道^[6]副教授曾在《国民教育体制的构思》中指出:“作为儿童必须受到应做扶翼皇运的忠臣良民的教育……必须彻底清除那种自由主义观点,即认为

每个国民从其各自的立场出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军国主义教育无疑是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军国主义路线的逐步形成,学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逐渐形成和加强,这为以后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本质是通过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磨练军国主义精神,达到养成“忠良臣民”的国民教化目的,以期通过国民教育和国家宣传的手段将武士道精神反复加之于日本国民的思想中。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连贯性和功利性、全面性和广泛性、彻底性和绝对性。近代日本的国民教育沾染了浓烈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源于镰仓幕府时代的旧武士道教育,这种武士道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与封建统治者开疆拓土的扩张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承认,武士道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在凝聚民族意识、塑造日本民族国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是武士道融入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之过程及负面影响。

二、武士道的形成及嬗变

“武士道”一语,是日本战国时代(约公元 1477—1568 年)才出现的,指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武士道是伴随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武士的观念,是支配武士的精神生活的原理。它是武士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总称。”^[7]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与神道一样,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8]

武士道历经几百年日渐获得完善。对武士道的大加颂扬和强制推行,使之逐渐渗透到日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液之中,构成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9]美国学者贝拉也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10]“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最终“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11]

1、江户时代以前旧型武士道的产生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密切相关。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即是日本的武士阶级,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主要应归因于其以武力和团结力组成了家族式的军事集团——武士团。维护家族的存在和发展是武士结成武士团的初衷,而维系主从关系则是武士团得以存在的前提。”^[12]

从 11 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 1192 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

阶级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集团首领不断制定“家规”、“家法”教管武士,根本是为了效忠主人,例如:《贞永式目》、《武田信玄家法》、《长宗我部元亲百条》等,并通过这些家训使“武士道”从具体的行为活动发展成为一种观念化的道德规范。武士道是随武士阶层的升起而发展出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经平安时期酝酿,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这就是日本“武士道”的起源。

镰仓时代的日本,佛教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武士中间最广为流传的佛教新宗派就是禅宗。禅宗宣扬“自力本愿”且推崇的修炼方法是坐禅静思,要坐禅者能发展出山崩地裂无所惧的定力。因禅宗的一些理念符合封建统治者鼓励武士为己效忠的需要而倍受推崇。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武士驰骋战场都需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镰仓幕府时代,武士道与禅宗的结合将佛教的精神力量注入到了武士的“忠”,即对主人的献身精神里;而禅宗的哲学理念与修养方法,成为武士陶冶精神的指南,提倡“以儒修外,以佛养内”的武士道,形成武家特有的气质、行为与理想。^[13]

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武士的能征善战、英勇杀敌、对主君的忠诚、自身名誉已不是个人意愿的个体行动,而是家训中要求作为一名武士必须具备的、遵守的集体道德规范。只是“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14]

2、江户时代新型武士道的发展

从武士的出现到德川时代,武士始终是以“战斗”置身于日本历史的中心。战斗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武器。到了德川时代实质性的战争消失了。日本社会开始了长期和平稳定,加上实施“兵农分离”和“四民等级制”政策,武士不仅脱离了战争生活,也开始由农村领地转入城市,很多武士也由战士转变成了行政官僚。由于职责和身份的改变,武士的修养内容也由重武功改变为重德行道艺,武士道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以往“死的觉悟”转向儒家的士大夫理想和君子之道。

“德川时代以前武士道是‘作为战斗者规定自我的’,而在德川时代武士道则是提倡‘非战斗者的观念道德至上主义的实践道德’,并且只是武士才特别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一般的农、工商阶层的庶民,没有多大关系。这就使传统的以武士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武士之道向理论化、精神化的武士道过渡。”^[15]德川幕府时代,由于朱子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儒家倡导的忠信仁义道德使整个武士阶级形成了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共同体道德。这种共同道德一旦与神道教宣扬的天皇崇拜思想相结合,就生出忠君、爱国、忠诚、牺牲、信义、廉耻、名誉、尚武等种种道德信条,形成了武士最完美的道德——武士道。^[16]

著名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山鹿素行等人大力推动并促使这一过渡的完成。这一时期用儒家思想进行解释和重构的士道论既为幕藩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伦理原则,又为大多已行政官僚化的武士提供了合理而又系统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特别是山鹿素行提倡的以“明心术”、“详威仪”、“慎日用”等为主要内容的修身之道,具有适合各

阶层的普遍性。因此,这种士道自然为武士阶级所接受,成为主导近世武士思想的武士道理论。

3、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嬗变

到了明治时代,由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御一新”的社会大转变过程中,武士道也不得不衰之隆之,发生变异,以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直接来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武家道德思想在明治时代继续保留着传统影响,如山鹿素行的《圣教要录》、《武教小学》、《山鹿语类》,山本常朝的《叶隐》等武士道论著仍拥有大批读者,而且前藩士山冈铁舟、板退助、重野安绎等分别在不同领域经受着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洗礼,却难脱武士窠臼,纷纷著书立说,宣扬武士道。另一方面,明治初年维新变革势如破竹,江户时代武士道又不得不与武士阶级同时被改造。从1871年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1878年发布《军人训诫》,到1882年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忠君爱国’,这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新武士道。”^[17]

在“黑舰”事件以后,“武士的训条”以及由武士阶层的身份而带来的义务,逐渐扩展其范围,武士道才被看成是摆脱民族危机的法宝,并为维新领导人大大加提倡。^[18]而主张武士道就是“死”的《叶隐》思想,虽然在整个德川时代默默无闻,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越来越猖獗,《叶隐》思想受到高度重视,其影响越来越大。在明治维新以后,近世武士道理论为明治政府制定《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对军人和全体国民实施军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思想来源,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些思想向军队和国民灌输尚武精神和效忠意识,从而使日本人民自觉地为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服务。而“武士道就是死之道”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教化军人为其卖命的思想工具。用这种武士道思想教育出来的军队是随时为天皇献身、丧失理性的军队,其战斗力和破坏力都非同小可。而通过国民教育日本军国主义也成功地将武士道诱导为振作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成为“象征民族意志”的精神支柱。

三、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日本进入近代社会而画上句号。相反,它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明治时代的新武士道把对天皇的忠诚绝对化,并借助武士道的修行方法和政治理念,高度整合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以“一亿国民一心同体相互扶助”为目标,去实现“强兵”的目的。在前后近80年的历史中,这也是日本政府所追求的军国主义教育之方向。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19]从武士道的发展历程来看,近代武士道作用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且日益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的重要精神及道德核心,这个过程大体有三步:

1、将对天皇的无尚崇拜融于武士道

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以后,为了凝聚全国的政治力量,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近代政治家们用尽一切手段使“忠”的对象从世俗首领转移、集中于天皇一身,“让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确立这种最高的道德”。^[20]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军人训诫》等的颁布,武士道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日本近代的武士道是融合了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道与西方近代的国家主义观念而形成的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新道德。1878年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死。在极力宣传日本神道、宣传日本是神国的过程中它发展成为以皇国主义为核心的道德理念。《军人敕谕》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代代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在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誉)辱(忧)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武士道诸德目^[21]中占支配地位的就是要忠诚至上,忠诚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22]而新武士道的效忠对象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即由江户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转而标榜全体日本人效忠天皇个人。

2、将武士道改造为帝国军人的精神信条

随着军部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将武士道与天皇制完全融合的条件下,军队使军国主义成为“国魂”的表征,武士道则成为日本“皇军”的文化渊源和建军灵魂。日本近代新武士道继承了江户时代崇尚武力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尚武倾向,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武士道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新武士道“由注重个人自诚内省的道学工具,转变为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精神支柱”。^[23]

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24]从1868年到1945年,武士或士族出身者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执掌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25]为了把“皇军”驯服为效忠于天皇,效力于军国主义的工具,明治政府建立了严格的军队教育和军队纪律,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熏陶“武士道”精神。军人比地方学生要受到更为彻底的武士道精神教育,使其确立不以生命自己为重而以天皇和国家为重的帝国军人思想和精神素质。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极力将“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灌输给士兵。^[26]然后使武士道衍变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孝、正礼仪、重信义、尚武勇和崇俭朴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近代军人的信条。《军人敕谕》的颁布标志着以儒学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新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除了严格的军队教育外,还用一套近似严酷的军队纪律,强制军人养成服从的性格。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军事训练中还用棍棒、皮鞭、剑道、柔道等方法训练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为了进行这方面教育,日军还要求官兵以此类“英雄人物”为榜样,如日俄战争中的樱井忠温中尉等。他的鼓吹武士道精神的书《肉弹》成为士兵必学的材料。士兵还通过唱军歌、参加各种仪式、纪念活动等方式加深对武士道的理解和实践。

3、武士道全民化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始终把教育作为进行军事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教育与军事装备一样,都是保护国家“利益线”的重要武器。由于日本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这样武士道便被巧妙地转变为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

1890年10月30日,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它把《宪法》所确立的臣民义务,从教化的角度具体化、概念化,并使之成为“皇民化教育”的大宗旨。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教育敕语》变成绝对化与神圣化,并且强制学生背诵,学校也必须兴建特别的奉安殿安置教育敕语。而且在日本于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后,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国民教育也由此被法制化了,《教育敕语》的内容成为军国主义的教典。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

在义务教育快速普及的情况下,其影响更不能低估。^[27]事实上,在充当军国主义炮灰参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士兵中,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比率几乎是100%。而在学校接受的“道德教育”熏陶,则是养成“军人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武士道”精神广泛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因而“武士道”精神不但成为近代日本军人,而且成为日本青少年的伦理道德标准。就这样新武士道在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军事体制下,成为日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必须严格贯彻的道德教育准则,成为日本近代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

作为军部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总监部、“军人不干预政治”的原则对军部无效、宪兵制度等体制无疑从极权政治和臣民驯化两个方面,使武士道更直接地和国民生活发生关系。武士道通过《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也将军人的基本信条与精神变成国民道德生活的一般准则。“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强调武士道与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28]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四、结 论

在武士道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武士道从行动上的要求原则,转化为观念性的指导原则,进而成为脱离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形而上的、精神化的东西。^[29]一方面,它培养了日本国民的尚武精神,并对形成统一的国民意识和国民道德观念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出于巩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需要,武士道的近代化过程,又是服务于近代化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过程。

武士道作用于军国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国家机构的军国主义化及特殊的军事制度实现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武士道教育在国民教育和军队教育两个领域得到了不断深入的发展。以此为前提武士道教育已发生了严重变质。它不再只是一种道德规范和精神要求,却沦为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对国民进行洗脑和催眠的工具。特别是在明治维新至二战的80多年间,武士道被扭曲为以“愚忠”、“盲从”鞭策国民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以武勇精神激发和煽动国民的战争意识,以杀生成仁将“皇军”铸造成泯灭人性的侵略机器。

从山县有朋要求国会“必须积攒每一个铜板,以期养成国力”,到东条英机要求人们为

“完成高度国防体制”牺牲个人生活,以“保障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其诱惑国民的手段,就是不断灌输“神国之武勇,胜于万国”的思想。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举措,利用军队教育和国民教育恶意将“武士道精神”奉为日本近代国民道德精髓,统领着日本近代的民族精神,这种教育对日本国民意识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长期受军国主义的强制和欺骗性教育,受到深重的毒化,精神思想扭曲,军国主义意识也相当深,至今在一些人身上也很难说得到了彻底清除。^[30]

笔者认为研究武士道不能忽视它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积极塑造和影响,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以也要批判性地认清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客观理性地认识其所具有的反动性、破坏性的一面。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客观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日本文化,正确把握武士道思想的内容和本质的演化过程,将会有利于国人提高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同时,对国人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也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 [1]大田尧:《战后日本教育史》,王智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2]陈宝堂编:《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 [3]《教育救语》,载于瞿葆奎、钟启泉编:《日本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 [4]1890年2月,在地方长官会议上,日本政府要求通过振兴教育的议案。首相山县有朋明确表示要积极推进德育。其目的既针对“德育论争”所产生的后果,也针对宪法公布以后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现实。他担心民权运动会分散国力,所以极力主张统一国民的价值观,并从国际视野(对外扩张)形成国民的军国意识。为此,他起用心腹芳川显正,要求其强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5]“炼成”,锻炼和成就皇国臣民的意思。1941年,大政翼赞会用“炼成”代替以往的“教育”,以适应“总体战”要求。“炼成”教育的本义是,“以皇国之道为原则,集中儿童正确的总体能力,强化国民的生格,养成皇国民的基本素质。”参见竹下直之著《炼成的本义》。
- [6]皇至道(1899年6月19日—1988年9月27日),广岛文理科大学(今广岛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第二任校长。
- [7]梁忠义:《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 [8]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 [9]新渡户稻造著:《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1页。
- [10]罗伯特·贝拉编著:《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11页。
- [11]汤重南:“庞杂的精神糟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剖析”,《光明日报》,2000年7月7日,http://www.gmw.cn/01gnrb/2000-07/07/GB/07184740GMC3-012.htm。
- [12]王志:《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5页。
- [13]武家“式目”是幕府推行“政道之要点”,是“武家之习,民间之法”的成文化,是用平常的“道理”规定的裁判条文。对后世影响甚大的镰仓武家法典《御成败式目》(1232年,也称《贞永式目》),就是为了规范社会规则,教育御家人知法尊法,实现“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的社会思想的目的而制定的。参见王今林:《简明日本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7页。
- [14]汤重南:《庞杂的精神糟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剖析》。
- [15]李海涛:《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东疆学刊》,2008年第1期,第50页。
- [16]杨绍先:《亚太五国传统改革与现代化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 [17]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 [18]正如丸山真男所说,日本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开之时,“既是把日本民族意识的四分五裂暴露于光天

化日之下的契机,同时又是扬弃过的民族统一观念成长发芽的契机。”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280页。

[19]汤重南:《庞杂的精神糟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剖析》。

[20]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熊达云和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8页。

[21]忠、孝、仁、义等按“德”分类的名目或称道德细目。在教育领域还特制儒教的五伦、五常教育。“德目”就是思想教育的标准,是让国民必须奉行的教条。明治时期经元田永孚的提倡,遂成为日本学校教育的根本大纲,它与天皇信仰相结合,被看成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神髓。

[22]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第25页,转引自杨绍先:《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第37页。

[23]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第246页。

[24]据1871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中将,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中将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1.25%的是旧大名出身。参见杨绍先:《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第38页。

[25]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身于士族。这些日本近现代政坛的重要人物,继承和发展了武士道,并通过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军事、教育政策,使武士道恶性膨胀。

[26]《军人训诫》提出军人的“三元行”:第一,忠实:上奉天皇,报效国家;第二,勇敢:作战临危不惧,能够冒险立功;第三,服从:听从上级命令,维持军队纪律,并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崇拜。参见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姜晚成、马黎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5页。

[27]例如,从就学率看,1871年、1878年、1887年、1892年、1897年、1900年、1901年七年的统计,分别是32.3%、48.51%、45%、55.1%、66.65%、81.48和91.57%。明治时代的义务教育一直是以小学为中心展开的,其中有两个坐标,1900年和1907年。1900年以前,简易小学修学3年,普通小学修学4年,1900年统一为4年。1907年又延长到6年。参见陈宝堂编:《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第二编第四章。

[28]杨绍先:《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第38页。

[29]参见李海涛:《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

[30]张义素:《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国民意识的影响》,《日本学刊》,2005年第4期,第93页。

(吴筱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胡令远)

(上接第35页)

[3]朱永彪、杨恕:《简论日本的中亚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

[4]驻乌兹别克使馆经商参处:《日本首相小泉访乌,合作开发铀矿写入共同声明》,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uz.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608/20060803021084.html>。

[5]《打造“自由、繁荣的彩虹” 开创日本外交新天地: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讨会上的演讲》,2006年11月30日,<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seisaku061130.htm>。

[6]沈海涛、徐立恒:《日本的中亚能源战略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能源合作》,《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4期。

[7]朱永彪、杨恕:《简论日本的中亚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8]清华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国际能源展望200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9]岩下明裕:《上海合作组织与日本:一起行动重新构建欧亚共同体》,《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

(罗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张浩川)

死的形式,生的主题

——试述影片《入殓师》统一生死的叙事元素及技巧

杨 芳

内容提要 日本电影《入殓师》讲述了一名为逝者穿衣、化妆送行的入殓师的故事,力挫多部影片,成为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导演运用平实而细腻的镜头语言,调动电影叙事元素,感动世界观众。本文试图探讨本片所体现和成功运用的电影叙事元素,一窥导演将生死之常理讲述得温婉动人的轨迹。

关键词 电影《入殓师》 叙事元素及技巧 统一生死

电影《入殓师》是日本导演泷田洋二郎的作品,在一种东方语境下讨论死亡,直面死者。直接而又正面地呈现死亡,在很多艺术作品中并不常见,即使它成为描绘或者讨论的对象,也容易进入悲伤的套路,令观众沉在其中不能自拔。《入殓师》却以不一样的风格、影像语言以及叙事元素及技巧策略,探讨死亡,呈现积极的主题。

《入殓师》是一部关于“从事着一份‘不普通’职业的一个普通人”的电影,又名《为逝者送行的人》。“不普通”是指这份职业与死者打交道,按照剧中人物不客气的说法,是“靠死人吃饭”,“做这样的工作是赎罪”。但其实它和其他职业一样普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入殓师需要克服心理障碍,为逝者送行,也为自己的生活寻求保障,由此生与死的矛盾也统一起来。但影片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拥有自己的叙事策略,极大地讨论了生死观点,带给观众感动的同时,展现了豁达的生死观。人总难免一死,死是人的一生中像吃饭、睡觉一样必然经历的过程。剧中主人公(小林大悟)对妻子说,“谁都会死的吧,我也会死,你也会死,死本身就是很平常的事”。但生命总是需要精彩,正是因为这些精彩,使人难舍难弃,死也变得被人敬畏,被人害怕。与死人天天照面似乎也被视为异类,视为一种不正常行为,而入殓师却正好是这样的一门职业。

入殓是日本的一种传统职业,为死者穿衣、化妆、清洗,将死者打扮得整整齐齐入棺。一部电影的选角从死者以及从触摸死者的入殓师出发,难免不让观众担心电影会有阴冷之感,进一步联想到日本很成功的类型恐怖片。但观过电影之后会发觉,影片的叙事以及故事和冷杀、恐怖是绝缘的,导演泷田洋二郎将影片处理得温馨而又楚楚动人。面对“死”这样一个永恒的话题,导演刻画的是生的力量,透露出浓浓的生命气息。片中出现最多的场景是为死者入殓,是悲叹和泪水,但却让观影者在肃穆的氛围中对死不惧,对生更勇敢。在众多影片中,《入殓师》一举成为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吃着不同的食物,但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道路:生与死。在这部影片中,生与死不是在顽强地冲突着,而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体现着哲学的思路。在死亡的外壳下,自辟出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影片中多处流露出关于生死的演绎,没有戏剧效果而禅意隽永,让生的主题

彰显无遗而深刻无比。影片的影子是东方化的,克制而又彬彬有礼,隐约显出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影响。在小津的电影中很大程度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浸润了东方传统理论的气质和诗意化的主旨。电影的节奏经常不是来自外部戏剧性叙事的节奏,而是在微弱的外部叙事进展中所形成的心理节奏、意境的节奏。¹⁴在这部讨论生死的影片中,不仅呈现了东方的传统气质,同时展现了在传统文明逐渐沦落的后现代社会里面,传统入殓师职业怎样震撼一颗颗普通的心灵。

影片讲述了失业的大提琴手小林大悟携妻子回到了故乡小镇。由于误解“入殓公司”的招聘广告,而去应聘,无奈成为一名入殓师,从不喜欢到接纳,再到尊敬、热爱工作的故事。故事平淡而又波澜不惊。影片中出现了各种被入殓的死者:人妖青年、没人管的老者、夭折的少年、不良少女、寿终正寝的老者,以及早逝而丢下年幼女儿的妇女。两个小时在处理这些死的时候既不冗长,亦不乏味,却似乎道尽了人世间的死亡。观众在观赏影片的时候,会和影片达成一定的默契,去理解和欣赏它,这也是电影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探讨影片的叙事元素如音乐、空间等以及影片如何将生死统一起来的叙事技巧。这些元素技巧一起作用,带给观众深刻的思考,让讲述死亡的影片却没有背上死亡的阴影。

一、入殓空间:藉此逝者新生,生者释然

入殓是一种庄严而又肃静的仪式,死者家属会在全程中观看自己的亲人被入殓。死,这种世间最极端化的别离方式,入殓仪式以及意义最终融化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障碍,留给生者的是最大的伤疤和如往昔般交流的永远中断。影片中逝去的是不同的人,入殓师则是同一个,入殓场景基本一致:在一间被装扮成祭奠、入殓逝者的房间里面,入殓师跪坐在平躺的逝者身旁为其入殓。镜头语言静而平。呈现出来的全景画面中,小林大悟在后景中,亲属在前景,死者在中间。最多的入殓镜头是近景,将入殓师和死者框在镜头中,观众和逝者家属以一样的视角观赏这种入殓的仪式,最大程度地融入到这种气场当中。同时摄影机在拍摄小林大悟对逝者亲属说话以及仔细清理逝者的时候基本上是完全正面拍摄的,也就是剧中人面对摄影机。完全正面的方位是最亲切的——人物面对我们,邀请我们参与他的一切。¹⁵这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和影片想要表达的情感趋于一致。这种空间的唯一和统一,能够最快地使观众进入到情景和场景,观众自然地处于哀悼的氛围当中,逝者为大。

在入殓空间里面,死者的亲属只是默默地关注着死者的遗体 and 入殓师的一举一动。但是当看着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们会透露出一些关于死者的信息和自己的心态。死者与亲属关系是紧张、不理解,还是和睦,在亲属悲伤地叹息、悲愤地争执、坦然地接受、温馨地亲吻中显露出来。看着逝者以姣好的面容和姿态入棺,生者悲戚的心理似乎得到一种补偿:他/她是美好地走向另一个世界,而仍然在这个世界挣扎的自己要微笑而勇敢送走他/她。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万物似乎都静止下来,唯有入殓师的动作赋予了逝者最后的生机。没有语言,沉默是生者与死者、生者与生者最好的交流。入殓的空间是关系呈现的空间,有了这一个空间,生死似乎没有障碍,所有恩怨,在此间消失。也许逝去的亲人总是能战胜时间的人,在生者心中永存。

入殓空间亦是入殓师展现职业修养和操守的地方,是化解入殓师自己的心理矛盾,以及化解入殓师的亲人、朋友对于这份职业不理解 and 偏见的场所。小林大悟起初非常排斥这份工

作,而“遭遇”的第一具尸体也让他很难受。后来他在观察了老板(佐佐木)庄重而又有节有度的工作后,对这份工作有了重新的认识,心里开始发生改变,他这样描述佐佐木的工作:“让已经冰冷的人重新焕发生机,给她永恒的美丽,这要有冷静、准确、而且要怀着温柔的情感。在分别的时候,送别故人。静谧,所有的动作都如此美丽”。他自己在接下来一桩桩入殓祭祀当中,更加深刻地理解着这份职业,对其充满敬爱和尊重。那些对入殓师职业的不理解或鄙夷的看法、态度,都在小林大悟有条不紊、一招一式、一丝不苟的入殓动作中消弭。所谓动作永远是最好的主导对比。¹³他神情凝重而又专注,动作亦庄重,从而彰显了这份职业对死者的尊重。每一道衣服的褶皱都容不得马虎。佐佐木说:“除去衣服,擦拭身体,会除去死者的疲惫,痛苦与尘缘,同时为死者归去那个世界送别,小心仔细地进行是为了保护死者的尊严”。妻子在看到他为澡堂老板娘入殓时,心中的不解与不满荡然无存,并且在片尾,亲自说出自己的丈夫是入殓师。朋友看到他为澡堂老板娘入殓,心中充满了对亡者的追悔,痛哭失声。影片中涉及的不认识的死者家属们在入殓结束之后,都会对他们抱以尊重与感激的态度。在入殓空间里,他们展现职业的素养,施展生存之道的同时为它赢得尊重,也消除他人对入殓的偏见。在这个空间之内,入殓师生存下来。

二、大提琴乐:为逝者送行,让生者平静

影片中的配乐出现了几首,主要由日本音乐大师久石让完成,都有着不同的叙事效果,但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作为大提琴手的小林大悟演奏出的那首名为《回忆》的曲子。这首曲子每出现一次,主人公的情感、心理活动、叙事等就深入一步。影片配乐以及叙境内的演奏音乐相互交织,在没有人物对话的时候明晰地烘托了主人公的情感流露,帮助观众去感受主人公的情感,体会电影的主旨。

小林大悟第一次拉出这首后来被反复演奏的大提琴调子,是在影片进行到44分钟时:主人公第一次从事入殓师职业,备受煎熬,内心不能够接受这份为逝者穿衣化妆的工作,但迫于生存现实,不得不接受,从而在妻子面前苦不堪言。只有在深夜拉起大提琴,借助音乐的力量,卷入到过去的回忆当中,一方面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也第一次在片中回到美好的童年时光中,藉此首次交代大悟内心的亲情苦楚:父亲离家,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的不易。可以说此时的主人公是处在自我逃避当中,无法直视自己的回忆,也无法直视自己的职业。唯有此处深夜的琴声是他最好的安慰,琴声是他流露心迹的途径。

故事继续讲下去,又有一些人死去,主人公在煎熬中送走逝去的人。当死者的容颜在入殓师手下如生者般容光焕发、美丽无比时,他慢慢地找到这份职业本身的美丽和必要,还有它给予死者的尊严和自己赢得的尊重。当同样的大提琴乐第二次响起时,音乐从妻子播放的唱片中流淌出。唱片是大悟父亲留下的,被母亲收藏。此时的音乐叙事功能虽然没有多么强烈,但是却暗示出父亲最喜欢的曲子,也是他深夜拉起安慰自己的曲子。血浓于水,不露痕迹的他保留着父亲的记忆,想念着父亲,为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此时的他听着曲子,内心是平静与思念的,他渐渐地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平衡点和工作的乐趣,开始理解自己,心境平和。

当主人公能够自己接受这份为逝者送行的职业时,自己的亲人未必能够接受。于是当大悟再次在旷野中拉起《回忆》时,不能接受入殓职业的妻子(妻子觉得这个职业“脏”)离家出

走,留下他一人独自支撑。但此时的他与深夜里拉起大提琴的他已经不一样了,他不再矛盾和内心冲突,而是更多地在享受这份宁静与自然,他此时不是因为找不到抒发自己感情的妻子而惶惑或内心羞愧,而是在冬日的旷野中拉着大提琴,静待万物复苏,迎接新的生机。他已经能够自信地面对自己的职业。但是关于童年的回忆,依然有纠结。旷野中的琴声,述说给孕育万物的自然,也述说给自己。琴声一直不断,是本片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也是大悟彻底从职业中成长起来的完整交代。他的身影忙碌于很多悲伤的家庭中间,也淡定在万物即将复苏的旷野中。这一段镜头在入殓仪式和旷野拉琴之间来回交叉,互相融入。冬天里面,似乎死亡总在发生,却始终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鸟儿飞回,树枝抽新,生命的气息比比皆是。在旷野里拉着大提琴的他,一面从容和更加自信地从事着自己的入殓师工作,一面是对妻子的思念。在琴声中,他试图找寻内心地平静和勇敢。少之又少的台词、流畅地音乐,在观众的心目中引起共鸣:这是一份对生的执着,对死的淡定和尊重的情怀。果真是生死在交替,在妻子回来之后,春天已经到了,他也得知自己将要去做父亲。他的音乐帮他渡过了难关,也胜过万语千言。

这次长时间的旷野拉琴,对于男主人公在职业上的纠结和认识作了最清楚的交代,此后他不会再为入殓职业纠结了,只需等待亲人朋友的接纳。片中所流露出来的大提琴音乐,让观众分不清是叙境内的音乐还是配乐,因为一方面主人公确实在旷野拉琴,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忙碌于工作。在这种夹杂不清的情况下,导演巧妙地交代了他的内心,工作亦如帮他寻找宁静的音乐,带给他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以及对职业的坦然。死者永远失去了发声说话的机会,所以没有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情节,由音乐来填充。这样一段音乐的平行剪辑让情节显得饱满而又充满情义,也更加地渲染了剧中死者家属们的情感,对逝者的感激和依依不舍全在其间。作为观影者,更是沉浸在这推动叙事向前的音乐中。这首大提琴曲子,充满哀伤,却又希望无限。

影片倒数第二次响起这段大提琴音乐是在男主人公为自己的父亲入殓的场景上。这是完全的叙境外配乐。这音乐仿佛只属于试图抑制情感而又真情奔泻的他。面对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了容颜的父亲,大悟交集不语。看着自己小时候送给父亲的石头依然攥在逝去的父亲的手中,他知道父亲没有把他忘记,童年情节豁然打开。但是面对父亲的离去,这种悲痛仍然让面临过很多死者的他潸然泪下:他只是个平凡的人,在面对亲人的离去时,他也只是、还是悲伤。他需要音乐和不言来安慰自己。此时的大提琴音乐安慰着他,也安慰着观众。这段音乐是他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同时也将他带回到童年回忆当中,帮他渡过事业的槛。它仿佛走了一个圆圈:在父亲的入殓仪式上,再次响起,音乐的轮回也正如人生的轮回般,绵延下去。此时的主人公在事业上、内心里没有任何纠结存在,期待新生的来临。

最后一次响起这首曲子是在片尾滚动字幕的时候,这时候的音乐是对全片基调的烘托,更多的是有助于全片基调的形成,将此音乐选作结束曲,可见它本身在影片中的地位。同样的曲子,结尾处节奏变得轻快,如释重负,电影也到了散场的时候。

这部关于生者与死者的影片如果没有了大提琴音乐,主人公的情感很难找到抒发的渠道,影片便也不会这般流畅和动人。当面对逝者的时候,入殓师基本是没有台词的,只是专心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对死的敬畏和尊重,亦是职业的素养。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音乐来推动情节向前,主人公内心的发展和情感的走向通过琴弦流露出来,可以说少了这几根琴弦,主人公的情感真不知道安放在何处。基本上是叙境内大提琴声音将小林大悟的内心一次次表

露,让观众看见他的成长和情感倾向。即使有别的配乐,但是经过导演的处理,这段大提琴曲子也只是为大悟的感情而设。别的配乐烘托了影片的气氛,是带动观众更加投入地走进影片的元素。情感寄托在琴弦,拉动的瞬间是生,琴音是生者的感激与平静,也在为逝者送行。这些配乐减弱了死亡带来的恐惧,同时能够强烈地引发人们面对死亡时的悲伤情绪。

三、“老像重生”:怀旧情调更添质朴情怀

人死不能复生,逝去的人总是让生者怀念,让生者伤感。逝去的人,逝去的时光,以及从前的事物一样都充满了旧的味道。在这部影片中,也处处显露了旧的迹象。主人公失业之后回到故乡,坐在母亲留下的老屋子里听着老唱片,里面流淌出来的是父亲过去最喜欢的曲子。拉着小时候的大提琴;去旧时澡堂洗澡,遇见以前的老朋友,还有澡堂老板娘那种为大家着想的既传统又大气的胸怀;剧中人说,“没有了澡堂,大家会寂寞的”,这些都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情怀,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温暖如常。所有这些都从过去的记忆中走出来,但他们也都抵不过时间的痕迹:老屋子里的母亲已经过世;听唱片的父亲早就离家出走;澡堂里面的老板娘也垂垂老矣。但这些旧的迹象却没给电影笼罩上颓败之感,反而添上了一层岁月的光辉,让电影不急不缓,死亡的冰冷被大大削弱。在这样一番旧景象中,新生的迹象也点点可见:朋友的小孩,妻子怀孕,还有那四月漫天飞舞的樱花。年轮在自然增长,新生在不断出现,这种自然轮回的规律为影片打上的是生的印记,而非死的阴影。

在“老像重生”的东西中,有两样事物,是稍显特殊的叙事工具:石头与唱片。石头是属于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所谓的时间型媒介,它们可以突破时间障碍,穿越时光隧道,直至永远。导演巧妙地将石头设置为连接主人公与父亲情感的桥梁,也是打开生死难怨大门的钥匙。

石头象征着古代文明,唱片却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在信息填充着社会每个角落的日本,甚至说整个世界,现代文明的产品激烈地冲刷着古代文明,却在这部影片当中却达到了和谐统一,均成为主人公情感寄托、流露的工具,它们串起了不断修正的人物情感,在本影片中成为重要的叙事工具。

四、轻喜剧的形式:“吃”的母题,人要活下去

影片是关乎生死的,死亡从来都是沉重的话题。小津的电影经常回避这个话题,或者直接简单跳跃,但是泷田洋二郎却是正面直接地抒写死亡。整部影片涉及到很多人殓场景和死亡的表现,影片是哀而不伤,叙事过程中运用的轻喜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死亡带来的抑郁。

影片开始,当大悟给一个貌似少女的死者入殓时,突然和老板有了很尴尬的交流,令观众很好奇,也顿时觉得将那种肃穆、呼吸紧绷的气氛弱化了。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观众忍俊不止,他们发现那原来是一个拥有女性容貌扮相的男性死者。他生前非常迷恋于女性的装扮,这种性别出现混淆的状况,让入殓师和观众措手不及,沉闷中诙谐伸出头来。再一次是当小林大悟被老板当作死尸模特的时候:穿着一个硕大的纸尿裤(也暗喻着在这一行,他就像是初生的婴儿,才入行,他的生命从此开始转折,新的领悟由此开始),躺在那里出现各种不适应的表情,以及被佐佐木不小心划到脸,这些细节都表现出他既辛酸,又无奈,让观众既笑

又同情他。工作真的不容易,他自己最初根本接受不了这份职业,但是为了生计,无计可施。老板曾经说过,“不想死的话,就只有吃;吃的话,好吃的才行”。这种轻喜剧的模式用来讨论生死,冲淡了凝重的悲伤,让观众有笑有泪,生生死死、分分秒秒也就在一笑一哭间过去了。影片让人悲喜交集,参悟生死相依。

入殓师每天面对逝者,似乎是常人难以接受和想象的。他们不惧死尸,勇敢地生的形象被深刻地刻画。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母题:不断重复的“吃”的母题突出了电影的主旨是生,努力而又美好地生活下去。而这种“吃”的展现主要是通过大悟和佐佐木展现的。小林大悟和佐佐木第一次非常用力地撕咬食物是在为一位早逝的年轻母亲入殓之后,他们受到死者家属的感谢,在车子里面大块地吃着家属送给他们的食物。在这场入殓仪式上,主人公第一次正面地看待入殓职业,是态度发生改变的起点。第二次,这二人一起共食,大悟遭遇亲人朋友的不理解,心里面萌生退意。佐佐木邀请他吃东西,并给他讲述人生存下来不可避免的挣扎,打开他的心结,在职业上坚持下来。第三次是大悟、佐佐木还有上村小姐他们三人一起在圣诞夜大快朵颐鸡肉。不论别人的眼光是什么,自我尊重,自己生存下来,在三个从事入殓职业的人身上强烈地凸显出来,他们用“吃”的方式昭示着生命的顽强和不息。大口的吃是表示他们摆脱掉职业上所遇见的死,而在生活中顽强地要活的心迹与信心。

五、生与死:藏而不露的冲突,统一起来

生与死,永远是一对矛盾的命题,也是本影片所要讨论和带给观众的思考。死永远伴随着生,而生的终点是死。死是人必然面临的一步,因为死,人生才有句号。也因为死,人生有遗憾,有瞬间的灿烂。面对必然的死,更多的人选择积极地生。

在《入殓师》这部影片里面,同样从宏观上蕴含这样的主题:只有勇敢地生,才能够冲淡死的悲哀和死的沉寂。影片的微观处,细节处尽显这种生死的对立而后统一,最终形成了全片的温暖风格。影片一开始便是对一名死者的入殓,气氛是安静和哀伤,且插上了一个喜剧的细节;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欢乐颂》的交响乐演奏,一扫悲哀沉郁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让观众为之一震:为什么一部讨论入殓师的影片会是如此?这样的处理既能在一开始激起观众的观赏欲,也交代了主人公曾经的职业:大提琴手。为影片后面他一出现心理活动时就拉琴作了很好的铺垫,而大提琴乐在本片的叙事作用,前文已经分析。沮丧的小林大悟看见河里的游鱼,有两条不断地往上面游,同时伴有同伴的尸体被冲到下面来,他说“多么悲伤啊,为了死而努力,终究是一死,不那么辛苦也可以吧。”老人说:“是自然定理吧,他们天生就这样。”努力上游的鱼以及死掉的鱼,生与死完整地呈现在同一画面当中。而老者一番哲理性的话更是让陷入惶惑的大悟有了新的感悟:生命本是这样的,需要努力与拼搏。而妻子带来的章鱼,最初也还是活的,后来却死了,又一副生死图。这些都形成了一种对比,不明显,也不冲突,但却逃不过生死。影片结尾处,男主人公为自己的父亲入殓。面对曾经抛下妻儿的父亲,摸着他的面容,曾经怎么也想不起的儿时最美好时刻的父亲容颜渐渐清晰起来,父子之间的情感篱笆墙消失殆尽。他将自己送给父亲的石头留给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一生一死,预示生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影片将生死置于一处讨论,却没有大悲大喜,赋予了自身一种温馨的光辉。既然无法逃避生死,就只能淡定地去接受,生者坚强地走自己的路。

六、结 语

在这样一部充满了东方色彩的影片当中，导演用从容而不华丽的影像语言讨论着世间众生必然会面临的人生之路。入殓师的每一个动作都说明这是个庄重的仪式，是为逝者送行，是生者对亲人的最后一见。这种仪式性的刻画以及克制而不刻板的情感表达，在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当中，随处可见。小津是仪式与礼仪严密的遵守者和推崇者，这也许就是日本文化本身恪守的一面。但是这样一部异国演绎的故事，获得了全世界的泪水和赞誉。它所讨论和彰显的生命力是普适性的，被深深认同。

死的外衣下面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生，即使片中会有出现矫情的一面，但是却都被这种生的善意所冲淡。有些时候的情节虽然在观众的意料之中，比如澡堂老板娘的设置以及她的逝去，最终化解了夫妻之间的隔阂，但是这并不会整体上削弱影片所要传达的生的主旨。影片塑造的“入殓师”，是充满感情，而非冰冷的他者。他与家属共同尊重死者的愿望，为喜爱女性装扮的死者披上红裙，为逝去的老奶奶穿上身前交代的长筒袜，为澡堂老板娘扎上黄围巾等等。正是因为他们饱含感情，也赋予了影片温柔的情愫，感动着剧中人物和每一个观赏影片的观众。从此，生者逝者皆不寂寞，源于入殓师搭起了一座桥。入殓师的工作通过影片的刻画，成为一门艺术的创造，他给逝者化妆、穿衣，是为了展现逝者美好的一面，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入殓的空间、音乐、旧迹斑斑等等，导演巧妙地运用这些叙事元素，将《入殓师》刻画得温暖不滥情，心怀希望地作别“踏上旅途的人”。

注释：

[1]郭小橧：《一种影像：关于小津，关于侯孝贤》，选自狄荣军编：《影像：1979—2005 最有价值影评》，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34 页。

[2]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焦雄屏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年，第 66 页。

[3]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第 55 页。

参考文献：

[1]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插图第 8 版），曾伟祯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年。

[3]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一百年》，王众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杨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分众化媒体的新趋势

——危机下日本杂志出版界的生存之道

金 晶

内容提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杂志出版业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本世纪初,随着网络、手机产业的迅速发展,杂志出版业面临媒介内容电子化的严峻挑战。面对危机,日本杂志编辑社与出版社采取了受众再定位、视觉化、广告信息内容化等策略,并尝试与新媒体共同推进杂志数字收费化,试图从不景气中谋求杂志的复兴。本文通过翔实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了日本杂志出版业近年来的改革举措,以期为我国杂志出版业提供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出版研究 日本杂志 媒介经营 广告 受众细分 视觉化

在日本,只要是“定期正式出版发行的、成册状态的印刷媒体”,都可以定义成“杂志”。^[1]从发行量 300 万册左右的漫画志《周刊少年 Jump》到年发行量不满 700 册的《出版研究》,一直以来日本的杂志出版以种类多样、高度分众化为特点。内容五花八门、发行周期灵活多变,根据读者的喜好将市场切割为高度细分的单位,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杂志业欣欣向荣的法宝。然而近三年来,在互联网时代和媒介内容电子化浪潮的冲击下,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广告商的投放倾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杂志出版界曾认为,“杂志作为高度分众化的媒体,理应成为广告商制造品牌效应、直接刺激销售增长的最佳载体。即使在网络时代,比起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生存的可能性也不小。”^[2]然而到了 2006 年,日本网络所获得的广告费就超越了杂志所获得的广告费,无情地打破了上述幻想。

2006 年网络广告对杂志广告的逆转奏响了杂志出版传统模式崩坏的序曲,日本杂志出版业面临重大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幻想破灭中清醒的各大杂志社纷纷采取受众再定位、视觉化、广告信息内容化、与互联网联手推进杂志的数字收费化等改革举措,试图构建日本杂志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模式。这些模式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不能说完全成功,尚在摸索之中,对于市场同样面临萎缩的我国杂志市场应有一定的启示。

一、危机:九年销售额负增长

根据日本电通公布的数据,2008 年日本媒体的广告总收入 6 兆 6926 亿日元,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自 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在各媒体分别获得的广告费中,电视和报纸虽然还维持前两位,但互联网的气势咄咄逼人。2006 年,网络广告收入已超过杂志广告收入,正在逼近疲软守旧的日本报纸,业界预计超出只是时间问题,取代电视也并非遥远的未来(参见表 1)。

表 1 日本各大媒体的广告费

媒体类型 / 广告费 / 年份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电视	2 兆 161 亿	1 兆 9981 亿	1 兆 9092 亿
报纸	9986 亿	9462 亿	8276 亿
广播	1744 亿	1671 亿	1549 亿
杂志	4777 亿	4585 亿	4078 亿
互联网	4826 亿	6903 亿	6983 亿

数据来源：<http://www.dentsu.co.jp/news/release/2009/pdf/2009013-0223.pdf>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杂志的市场已经萎缩到了不能不呼喊危机的地步。

首先体现在发行规模的总体缩小。2004 年(平成 18 年)日本出版杂志共计 4549 种,2006 年减少到 4540 种,这是 1975 年(昭和 50 年)以来首度出现种类减少^[9]。

其次,销售额连年负增长。2007 年 2 月,日本出版科研所发表的历年日本出版物销售总额显示,9 年来日本书籍、杂志销售总额一直为负增长。而在 2006 年出版物销售总额 2 兆 2627 亿 8537 万日元(比前年减少 1.3%)里,书籍为 1 兆 94 亿 5011 万日元(同比增长 2.2%),杂志为 1 兆 2533 亿 3526 万日元(同比减少 3.9%),亦即尽管书籍销售额相对增长,但由于杂志销售额大幅锐减导致了总体的负增长。^[4]

近年来,日本的杂志种类一直有所增加,而销售总额却连年减少,足见日本杂志界竞争淘汰之激烈的现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本刊物出版后,因为无法获得稳定的读者群而不能得到广告投放客户的青睐,其运营的维持也就举步维艰,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书摊、书店里新刊琳琅满目,而大多如昙花一现的状况。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坚持购买杂志的读者习惯长期订购固定的某几类杂志,或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互联网或者其他途径了解某本杂志某期内容的概要,有目的地购买。

二、target! 读者再定位的时尚杂志

在经济危机中,广告投放客户不可能有多余的资金来投放一些门庭冷落、帐簿赤字的杂志,就连一些声誉较好的老牌杂志所得的广告费份额也缩减了。于是杂志社纷纷进行资源整合、制定新的市场策略,努力找回流失的读者、开拓新市场。其中编辑部必须首先反省自身的内容,重新打造一本吸引人的杂志的第一步,就是要精确地定位读者。对于像日本杂志业界这样极度分众化的媒体而言,这更是至关重要的。

日本杂志可以大致根据内容分类: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当数以对社会事件挖掘报道大放异彩的周刊新闻杂志;周刊漫画则以老少皆宜、内容丰富多样、产业链成熟而创造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然而论广告收入它们都比不上时尚杂志。原因在于时尚杂志本身就属于时尚品牌产业链的一环,可以直接创造品牌效益,为商品作宣传。

下面以时尚杂志为例,分析他们在危机下的读者再定位策略。

1、问题描述

在细分再细分的时尚杂志市场中,不断有新的杂志创刊,而这些杂志期盼仰赖维持自身生存的资金来源都不是销售额,而是广告商的投资。在这种情形下,广告商更倾向于将资金

投注于品牌已经成熟、拥有相对稳定的庞大读者群的几份顶尖时尚志上,出现了某几本杂志垄断巨额广告费的现象。

2006年总额4777亿的杂志广告收入中,女性杂志《CamCam》占了将近3亿,《More》占了2.6亿,《non·no》占了2亿,而男性杂志《LEON》也揽下1.7亿。以《CamCam》为首的“赤文字系杂志”(因封面题字到90年代为止沿用红色字体而得名,以女大学生、白领等20-25岁年轻女性为主要读者的四份杂志合称)单页广告费用均在150日元以上。

由于广告资金被垄断,而时尚杂志市场又“僧多粥少”,难免有一些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牌杂志面临“失宠”。这些杂志与新刊杂志不同,它们原本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因为杂志社内部采取过于保守的方针,没有及时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调整,因此读者渐渐流失,广告费也随之“缩水”。

2、个案分析:《POPEYE》的蜕变——从共性走向个性

《POPEYE》是日本一本著名的男性时尚杂志,创刊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第一个将美国西海岸的文化时尚(滑板、慢跑、滑翔机等)介绍到日本而闻名,在80年代享有时髦青年“圣经”的美誉。^[5]

90年代末,《POPEYE》面临重大危机,最早的一批战后五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在世纪末已步入中年,结婚生子、事业成就的他们对杂志的热情和需求或消退或改变。中年男性需要的不再是年轻人的时髦玩物,而是更现实的与职业有关的信息和业余消遣。而对于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读者来说,《POPEYE》又太老派了,与他们的趣味不合。简言之,《POPEYE》过时了。

所谓“过时”,既意味着从“共性”到“个性”的时代变化,也标志着从“团块”到“个体”的世代变化。日本从战后到80年代,流行文化一直以倡导新事物为主,这种从欧美不断引进新鲜元素——掀起风潮——大家跟风的模式,突出的是一种共性,即“大家一起享受快乐”(みんな楽しむ)。70年代当红女星山口百惠就是典型的“共享型娱乐元素”,山口的歌家喻户晓、众口传唱。然而到了70年代末山口退出演艺圈之时,电视取代杂志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大众媒体,这批年轻人崇尚的是个性、特别、不流俗,作为“共性教育”典范的“教科书式”时尚杂志自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了。

摆在“过气”杂志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完全丢弃以前名为“只针对年轻男性”,实则“老少皆宜”的共性方针,做成一份只属于今天的20岁左右男性的杂志;或者保持原有的传统和矜持,慢慢走向历史使命的“终结”。

比起女性时尚杂志,男性杂志的发展还存在着更多的天然局限。18-22岁的女性正处在热衷于变化自己形象的阶段,她们可以根据春夏秋冬的变迁全面、系统地调整服装、饰品、化妆品,或者随着环境、心情的改变从头到脚地彻底实施“形象革新”(image change)。顺应这种“形象革新”的需求,女性志每月都有丰富的素材和内容,而男性相对来说就比较缺乏“季节感”,要“革新”甚至要“变化”都比较困难。

《POPEYE》编辑主任熊井昌广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改革后的《POPEYE》在内容呈现方式方面与过去有何不同。他以汽车为例,将过去包括《POPEYE》在内的男性杂志呈现时尚汽车话题的方式称之为“手册式”(マニュアル式):70年代日本汽车的家用普及率尚不及美国,因此年轻人只能从杂志上琳琅满目的新车介绍中“幻想自己开着这样一部车”,过一把车瘾。杂志只要罗列新车的介绍和精美的图片,介绍一些美国关于汽车的文化、知识就足以引起读者阅

读的欲望,这种方式即“手册式”^[6]。

但现在的读者,不仅能从电视、网络上获取足够的新车信息,年幼时就随大人驾车兜风,甚至驾船出海的也不在少数,自然不能满足于“手册式”的信息呈现。熊井认为,应该强调的是信息呈现的情景:告诉男性在不同的场合开什么样的车最合适——例如第一次约会时开什么品牌、什么颜色的车更能增加在女性眼中的魅力、女性平时喜爱怎样的小汽车,等等。简而言之,信息通过组合,强调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需求这些商品的读者本人的“感觉”(sense)。当然,这种“情境式”的宣传也引出了其另一个特点:在男性杂志里也越来越突出了女性的喜好和感觉。

《POPEYE》的变革引起了业界各方面的评论,有人认为真正的《POPEYE》已经不存在了。而随着同样实施改革但最终失败的同类杂志《Hot-Dog PRESS》的停刊(2004年),以共性为特征的“教科书”式男性时尚杂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的男性杂志和女性杂志一样,必须在“不变中求变”、不断创新。然而,由于上文提到的天然局限,要突破瓶颈只靠内容的再细分化是不够的。为了配合读者定位与内容细化,杂志社更为注重视觉化效果,将页面打造得靓丽一新,从视觉感官上吸引读者的购买欲。

三、眼球之争:加强视觉化效果

杂志的视觉化又称“可视化”,指的是杂志页面上视觉要素的扩大。具体一般表现为彩页、插图、照片、图示的增加。1996年,三泽叶子等人对《周刊朝日》等三份知名杂志从1955年至1995年50年间内纸面的“视觉化指数”作了研究。所谓“视觉化指数”是综合三本杂志的彩页数占总页数百分比、有插图照片的页数占总页数百分比、混排页面文图占每页面积的平均百分比等三项数据计算出的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周刊朝日》的视觉化指数50年来增长了30个百分点,其他两份杂志也有类似的增长率。^[7]这三份杂志分别在日本的周刊新闻杂志、女性杂志、文学类杂志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50年来日本杂志视觉化程度普遍增长的情况。

纵观日本杂志的视觉化发展情况,提高视觉化效果的方法大致有三种:

一是抢占纸面空间。这要求杂志社在成本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提高视觉化指数。制作彩页、聘请高水准的专业摄影师都要花费相当巨大的成本代价,而页面策划担当者和编辑的职责就是在成本许可范围内将这些视觉元素最大效率地加以利用。例如对每期特约明星模特儿照片的页边距作调整,大大压缩页面留白的宽度,这样的话,即使版面尺寸不变,也可以起到照片放大的效果,模特儿的形象在读者眼中更突出了。

二是精心构造细节。网络信息时代的青年男女,可以轻易地从多渠道获取一件新款衣服的信息,但是一套自己追逐的明星的高质量写真,读者获取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明星写真而购买平时不怎么买的杂志的可能性由此大大提高。但拍摄写真同时也提高了杂志的成本,读者为了说服自己购买,自然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现代杂志不仅在摄影和印刷技术上精益求精,更聘请专业造型师按照当前的季节感和流行趋势为明星模特儿设计形象,在细节上下足功夫。例如改革后的《POPEYE》曾邀请杰尼斯事务所的赤西仁和龟梨和也拍摄写真。这两人在娱乐圈向来被相提并论,支持者规模也不相上下。为此,《POPEYE》打算以“对称”的方式连续推出两颗重磅炸弹,因而给两人设计的服饰造型从颜色到风格几乎完全一样。但刊物

出版后,读者反馈“并没有重复的感觉”。赤西的支持者在博客中纷纷赞赏《POPEYE》将赤西表现得极为男人味,而龟梨的粉丝则称赞偶像“性感极了”。为什么同样的造型会营造出全然不同的感觉?区别只在细节:赤西的姿势突出了其骨节分明、天生非常有男子气概的手,而龟梨那件衣服尺寸稍小,更紧贴他的身材,增添了“性感”。

三是个性与多样化兼顾。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读者更加追求个性,但同时又追求多样化的信息。为此,杂志必须一方面提供贴合他们兴趣和需要的个性化解释,另一方面又提供给他们更多可以用来灵活变通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被局限的页面空间上做到两点兼顾并不容易,因为杂志不像网页,具有超链接的功能。有鉴于此,杂志编辑只能尽可能地增加信息呈现时的“厚度”和“立体感”。例如,在展示本季新款牛仔裤时,若读者定位为20岁左右的男性,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一定喜爱hip-hop风格,编辑便会将这条裤子的照片摆成最近流行的hip-hop风:按臀部肥大、裤腿松垮的样子拍摄,并且按照青年男性认为“很酷”的搭配法加上一双鞋带没有系好的运动鞋——这种信息呈现方式充分考虑到了定位受众的群体倾向。但同时,即使是都喜爱hip-hop风牛仔裤的人,也会有颜色需求方面的差异。此时,编辑会展示一打而不是一条牛仔裤,即在那条牛仔裤后面还“叠”着军绿色、藏蓝色、黑色……尽可能多种颜色的同款牛仔裤。这种信息“层叠”的呈现方式,既节省了纸面空间,又兼顾了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日本杂志强化视觉化效果的做法在时尚杂志里体现得较为突出,但实际上在新闻杂志、技术情报杂志等其他类别的杂志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例如新闻杂志和技术杂志中,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图表、符号来辅助解释读者难以理解的文字信息。这样做,不仅使文字叙述的逻辑变得更为清晰,也使杂志的整体风格更通俗易懂,无形中帮助拓宽了潜在的受众范围。

四、广告内容信息化:成为理性读者的情报来源

现代杂志对广告的重视可以说是杂志和广告投放客户双向需求的结果。广告投放客户方面的目的当然是宣传自己的品牌、推销商品;而杂志重视广告,不仅是因为广告费收入比销售收入稳定,是维持杂志社运营的主要支柱,也是因为广告商提供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它的部分内容来源。这里的前提是读者经过媒介的一定熏陶,具有理性判断媒介信息的能力。

日本杂志广告协会于2007年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35.6%的杂志读者对杂志广告的评价为“能够让我更加详细地了解商品信息”,28.9%的读者认为杂志广告对于刺激自己的消费欲望有作用,而认为广告能“提高这个商品的印象值”的读者只有24.9%。¹⁸由此可见广告内容本身的信息供给作用。

可以认为,拥有一定媒介素养的读者对包含广告在内的杂志内容判断是理性的,即使广告商抱着推销商品、推广品牌的目的,读者的理性消费观念不会被轻易动摇,他们接受广告中含有的情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既不抗拒,但也未必一定会被广告刺激消费欲望、或者提高对商品的印象值。

读者的这种理性判断使日本的杂志开始更为灵活多变地利用广告。除了运用煽动性的广告词和视觉效果的刺激以外,很多杂志尝试着在内容中融入广告商品品牌,或将广告商品本身作为报道对象,提供系统、精密、丰富、理性的信息。例如,一本时尚杂志于2008年2月刊

登了通版彩页的专题,标题为《验证五大都市传说:可口可乐全揭秘》。这个专题以看似翔实科学的材料,图文并茂地对世界第一碳酸饮料——可口可乐——品牌成功的原因做了探秘。具体的手法包括:以视觉传播的理论分析可口可乐的广告如何刺激人们饮用的意识;介绍科学家是如何用 MRI 实验测试人脑海马体对可口可乐红色包装而不是百事可乐的包装产生反应;可口可乐瓶口能喷出漂亮泡沫气泡的原理;可口可乐的原材料成分以及贮藏手段等等。

这个专题报道的对象——可口可乐公司是日本杂志广告业最大的广告商之一,并且从专题的“揭秘”内容中,可以隐隐看出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一贯争锋相对的竞争痕迹,其广告宣传的目的非常明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读者反馈显示,这种形式出现的“广告”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因为它没有以华丽空洞的煽情广告词赤裸裸地激发你的购买欲,而是从较为有趣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具有科学依据的信息量,此外它的版面设计也很吸引眼球。对于广告商而言,他们不排斥毋宁说也鼓励这种形式的软广告,而对于杂志社和出版社而言,这更是一种效率最高的资源利用,求之不得,何乐而不为。

五、探索新模式:杂志出版业的内容电子化

日本的数字化刊物出现较早,发展迅速。最近又出现一种以邮件的形式,由提供方直接将内容发送至订阅者邮箱或手机的数字期刊业务。这种电子杂志更新快、内容丰富、订阅方便、价格便宜,它们正在有力地冲击着纸质情报杂志的市场,日本人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单词“邮件杂志”(メルマガ,mail magazine)来称呼这种出版界的新秀产品。

内容电子化能否成为杂志出版业的救星?目前日本出版界正将巨大的希望寄托于此。为此,日本杂志协会还于 2009 年 7 月专门举行了研讨会,集中讨论电子化开辟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会议讨论了在法律方面建立电子出版物著作权处理的具体规范,并提议在 IT 技术方面构建全日本通用的技术支持平台,建立一个统一格式化的电子内容数据库^[9]。

从市场的发展现状来讲,日本也确实具备了媒介内容电子化整合的条件。现在,以“邮件杂志”为首的定期情报配信已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这种配信方式最大的优点是专业化。用户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喜爱或需要的网站,只要它发布“邮件杂志”,那么贴合个人喜好或需求的情报便会源源不断地送到用户手边,迎合了用户在海量信息面前按需选择的要求,也加速了媒介内容分众化的趋势。一些政治家和政府机构也开始关注它的宣传潜力,发行“邮件杂志”已经成为日本首相官邸的惯例,安倍、福田、麻生、鸠山四届首相都定期向订阅者发布首相的最新动态。

电子化的媒介内容、高速快捷的电信网络,加上系统化的电子付费平台,这三者合一的服务目前还处在摸索发展时期,关于媒介内容电子化和收费化的优劣尚存争议,但是对处在困境中的日本杂志出版业而言,无疑看到了开拓新天地的一丝希望。

六、结 语

日本的杂志业界虽然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但经济危机影响下市场低迷的情况尚未完全好转,新的编辑方针和经营模式也仍在摸索之中。纵观此次杂志业改革浪潮的特点,适应读者时代观念的变革、摒弃保守主义、顺应网络数字化潮流不断创新是从困境中复兴的必由

之道。从这方面来说,日本的经验足可为中国杂志业借鉴。当然,同时也要看到的是,增加广告收入是日本杂志生存的主要根基,在某种程度上,杂志等于杂志广告。这种纯商业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商业化过度渗入杂志内容,影响了非商业杂志如新闻杂志、学术杂志的客观公正性。有鉴于此,中国杂志业在吸收日本经验时应当取长补短,在重视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应当兼顾杂志作为大众新闻媒体的社会公益性。

参考文献:

- [1]川井良介:《杂志的概念与类型(上)》,《出版研究》,第23期,1993年。
- [2]佐佐木俊尚:《没有危机感的出版业界》,《博客:佐佐木俊尚,记者的观点》,2006年,http://japan.cnet.com/blog/sasaki/2006/08/03/entry_post_4/。
- [3]《日本统计年鉴》,第23章,平成21年(2009年),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23.htm>。
- [4]《日本书籍出版的50年史》,第1部《时代与出版》,日本杂志协会, <http://www.jbpa.or.jp/nenshi/index.html>。
- [5]椎根和:《pop-eye 物语:1976年-1981年》,新潮社,2008年。
- [6]熊井昌广:《与鹿岛先生的对谈》,《博客:Driver's Salon》,http://www.racerk.jp/salon/salon050515_01.html。
- [7]三泽叶子、望月千惠子、望月百合、仲泽彩子、三枝惠美子:《杂志的视觉化变化:1955-1995》,山梨英和短期大学,1996年。
- [8]日本杂志广告协会杂志广告数据:<http://www.zakko.or.jp/jpn/qa/03/index.html>。
- [9]JAGAT 交叉媒体研究会:<http://www.jagat.jp/content/view/1052/105/>。

(金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中心大事记

2009 年下半年

- 6月22日 胡令远教授、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接待日本创价学会来访。
- 6月24日 三菱商事(上海)企画部竹本部长来访。
- 6月29日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上海代表处上岛所长来访。
- 6月29日 长野大学常务理事柳町政美来访。
- 7月4日 张浩川副教授、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受邀参加世博会日本企业馆开工典礼。
- 7月6-8日 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接待京都产业大学学生代表团。
- 7月10-19日 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赴智利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第21届世界大会。
- 7月27日 日本熊本县政府代表团一行5位访问我校,该县知事蒲岛郁夫作了题为“日本改革、地方发展”的演讲,并与中心20余位专职和兼职研究员座谈。
- 8月3-19日 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部师生一行来访。
- 8月19日 日本三菱化工机械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所长金明幸来访。
- 9月4-5日 魏全平副教授、贺平讲师赴吉林大学参加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09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分别作了“日本循环经济对中国的启示”、“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文献回顾与研究议程”的分科发言。此次会议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联合举办,会议的主题是“循环经济与转型期的中日经济”。
- 9月13-14日 郭定平教授、戴晓芙副教授、贺平讲师参加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办的“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作了题为“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日本‘新金融框架’与不良债权的治理析”、“日本的东亚合作模式研究——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的演讲。
- 9月15日-10月20日 复旦·三井物产冠名系列讲座“日本社会与文化”举行,讲座为面向全校师生的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的学者专家就日本社会与文化这一主题进行演讲。本期分4讲:9月15日,中心徐静波副教授的“日本的饮食文化”;9月22日我校新闻学院李双龙教授的“日本的大众传媒”;10月13日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的“何谓日本文化”;10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陆留弟教授的“日本的茶文化”。
- 9月17-21日 郭定平教授参加由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召开的“世界

- 日本研究机构圆桌会议”。
- 9月19-20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沈阳参加“战略互惠框架下中日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华日本学会、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后援。会议讨论分3个分科:经济分科、政治历史分科和文化文学分科,张浩川副教授主持了经济分科。
- 9月21日 中心与校外文学院日语系联合邀请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向华教授、副主任 Wayne Cristaudo 来访,为我校学生30余人作了题为“传统家族制度与‘公私’的概念——中、日、欧、美之比较”的演讲。
- 9月21-22日 胡令远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25届国际论坛,就“民主党新内阁的政策调整”进行了专题发言。
- 9月23日 经学校任命,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期为2009年9月至2013年3月。
- 10月13-17日 沈浩讲师赴日本长野大学、坂城町访问。
- 10月13-19日 郭定平主任赴日本长野大学访问,后赴日本新潟大学参加会议。
- 10月22日 日本札幌大学中山健一郎来访。
- 10月24-26日 徐静波副教授赴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 10月26日 中心召开了以“鸠山新政权与东亚新格局”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 6月2-5日 日本财团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渡边昭夫教授、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毛里和子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奥巴马新政权的东亚政策与中美日关系”和“鸠山新政权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主题报告。主题报告之后,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东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日本国内的“新脱亚论”思潮、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与会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10月27日 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来访。
- 10月31日—11月1日 由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办的第19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中日经济关系的新课题”隆重举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广报文化中心主任和新闻文化处处长前川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小岛宽之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本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来自日本东京大学、武藏大学、帝京大学以及国内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的20余位学者到会发表主题演讲和学术报告。校内外40余名中日学者和企业机构代表、150多名复旦学生与会。中日双方学者围绕中国经济转型的新问题和中日经济关系面临的新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会议围绕世界金融危机与中日金融互惠合作、中国经济转型与中日互惠合作的新课题、中日经济互惠合作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三场学术报

告。

- 11月10日 中心与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第二届复旦·瑞穗论坛,主题为“世博后的中国经济”。复旦大学校长助理陆昉教授、日本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社长远藤宽出席会议并致辞,商务部驻上海办事处特派员储士家与瑞穗证券金融市场调查部部长高田创分别在会上发表了基调演讲。此次论坛为中日两国产官学界的交流提供了交流平台。嘉宾们在现场互动中,就宏观经济的实态和中日合作的重要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出席者 200 余位。
- 11月19日 由中心与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合作主办的三井物产2010年校园宣讲会暨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召开。获奖名单如下:一等奖任文峰(历史学系);二等奖徐晓东(新闻学院)、李利平(数学科学学院)、张若愚(国际政治系);三等奖陈波(日语系)、陈玲(日语系)。
- 11月20日 日本横滨大学经济学部一行来访。
- 11月30日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和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惠家访问中心,并分别就“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与中日关系”、“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文化问题”发表了演讲。
- 11月24-27日 郭定平教授赴日本神户大学参加“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 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陪同前校长王生洪教授赴早稻田大学、长野大学、坂城町访问。
- 12月3-9日
- 12月8-11日 郭定平主任、张浩川副主任赴韩国高丽大学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签署合作协议。
- 12月18-19日 中心主办“大城市贫困层问题的现状:东亚大城市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五石敬路(东京市政调查会主任研究员)、田中晓子(东京市政调查会研究员)、吉清雅英(东京市政调查会研究员)、崔镛善(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地方税收研究所所长)、朴薰(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崔天奎(首尔市立大学地方税收研究所研究员)、陈峰(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等中、日、韩三国学者与会。
- 12月18-19日 郭定平、胡令远、张浩川赴长沙参加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办公扩大会议。
- 12月25日 中心举行“忘年会”,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院长作特别演讲“奥巴马的亚洲之行与中日美关系”,中心专职与兼职研究员共 80 余人出席。

(华 莉)

目 录

·政治·经济论坛·

- 日本民主党内阁内政与外交探析 周 彦 林晓光(1)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和理念
——亚太地区脱离冷战秩序的摸索
..... 田 凯(12)
- 日本社会公益组织与自然灾害治理
——基于阪神地震之后的考察
..... 康晓强(22)
- 上海合作组织与日本的中亚能源战略 罗 田(30)
- 浅析战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政策 徐亮亮(36)
- 日本公司治理效率的实证检验 李 彬(45)
- 预期与“流动性陷阱”下的日本货币政策
——实践及其启示
..... 许祥云(51)
- 中日 FTA 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分析
..... 陈 霞(57)

(
半
年
刊
)

主 编 胡令远
副主编 贺 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振声 陈建安
林尚立 郑励志
胡令远 郭定平
贺 平 徐静波
樊勇明 臧志军

2009 年下半年刊
(总第 33 期)
2009 年 12 月出版

·社会·文化研究·

- 武士道近代化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1868-1945)
..... 吴筱梅(64)
- 死的形式,生的主题
——试述影片《入殓师》统一生死的叙事元素及技巧
..... 杨 芳(72)
- 分众化媒体的新趋势
——危机下日本杂志出版界的生存之道
..... 金 晶(79)
- 附:中心大事记 华 莉(86)

稿 约

一、本刊为日本研究的综合性刊物,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我国日本学研究的繁荣和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向校内外从事日本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诚意征稿。

二、凡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教育、法学、新闻传媒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均受欢迎。立意新颖及从中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文章尤受欢迎。

三、来稿要求:

1. 字数一般在五千至一万之间。
2. 文稿请用 A4 纸打印。来稿一般不退,三个月后未接到通知的,请自行处理。
3. 正文前请附“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务请附在文后。
4. 请详写作者真实姓名(用笔名者)、职称、通信地址(包括工作单位、部门和邮编),以便联系。
5. 来稿请寄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集林》编辑部,邮政编码 200433,同时将电子文本发送至如下邮箱:

huali100@fudan.edu.cn

四、来稿一经采用,即奉致稿酬。